

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



93353

D 23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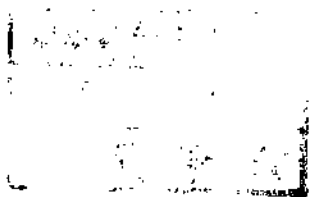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

- 杜 蒲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40366★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

杜 涌 著 责任编辑: 李自强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68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10册

ISBN7—215—01754—0/D·325 定价3.55元

DA147/17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且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笔直的。40年来，我们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积重难返的岁月，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中国40年历史舞台上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为整个人类历史所少见。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认真反思40年的历史，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财富的效能，必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40年国是反思丛书》即为此而

尽力。

本丛书将着重展现共和国40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认某些历史事实是痛苦的。但唯其痛苦，才能使我们民族久已麻痹的那部分神经不再麻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牵扯到众多的死人和活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判明某些人的英明和某些人的愚蠢，或者某些人的高尚和某些人的卑鄙，而着眼于我们所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丛书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的。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40年历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那些“荒唐岁月”或“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

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40年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

引 言

若干年以前，曾有位历史学家编纂过一本关于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可能演变方向的书。该书立论是建立在历史上的“如果”这一概念之上的。例如，如果路易十六逃出了革命的巴黎而不是被抓住后绞死；如果列宁没有在1917年4月到达俄国；如果罗斯福总统早逝几年等等。总之，如果这些事件成立，那么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不同？

科学的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建立在“如果”这类假设上。但是，对于一场事件的诸种可能发展方向及其中某种方向成为现实的历史条件的探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毕竟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是人的创造。虽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趋向是不可改变的，但就其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行程，特别是某些年代和具体事件的表现过程来说，它不是不可逆转的。唯有此，历史才不是黑格尔笔下的无情的逻辑进程。比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其中一段曲折的经历。人们完全有理由说，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地蕴涵着这种悲剧的。

确实，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夜，共和国在克服了“大跃进”和三年天灾人祸造成的灾难之后，正步入了它发展的旺盛期。略举几个数字即可说明这一点，就在1965年，

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年粮食产量达到19453万吨，农业总产值为833亿元，比历史最高年份的1958年还增加了7.2%。工业总产值达1394亿元，完成计划的117.6%，比上年增长了26.4%。人民生活所需的商品及货源充足，保障供应。物价零售总指数在上年已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2.7%。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情况较好的上年又提高了8.8%。总之，似乎处处都是一派升平景象。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大跃进”、三年灾难带给社会的消极后果已为这种繁荣兴旺所冲淡；它们好象只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来去匆匆的过客。而即将到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风暴的种种先兆，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当我们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新社会后，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巩固和建设这个社会呢？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出色政绩使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信任，但这同时也掩盖了它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缺憾与失误。

1966年下半年后，当“文化大革命”从文教领域迅速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多数社会成员几乎是在还未摆脱震惊和困惑的状态下便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一革命的行列。“文革”似一剂威力无限的兴奋剂，它使这个素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伟大民族在最短的时间内就陷入兴奋、冲动与狂热之中。被政治旋风刮得手足无措的寻常百姓几乎瞬间便心安理得地超越了以往的一切社会行为规范。“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①这条“最高指示”成为一切极端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一切都显得那么矛

^① 见1966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盾，又似乎理所当然。没有了理性，但理性的意识形态却左右着人的行动；没有了规律，“文革”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无所谓建设，“不破不立”，革命就是建设，如此等等。是盲从？别无选择？还是自觉参与？对此，难以有一个划一的、简单明了的答案。即使是在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的今天，我们依然为人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情、狂热和虔诚，为他们的对自己的活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浑然不觉的精神状态，感到一种深深的震颤。

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来说，“文革”已是久远的过去。他们对父兄们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冲动乃至于愚蠢和邪恶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即使是“文革”的亲历者又何尝不是时时泛起这种感觉。马克思说得好：“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在经历了10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虽然我们尚不能断言产生“文革”的那些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已不复存在，但是，巨大的历史代价已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深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和发展是不可能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要，它是党赖以制定自己指导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背离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就会步入歧途，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革”的实践还说明，在激进的革命形式下出现的各种极端行为十分自然地适应了各种落后的社会条件；低下的文化素质，狭隘的小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产意识，封建的宗法观念，历史积存的破坏性社会心理，以及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也构成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负作用的“合力”，在共和国史上写下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然而，诚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言：历史没有垃圾箱。无论“文革”这段历史如何不堪回首，但它却是时时提醒我们在新形势下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警钟。正如列宁指出的，“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①

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起步发展起来的。党和人民对任何来自正面的困难、威胁和打击有着充分的精神准备，对任何实际存在着的甚或是想象中的危险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随时准备与任何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进行最顽强的斗争。但是，当危险和打击来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方面时，他们便因缺乏思想准备而感到茫然和手足无措了。对领袖的信任和崇拜，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理论认识上的盲目性等原因，使党和人民没有可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所以，“文革”的发动是党在指导思想左倾理论错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然而，在左倾理论的实施与贯彻过程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

中，它却释放出连“文革”的发动者也难以驾驭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后者的作用与产生的社会后果甚至也远远超出了左倾理论本身所能容忍的范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是人们惯常用来形容后者的概念，进而便有了“极左思潮”这一称谓。试图从总体上说明极左思潮的表现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是本文的主旨。但是，首先有两点必须清楚：一方面，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所犯的左倾理论错误与以林彪、江青等为代表所鼓吹煽动的极左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产生的根源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横行又与左倾错误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在第一章中对这两个概念稍加界定，进而叙述了极左思潮的基本特征与内容结构，在其后两章中，则着重阐述了左倾理论的认识特征及其与对社会主义的曲折认识之间的关系。而在第4至第6个问题中，对极左思潮在“文革”中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某些普遍社会后果作了说明，在其后三章中，则试图从文化资源的再分配、思想观念的契合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分析极左思潮由之产生的社会根源。对极左思潮作这样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尝试，以极左思潮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之复杂、以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任何一种说明都恐有不到之处。但是，对极左思潮的研究，不仅仅只具有历史学上的意义，更有其直接的现实性。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

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①因此，对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实，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当然，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回顾，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些似乎愚不可及的举动、那些令人发指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发生的暴行、那些把贫困和愚昧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等等，似乎又把人的思想拖回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以致于要站在那个年代的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几乎成为一桩让人绞尽脑汁却也难得要领的事情。几乎每一代人都在抱怨“文革”给他们造成的损害，因此，对“文革”情绪化的评论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里不妨借用一位学者的警句：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但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尽管毛泽东的左倾理论导致了“文革”的发动，但即使不说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曾作出的巨大贡献，仅就他即便是在犯错误时也始终不动摇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执著追求而言，也足以使人对这位伟人肃然起敬。而从在“文革”中始终与极左思潮进行着坚决而顽强的斗争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身上，从以身殉国的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事迹上，我们更不难看到社会的主流与方向，这正是我们能够迅速摆脱“文革”的阴影而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力量之所在。

如果要对“文革”作一总的概括，那么马克思的一句话

^①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十分贴切：“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① 仅以此作为本文的引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5页。

目 录

引 言	(1)
一 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	(1)
左倾理论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	(4)
极左思潮的基本特征	(9)
极左思潮的构成	(14)
二 左倾理论的表现形态及认识特征	(20)
表现形态	(22)
认识特征	(28)
三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35)
理论沿革	(42)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文革”的发动 ..	(46)
“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观念	(52)
四 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63)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嬗变	(65)
“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膨胀的根源	(76)
“文革”时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及其	
政治含义	(78)
五 畸变的社会心态	(87)
灵魂的自虐	(89)

	自危的怀疑心态	(99)
	社会性的言行不一	(104)
六	极左思潮下的暴力行为分析	(112)
	暴力潮及其社会含义	(115)
	目的与手段	(123)
七	文化资源社会占有的再分配	(135)
	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形式	(139)
	对文化领域现状的错误判断	(143)
	“修正主义”与精神文化特权	(148)
	文化革命的歧途	(161)
八	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一)：	
	价值观念与社会心态的契合	(173)
	“继续革命”的主旨与社会发展	(175)
	强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对“复辟”的危机感	(178)
	心理准备与参与方式	(182)
	“与传统观念的决裂”	(187)
	“破”字当头的胆论和实践与无序心理	(192)
九	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二)：	
	社会基础	(196)
	极左思潮造就的利益集团	(198)
	产生极左思潮的社会历史因素	(202)
十	极左思潮的历史命运	(220)
	极左思潮的衰亡	(227)
	不断深化的认识历程	(232)
附	录：主要参考文献	(235)
后	记	(238)

一 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

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它同时也贯穿于“文革”过程的始终。但是，仅仅是左倾理论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文革”中的各种极端观念和行为，后者我们称之为极左思潮。

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是两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

左倾理论是指毛泽东藉以发动“文革”的基本论点，其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极左思潮是指在左倾理论影响下，由林彪、江青等为代表所鼓吹煽动而形成的以非理性政治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思潮。这就是说，极左思潮既不同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又不同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

对此，邓小平的几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1979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就明确提出了“极左思潮”这一概念，他说：“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

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①1985年，他在谈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说到：“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搞了整整10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把这种思想叫作极左思潮”。^②1987年，他又指出：“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③自此可以看出，极左思潮即是把“左”的东西发展到极端程度的思潮。

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的密切内在联系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左倾理论是极左思潮的基本出发点，并构成极左思潮的理论内核。极左思潮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但其观念形态与政治行为均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公开旗帜和依据而出现的。因此，它与左倾理论的社会作用方向有着一致性，其内容和涵盖范围也与左倾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第二，正是左倾理论诱发了极左思潮的盛行和全面泛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错误，就不会酿成遍及整个社会的各种极端行为的发生。客观地说，各种极端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左倾理论所希望的。左倾理论的主观目的，是要用阶级斗争的狂潮去涤荡一切污泥浊水，而其客观效果却是打开了封闭着的各种落后思想和恶习的魔瓶的盖子，这大概也是“文革”发动者所始料不及的。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2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5页。

^③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左倾理论又有与极左思潮相区别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行为主体不相同。左倾理论是毛泽东和党错误地判断国内外形势后得出的论断体系，其行为主体是认识上产生了偏差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及接受了这一论断体系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而极左思潮的行为主体除在一定时期内为其裹挟的普通民众外，主要是林彪、江青等所代表的社会落后势力。它所包含的社会阶层成员相当广泛。第二，在内容上，左倾理论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其内容构成较为单一。极左思潮则是以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其核心，但它同时还包含了社会其他阶级或阶层的政治要求，融合了社会中许多落后的意识形态，因而其内容构成十分庞杂。第三，二者产生的根源不尽相同。左倾理论主要是由党在认识和判断上的失误和偏差所致，并由体制和党内生活不正常等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而极左思潮的产生除左倾理论的影响外，尚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寻求克服二者的途径也不尽相同。第四，二者产生的社会后果不同。左倾理论虽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但是，“文革”的实践同时也说明，极左思潮在被少数政治野心家的操纵下，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导向封建法西斯专政。

弄清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的密切内在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对“文革”时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深入的分析。一方面，准确地判断和评价党的左倾理

论对“文革”的发动和持续所起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深刻认识左倾所以会被推向极端的复杂社会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正确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从而不致因“左”的指导思想已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放松对这种已成为“习惯势力”的极左倾向的警惕。

然而，在“文革”的实际进程中，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相互缠绕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又使我们难以将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简单地加以枚举归纳，以对应于左或极左。因此，我们应以一种历史的观点，不是过分拘泥于其差异，而从总体上把握极左思潮的基本趋向。

左倾理论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

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们一般认为，建国以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党内左倾理论是从1957年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被当作了正确的经验加以总结，从而出现了3个重大的错误理论观点：一是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国内主要矛盾；二是改变了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三是提出了必须有一个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而对这种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彻底”的标准，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说明。^①

^① 参见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二年》，第101页。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左倾理论发展的一次重大升级。毛泽东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进攻，认为这“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发动了党内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庐山会议不仅出现重大的理论失误，而且在政治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错误地打击了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使党要纠正自己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变得更为困难。

1962年，在党内对1958年错误的性质和造成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等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不断加深及国际形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集中概括了1957年以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次年9月，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1963年至1965年间，农村和城市部分基层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使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矛头日益指向党内的各级干部。这期间中苏公开论战又直接加剧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忧虑，促使他直

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错误论断。

上述左倾理论在“文革”前已初具体系并直接导致了“文革”的发动。“文革”的实践又为这种理论的系统发展提供了依据。1967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首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纳和表述。其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此，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夺权斗争，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这篇社论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此后，“继续革命理论”便被誉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并被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甚至“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1975年的全国四届人大和1978年的全国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在其序言中也写上了这一理论的要点。在“四人帮”最为得势期间，“继续革命理论”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所谓“全面专政”、“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融合。^①

“文革”的发动及其进程正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而，“文革”实践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及其由此暴露出来的存在于社会中的种种痼疾，使得“文革”的进行不能完全依照其设计者所预想的规模和时间表发展。在1966年

① 以上所述参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谭宗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由来》，载《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王贵秀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演化过程》，载《理论研究资料》第58期。

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道：文化大革命，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他提出，运动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但是，“文革”暴露出来的及其制造出来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文革”以其巨大的惯性一次次打破了毛泽东安排的时间进程，迫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日程设想。1967年，他提出了一个两年计划，以后又提出了3年结束“文革”，直到党的“九大”，他还曾流露出“文革”收尾的意向。但后来的林彪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刺激，自此他再未提到过什么时候结束“文革”，尽管毛泽东对他个人驾驭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对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趋势始终深信不疑。他通过“最新指示”的方式，时时对运动的过程、步骤和方向作出部署和调整，从而使“文革”在总体上呈现出某种阶段性和连续性。但是，当他把自己的许多战友、相当数量的各级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把那些以“最革命”姿态出现的曲意逢迎、心术不正的人和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感到受“压抑”而奋起造反的民众视为自己的依靠力量时，他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向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对于那些曾极为虔诚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无数群众来说，他们所参与制造的“革命”造成了他们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2页。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代表着或自认为代表着进步的历史运动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历史作用，而把自己的行动纳入服从于自己“幻想目的”的轨道，但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不受到他们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社会力量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毛泽东一直认为，“文革”所产生的最终社会效果与自己的预期目的是吻合的，但是林彪事件却直截了当地打碎了这种幻想。虽然这一事件在“文革”中也同样被用来证明“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与正确，但事实却是，林彪事件恰恰是“文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产物，因此，它在客观上已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毛泽东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念头左右自己。承认这一点，需要的是真正“明察秋毫”的历史洞察力。但是，毛泽东并非没有意识到“文革”的实践与自己的“理论”之间存在着的差距和矛盾。1970年，在与斯诺的几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1967年几乎是无政府的情况”，并且说道，“文化大革命”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又把脚收回来。……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冲突发展成了打派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表达过自己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不满。“文革”后期，他又对“文革”下了一个“三七开”的评语。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文革”中这些极端行为一直耿耿于怀，正因为如此，他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制止和纠正某些具体错误，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他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过多次重要的批评

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使得毛泽东不满意的这些极端行为，如无政府状态、武斗、对人的迫害和虐待等，正是极左思潮社会实践的一些重要表现形态。毛泽东虽然难以容忍这些现象的存在，但是他却未能认识到，在左倾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些现象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他无法接受极左思潮的种种极端行为与党发动“文革”的左倾理论有关这一事实，对极左思潮产生的根源，它得以盛行的社会条件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缺乏深入的认识了解，这种状况影响了他的判断，也决定了他只能采取某些局部的限制或补救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

极左思潮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盛行达10年之久的强大社会思潮，极左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文革”期间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革”的过程。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把极左思潮视为“文革”的同义语。这里，首先就“思潮”这一概念的一般含义作一说明。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相当一部分成员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思想倾向。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思潮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关系以思想观念、情绪等形式在社会这部分成员中的反映，它有一个从潜在到公开表露的发展过程。它一经产生，又深刻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从而构成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因素。社会思潮以其综合、动态和流行的思想形式反

映着特定时期内人们的时代意识和社会心态。它表现的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评价。因此,对一种社会思潮的研究,不能脱离其现实的社会条件,只有准确客观地把握诱发社会思潮的各种现实因素,才能客观地把握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

一般来说,某种社会思潮能够风靡一时,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观念自身的主观条件及促使其形成的外部社会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观念的主观条件不能以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为先决条件。因为,正确的理论观念固然可以形成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潮,但那些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念形成社会普遍思潮的情况并不乏见,极左思潮便是一例。理论观念的主观条件是指它在反映社会某些成员的利益需求和政治主张的同时,所涉及到的问题恰恰是能引起社会多数成员关注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领域内的焦点。不反映任何社会成员利益需求的理论观念是不存在的,但一定的理论观念并不能必然地就会演变为社会思潮——除非它所触及的问题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一种错误的理论观念尽管不具备历史必然性,但它却可能因其所涉及的敏感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共鸣,通过影响社会其他成员对问题的判断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外部社会条件是指诱发社会思潮的各种社会因素,它包括下述方面:社会的政治变迁是产生思潮的直接原因;经济利益需求及其变化是产生思潮的深层根源;历史文化传统则是思潮以何种方式表现自身的背景原因;一定的物质传播媒介和手段是思潮最终得以形成的物质条件。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些触及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观念便会演变成思潮。

不言而喻，极左思潮必然具备着群体性、普遍性和现实性等一般思潮的特征，并受思潮产生的一般条件的制约，但它还具备着自身一些十分鲜明的基本特征。

一、极左思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煽动力。这是因为极左思潮所提出和涉及到的正是当时我国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最为敏感、最易于引起普遍关注和共鸣的问题。在政治上，极左思潮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修防修”理论推向极端，利用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忱和对党的绝对信任，以最为革命和激进的形式出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充分地猎取到了很多社会成员的认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真理广为宣传和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潜移默化影响下，60年代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最为关注和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如何不倒退回黑暗的旧中国。在经济上，极左思潮以消灭各种社会差别与特权、追求绝对平等的形式出现，利用小生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厚心态，推行各种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观念和政策。在文化上，极左思潮以文化革命为由，利用人们迫切要求改变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把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统统作为“封资修”文化“赶下舞台”，在观念和行为上迎合了由愚昧所造成的保守与破坏性的社会心态，等等。所以，最初只是反映少数具有相似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与要求的极左思潮，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其他阶层成员的强烈共鸣，从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极左思潮之中，使其声势愈益扩大，直到其发展的最高潮为止。这种情形十分类似于“雪球效应”。但是，由于极左思潮是一种对社会现实作出的虚假反映的思潮，因此它不可能长期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二、极左思潮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特征。一般来说，理论观念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思潮则既包含理性成份，也包含非理性成份，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更多地是以感觉、感情和激情等情绪化形式为主。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卷入极左思潮的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依靠自己对现实的直觉和经验体会，而不是理性思维与其发生共鸣的。这种认知特点也决定了极左思潮不可能以纯粹的理论逻辑形式来表现自身。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凝练的口号或是一句浓缩的格言都更有利于极左思潮掌握群众并把自身普及到社会的低层。“文革”中一句“造反有理”竟搅得无数青少年热血沸腾，而那种把经典切割成“语录”以供人们“活学活用”的方式也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独创，因为它与传统的思维和认识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部《论语》历数千年而不衰，除其内容的力量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绝少论证的格言式表达方式。

情绪化的表现特征又与非理性的社会行为相互作用，互相加强，因此极大地增强了极左思潮的作用力与影响范围。

三、极左思潮的发生带有突发性与阵发性。极左思潮的形成有一个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构成其核心理论观念还仅仅是少数人的思想意识，它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向社会各个方向渗透，不断积蓄和增加自己的能量，一俟时机成熟，在现代舆论传播媒介的作用下，那些在昨天看来也许还是涓涓细流的思想观念马上就汇成汹涌澎湃的极左思潮洪流。极左思潮在“文革”之初的突发之际，其势头犹如冲击波，瞬间便将人们感觉到的但尚未自觉意识到的问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摆在人们面前，人们几乎是在猝不及防的状态下

面对着它的冲击，并且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作出抉择：顺应还是拒斥？但在极左思潮席卷而来之际，没有比作出拒斥“革命”的选择更为困难的事情。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甚至根本不存在着选择上的困难，当在逆这股思潮便有可能带来意外之灾的客观形势下，人们自然地把选择点放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多年来形成的“从众”社会心态，削弱了人们的抗拒力，使得极左思潮在事实上轻而易举地便拥有了群众。何况极左思潮在60年代的中国已并非完全是一种“在野”思潮，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它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普适性表现，因而，它也就是代表着自己的意识形态。

说极左思潮代表了社会部分成员的利益需求和政治主张，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心态，并非妄言。但是，极左思潮的实现不仅受到其他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且由于它在本质上违背了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迟滞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便注定了它的最终结局。然而，在它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它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从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反复波动，直到其能量耗尽，为历史进程排除在外后为止。此外还应看到，极左思潮具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它并不能随着产生它的社会条件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在适当的气候下，它往往又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极左思潮会反复出现。

四、极左思潮包容了强烈的“激进性”与“保守性”。极左思潮是以推行极端理论和极端手段而著称，这种极端化的“革命”使其具有强烈的激进特征。但是，正像在汹涌的浪涛冲击下不免产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一样，极左

思潮也往往与中国传统中最为落后的封建观念相结合，使其具有极大的保守性，与中国最为落后的政治势力相结合，使其具有极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保守与激进，破坏与所谓“革命”这些似乎难以相容的两极却在极左思潮中融为一体。所以，极左思潮不仅有着激进、冲劲和超前的一面，也有着僵化、保守、落后与野蛮的一面。这是极左思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阐述。

极左思潮的构成

当极左思潮以最革命的形态出现，并且形成成为一种强劲的社会势力时，社会各阶层和各种传统观念无不极力迎合并以此掩饰自己，以获得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造成了极左思潮构成的复杂性，使其在结构上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兼容性，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 and 观念都提供了活动场所和回旋余地，也为各种不同的乃致在性质上截然相反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它既激发了无数热血青少年的革命激情，但也造成了遍及社会的暴力潮和无政府行为，它既有最为激进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又处处体现出小生产的保守与狭隘，等等。海外学人梁厚甫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主义内边的极右思想和社会主义内边的极左思想的结合，而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他这里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概念，究其义也是指“文革”盛行的思潮与行为。这种观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虽未必十分确切，但从一个侧面说明“左”并不是极左思潮的唯一内容。

极左思潮的构成包括其观念形态构成及相应的实施行为

构成。

极左思潮的观念形态构成呈现为一个以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辐射型网络结构。极左思潮的形成过程，即是这种观念形态构成不断扩展完善的过程，也即是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化的过程。但是，极左思潮的观念形态又并不是其核心理论观念的简单放大，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要演变为普遍性的极左思潮，除其自身的力量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除主体外的其他社会阶层和成员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因此，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向极左思潮的转变过程，必然是这种理论在量上的扩展和质上的突变过程，当其完成这种转换后，它已不再是代表个别特定社会阶层和成员的思想倾向，而是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意向。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内在于极左思潮，犹如核子内在于原子，核子直径极小，却占有大部分的原子质量；而它向极左思潮的转化又类似于原子核的链式裂变——足以释放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能量。看一下“文革”极左思潮所曾裹挟的人数和其持续的时间，它所搅动起来的狂热及造成的巨大灾难，这样的形容毫不夸张。

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犹如具有强大吸力的磁石，把各种游离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旧的、落后的思想观念都聚合在自己的周围，为这些旧观念提供了改头换面再生的历史环境和新的外在形式。所以，这里所说的极左思潮已不单纯是一种激进的社会主张，而是一个集各种社会旧落后观念之大成的思潮体系，唯其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数年间，没有任何思潮能像极左思潮这样给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如此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破坏。因此，“文革”后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也理所

当然地不仅仅是注意其“左”的一面。

除了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外，作为极左思潮的构成的较为显著的观念主要有：无政府主义；封建的宗法观念和专制意识；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化虚无主义；暴力崇拜观念等。这些思想观念已不是其历史原生形态的简单再现，它们与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是一种机械合成关系，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思潮体系。在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为其核心的作用下，这股思潮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即“左”的社会发展方向。而这种发展方向赖以成行的动力，它所使用的武器和手段，却是中国社会中最为陈旧、落后和保守的思想观念。因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极端的革命进程中，却屡屡出现向着我们已经逾越和抛弃了的旧时代和旧意识倒退的种种迹象。使用最为落后的思想武器，却号称要实现最为激进的革命目标，这并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再现，后者仅仅是借用了复兴古代文明的名义，而形式和内容却是全新的。这并不仅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讽刺。这种状况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极端的激进与极端的保守相结合这一极左思潮的重要特征。

所谓“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这种理论把全部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形式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同时也是唯一目的；其二，把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富裕、多样等同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宁可不要生产力的发展，宁可生活继续贫穷，也要进行阶级斗争；其三，以不择手段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只要所谓斗争需要，便可使用从精神折磨到

酷刑、从人身迫害到株连等一切非法的、非人道的手段。

因此，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毛泽东的左倾理论是有区别的，即使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究其本义，是把阶级斗争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并以此作为“张目”的主要手段，希望它能够成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而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也未主张不择手段地进行这种阶级斗争。因此，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对“打倒一切”、“武斗”及各种破坏生产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就此采取了一些具体限制和纠正措施。在“文革”最为混乱的时期，对一些极左现象的批判也不时见诸报端。但是这一切却似乎未见奏效。

显然，重要的不是左倾理论与以极端化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极左思潮的区别，而是其联系。“文革”中对极左现象的批判几无作用，其原因恰恰在于这种批判的理论前提是把极左现象看作是“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即违背了正统左倾理论的产物，似乎只要不折不扣地遵循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思想 and 战略部署即可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事实说明，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把握、更不用说纠正极左思潮。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所由之出发的正是左倾理论的各项基本论点。而极左思潮的其他观念构成也正是附着于其核心理论观念才获得生命力和影响力。无政府主义是伴随着整“党内走资派”而再生并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全面夺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宗法观念的复活与个人崇拜的兴衰密切相关；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在“全面专政论”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小生产的平均主义观念在消灭“三大差别”、“破除资产阶级

法权”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盛行无阻；而对文化的全而毁坏却有一个动听的名称：破四旧。因此，只有把着眼点首先放在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溯及其由以出发的基本论点，才有可能准确客观地评价“文革”中封建观念意识等的实际成因与作用，而不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历史或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上。我们固然应当看到封建观念意识等旧观念对左倾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左倾理论、尤其是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对这些旧观念残余的死灰复燃所起的作用。倘若不是把阶级斗争的理论推向如此极端化的程度，那么这些无政府主义、封建的观念意识等决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力、达到如此猖獗的境地。把“文革”的极左思潮都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不但无助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评估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社会作用，而且可能使我们忽视这种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由之产生的制度与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

极左思潮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观念形态，而且还表现为实施这种观念形态的政治行为。后者是观念形态构成的外化和实体化形式，因而与观念形态构成受到同样的运动逻辑的支配。极左思潮通过各种极端政治行为造成声势，产生轰动效应，影响和掌握群众。极端的政治行为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极左思潮非理性特征的一面，是造成“文革”对社会全面破坏的重要原因。与观念形态构成一样，极左思潮的实施行为构成与左倾理论的实践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综上所述，极左思潮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错误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着区别和差异，但是，极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它的观念形态与行为形态又与左倾理论及实践有着直

接的关联。因此，为了深入认识极左思潮特征表现及其社会根源，有必要先就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的表现形态及其认识特征作一探讨。

二 左倾理论的表现 形态及认识特征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在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几乎断送了革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全党系统地、从政治、思想、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不断清算左倾错误的影响，从此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即使是在顺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总是不断提醒全党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并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右错误倾向随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翻开《毛泽东选集》4卷，毛泽东关于左倾错误的表现，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及应汲取的教训的论述俯拾皆是。高度的理论自觉，保证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确，也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新中国创建后的几年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陷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党的地位变化及工作重点的转移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党和毛泽东就其指导战略上的正确和客观清醒的形势判断，成功地化解了一道道难题，顺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对左倾错误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经常历数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以提醒处于胜利形

势下的自己和全党。因此，就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而言，党内无人能出其右。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特征、根源等方面所提出的许多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左倾错误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不可能以与过去相同的面貌出现，这就相应地要求人们不断总结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各种思想理论倾向的不同特点，从理论上加深对新形势下党内可能出现的左、右倾问题的认识。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虽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某些左的错误。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继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而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使得党对纠正愈演愈烈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变得十分困难。60年代初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左倾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

错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曾针对左倾错误的表现和认识原因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①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只有对现实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有可能避免左倾或右倾错误，而认真回顾和研究党内历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形态及其思想认识根源，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避免重蹈覆辙的必要一环。

表现形态

左倾错误理论是阻碍党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的痼疾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盲动主义与冒险主义，尤以王明路线为甚，它具体表现为：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否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无视“九·一八”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上，继续强调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2页。

实行进攻路线，发动中心城市起义，以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在革命道路上，轻视农村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夸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占领大城市；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党内斗争的过火政策，对不同观点的同志乱扣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由于革命的性质、任务的变化，新的左倾错误的产生在形态上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一种共同的发展倾向，其思想认识根源乃至个别具体作法上依然与历史有某种承袭之处。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左倾理论发展最为典型和完备的两种表现形态。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暴露了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弊端，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一个有着深厚封建历史传统和小生产意识，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1958年开始实施的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形态反映在三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强调以速度为核心的跃进；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把小型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大型的以至全民所有制，搞“穷过渡”；在政治上，则是开展“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以“左”的政治斗争去推进“左”的经济纲领的实施。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生产力”。速度成了总路线的核心和

灵魂。高速度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但脱离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去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必然适得其反。高速度的大跃进首先从农业开始，小麦、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的“高产卫星”，一颗颗在文件、报告、广播和报刊中腾空而起。你产千斤，我报万斤，互相攀比，虚报浮夸。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类典型的唯意志论口号竟也堂皇地出现在党报党刊上。继而是钢铁生产的大跃进，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大修小土炉，国家集体个人总动员，钢铁产量指标一再修改，越来越高。各地钢铁“高产卫星”你追我赶，竞相上天。其对资源和生态的破坏与其效益之低下造成两个极端。与此同时，各行各业也不肯落后，纷纷搞起了“大跃进”。可悲的是，不但有许多各级干部出于种种原因乐此不疲，甚至有些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也对这种虚假的高速度进行“科学”论证。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又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相信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有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误认为需要把农村的生产关系再提高一步。7月，陈伯达在《红旗》发表文章，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大办公社的设想，为后来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特点定下了基调。8月，中央通过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并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议发表后，短短一个月，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被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县县委书记在全县动员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大会上的一番激昂陈辞，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人民公社与

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说：“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共产”，“大车、牲口全要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哪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台下喊：行！）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私产是贫苦受罪，粮食不能高产。共好了是两千五百斤，好得多吗？（台下喊：好！）”^①在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下，其实践后果可想而知。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在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号召批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拔“白旗”“灰旗”，插“红旗”。在一些地区的经验总结中，也都有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次年，在“继续跃进”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的观点，给那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庐山会议后的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更是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视为资产阶级的进攻。自此，反对者噤若寒蝉。“大跃进”的左倾错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尚可计数，但它对正常社会心态的损害却是长远的和难以计算的。政治上的高压使得人们讳言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说假话者受到重用，反映真实情况者反受打击，社会生活与党内民主生活都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对于“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有觉

^① 多见赵云山等：《徐本共产主义试点剧本》，载《党史通讯》1997年第6期。

弊并作了一定纠正，但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左倾错误按照自身的逻辑继续发展，直至酿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左倾错误的又一完备表现形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现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种论点的指导下，党的各级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被当作批斗和打倒的对象，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陷于一片混乱，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而把这些论点推到极端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又给“文革”雪上加霜，掀起了历史积存的各种沉渣势力和腐朽保守的旧观念，使得“文革”的各种政治行为带有一种野蛮的破坏性色彩。“文革”的左倾表现形态概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斗争矛头直指党内和中央，在进行残酷斗争的同时，中央集权乃至个人集权的体制不断得到加强；在思想上，独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把不同的思想理论观点一概视为“修正主义”，形而上学地对

①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文化上，破坏了“双百”方针，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加以排斥和打击，使得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一度死灰复燃；在组织上，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无限上纲，残酷打击，一度停止党员的组织生活，“踢开党委”，破坏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这就使得林彪、“四人帮”有机可乘，在党内形成了曾一度得势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在经济上，批判所谓“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和“唯生产力论”，取消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使经济形势陷于混乱，把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致使“贫穷”的社会主义观盛行；在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上，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传统道德准则与社会主义时期产生的新道德规范一概加以否定，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态。

比较“大跃进”和“文革”这两种左倾错误典型表现形态的异同，对于深入分析左倾错误的产生根源及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显然是必要的。

“大跃进”与“文革”在其形态上确有明显的区别，第一，二者的对象不同。“大跃进”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它是党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试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尝试。它的直接目的是“超英赶美”，并在此过程中企图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文革”则主要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它是基于党和毛泽东对国内和党内政治现状的错误判断基础上发生的，并由文化领域首先开始继而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之中，其目的是“反修防修”，以不断进行政治革命的方式，清除

所谓的“资产阶级”分子，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第二，基本特征不同。“大跃进”主要表现为一种对发展阶段的超越。即它不顾客观规律的制约，脱离中国国情，试图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向共产主义的阶段过渡，“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作”。①“文革”则是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强调的是巩固和加强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国家机器。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在君临一切的首要地位。

第三，直接理论基础不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以落后国家也可以“穷过渡”、一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为根据，而“文革”则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建立在阶级对抗这层之上为其出发点的。

第四，形态构成不同。前者的构成因素主要是浮夸、急躁、冒进、不适当地运用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等；而后者的构成却要复杂得多。它不仅包含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各种主观主义因素，还包含着因“文革”的发动而产生的其他因素，如无政府主义，一段时期内普遍的非理性暴力行为等等。

由于左倾错误在表现形态上的差异，因此，党和毛泽东虽然觉察到“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并在这种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面前，采取面对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了数年时间克服和纠正它，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左倾观点非但没有警觉，反而将其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坚持和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272页。

作为具有相同发展方向的错误倾向，这两种表现形态又有其共性的一面。这种共性更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

首先，两种表现形态都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所致，区别只在于具体领域和程度的不同。由于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现实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发动。其次，二者都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处于非常规运行的状态，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出现程度不同的失控和混乱现象。再次，它们都在一定的时期内赢得了亿万人的拥护，并曾成功地燃起了人们的热情，甚至使得一些社会成员产生了近乎于宗教般的狂热情绪。

于是，两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形态给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群众运动会构成左倾理论的基本方式？左倾理论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和煽动力，以致无数人拜倒其下？在本文最后两章中，将尝试着对这两个问题作一分析。第三个问题是，党和毛泽东何以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倾错误？这一问题的说明必须着眼于左倾理论在认识上的特征。

认识特征

1937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认识特征，他指出：“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作，离开了当前

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时隔近20年后，正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之际，毛泽东再次为“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②几个月后，他又一次重申：“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③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明确两点结论：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现实；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认识的超前。作为哲学概括的科学结论，它对于我们认识在社会主义时期以不同形态出现的左倾理论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对建国以来左倾错误、尤其是“文革”的透视说明，持续近20年的左的错误不仅有其时间上超前性认识的一面，而且具有自身的空间认识方式，并逐步形成其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

一、违反客观性，任意夸大或缩小事物的某一方面。

党在指导思想所以屡犯左倾错误，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在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对比上主观地夸大了某些因素和力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1—272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1953年10月11日）。

的作用，缩小或忽视了其他因素和力量的作用。

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就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急躁情绪。合作化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农业发展的必然，其主流和效果都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速度过快，侵犯中农利益以及违反互利自愿、强迫命令的现象。在一场大的历史运动中，发生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总结经验。1955年4月，针对上年出现的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指出，原定的发展计划过大，主要原因是对主观力量估计过高，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这一看法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但随后便被认为是右倾，把党内不同意见之争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原定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用4年便完成了，成绩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遗留问题。

1957年，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借党整风之际，乘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发起挑战和攻击。而许多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则是本着善意的态度，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也有一些人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发表了某些不适当的和过激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党本应客观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估计我国的阶级关系现状和力量对比，准确地区别和划分对党的攻击行为与善意批评之间的界限，以妥善解决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仅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敌对一方，而且还提出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标准。因此，反右运动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扩大化现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万人，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甄别，

其中98%以上属错划。

因此，我们看到，左倾错误在对形势、因素、力量的判断和估量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与政治思想领域内呈现出两种表面上相反的趋势。在经济发展领域包括生产关系中，左倾错误倾向于夸大主观、即自我一方的因素和力量，例如，过高地估计人的觉悟和思想的力量、社会主义生产发展速度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因素等。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则又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对立一方的因素和力量。即夸大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将党内不同的意见之争上纲上线，视为是“右倾”或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往往比实际程度更为严重。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判断是党在决策上的基本依据，当这种依据本身不准确时，在指导思想便必然会出现偏差。“大跃进”和“文革”这两种左倾错误表现形态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趋势。

党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下列估量和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的热情空前高涨，有着迫切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经济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冲天干劲；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生产上的跃进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迅速变革，而农村合作化已具备了向更高形式过渡的条件；共产主义因素的不断生成与发展，等等。在这种判断和估量中，所忽视的恰恰是经济发展第一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经济规律、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足、缺乏领导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需要一段巩固和完善的时间等因素。总之，对

各种有利的因素估计过高，对不利的因素估计不足。

在这种过分强调和夸大自身力量的趋势中，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认识特征，即它的着眼点是在未来，忽略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差异，以实现共产主义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为认识和决策的参照系。

发动“文革”的基本论点已如前所述，其基本依据是对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和作用的过分夸大，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正在产生并还将产生着资本主义势力的社会，把新时期的农民、知识分子等当成了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党内的各种意见之争和分歧均看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并将一大批干部当成了“走资派”，从而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控制和掌握了相当大的党政各级权力。在这种唯心的错误的阶级形势的估量的前提下，就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看成了现实存在的迫切危机，认为党变质、国变色的弥天大祸，已经迫在眉睫了。这是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党和毛泽东所忽视的恰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得到确立，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把剥削阶级的残余力量无限夸大，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普遍化和绝对化。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估计过高，而对有利的条件则估计不足。

它在认识上的鲜明特征就是着眼于过去，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内部所存在的旧社会的痕迹，非但否认这种旧的痕迹和影响在总体上是趋于缩小的趋势，反而进一步断定社会主义本身的某些构成，如按劳分配等，也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基础。

二、违反全面性，片面夸大事物的某一种形式。

左倾理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此即彼、只重斗争、进取，不讲统一、妥协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与机械唯物论相关，而且更多地与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有不解之缘。

被纳入这种思维方式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失去了辩证联系和后生生的发展的简单化世界，在这个被主观图解化了的世界中，事物的发展只呈现出两个极点，顾此则必然失彼。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强调速度则伴随着忽视甚至不讲效益，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则往往不顾客观规律的制约和现实可能性。而在政治领域中，非敌即友，用单一的阶级性取代了人的全部属性，把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与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在社会发展中，则表现为把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视为决定性的因素，把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仅仅看作是被动的因素，所以不得不借助于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教条主义的发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拘泥于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和观点，不加分析地以此来剪裁现实生活，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活的灵魂，因而其所制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必然是脱离实际的。因此，人们一般地把教条主义与左倾认识联系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建国以来这两次较为典型的左倾错误的表现形态而言，“我们所犯的错误更多地是在‘创造性发展’的名义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依据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找到理论渊源吗？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了”。^①事实确实如此。严格地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与空想和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有关。毛泽东曾把“超越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左”的一般认识特征，而这种“超前性”所表现的只是人们在理论上对未来阶段一般原则的勾画和设想，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超前”，硬要把未来的一般原则在现阶段去实现，那么其实际效果和作用非但不是“超前”，反而是“滞后”，因而至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另一方面，那种“只要想到就能干到”的唯意志论在左倾思维方式中表现的十分醒目突出。毛泽东所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就是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而在极左思潮泛滥之下，这种思想方法被推向了极端。林彪堪为其典型代表。早在1960年，他就提出：“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思想能够起这样的作用。”^②这就是林彪的“突出政治”。而这种赤裸裸的唯意志论在当时居然还颇有市场。林彪垮台后，他的这套观点受到了批判，但“四人帮”则变换形式依然坚持，1972年，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③这种“精神万能论”给整个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破坏后果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倒是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以较为隐晦形式反映出来的“意志决定论”的观点和行为并不乏

① 金春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启示》，载《理论动态》第701期。

② 引自1960年10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③ 张春桥1972年在5703厂的一次讲话。转引自《“四人帮”反动世界观材料辑编》，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资料组编。

见。要彻底清除左倾理论的影响，就必须自觉克服和纠正以主观意志取代社会现实的各种倾向。

三、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宁左勿右”。

如果说认识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与失误导致了党在理论上的左倾错误的发生，那么在20余年中屡屡发生的左倾错误中形成并不断得到加强的“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维定势，是左倾错误长时间持续并得到普遍贯彻的重要认识原因。“宁左勿右”便是人们这种思维定势的集中体现。

这一思维定势首先是由党内政治斗争逻辑导致的实际结果所造成的。这一党内政治斗争的逻辑是：右倾是比左倾更为危险的思想倾向。其实际结果是那些被视为右倾的干部和党员所受到的打击比犯左倾错误的要更为沉重，在政治上也更难再翻身。从建国以来党内历次运动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以反对右倾为目的而发动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是对所谓右倾的不断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屡犯左的错误，而且持续的时间愈来愈长，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党内所反对的右倾恰恰是正确意见的反映。例如，1956年所批判的“反冒进”，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判等等。另一方面，那些被视为右倾代表的人则往往因言获罪，轻则受到批判，在政治上不受信任，重则革职，受到查办，而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在这种“左”的政治空气中，“宁左勿右”成为相当一批干部在决策或执行决策时的一种心态。很少见到因犯左倾错误而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事例。

其次，这种思维定势与把道德判断引入对左和右倾的评

价中有关。1957年，毛泽东说道：“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真正的教条主义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①不管毛泽东本意如何，他的这一看法实际是把左、右倾这一思想方法问题与动机和立场联系起来看待。肯定了左倾的立场和出发点是“要革命”，而右倾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因而是革命的。以动机的善恶来判断左、右倾的是非，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党内又有谁不想革命呢？但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上，因“左”是要革命的而比右“好”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从思想方法看，二者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从历史实践看，二者都曾给中国革命造成过重大的损失。

第三，“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势又与我们党对国际共运的形势判断有着直接的联系。1956年的波匈事件使得党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警惕来自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60年代开始的“反修”大论战又进一步使得党把“修正主义”视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理论透视下的国内局势似乎又印证了这一点，至此，警惕和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成为压

^①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

倒一切的考虑。

毛泽东早年曾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①60年代后，时过境迁，他似乎已不再认为有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了。他集中了自己全部智慧和力量向着他所认为的修正主义发动了进攻。一位政治学家曾断言：“政治意识形态一旦在政治体系中被广泛接受，领导人本身也就成了它的囚徒。如果他们违反其准则，就会冒毁坏自己的合法性的危险。”^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其晚年同样也陷于自己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束缚之中。而当这种理论成为亿万人所普遍信奉的理论原则和价值准则，并以极大的热情来实践它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了自省和纠正这一错误理论的可能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6页。

②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三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 曲折认识的关系

建国以来，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用什么方式建设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大起大落的经济的发展，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我们不得不常常反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似乎都与我们在特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1987年，邓小平指出：“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38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在摸索之中。”^①事实确实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发动起来、意在解决用何种手段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场实践。但是，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再加上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所搞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使中国社会主义几陷于绝境。因此，当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完全归结为在理论外衣下进行的权力斗争时，他们所忽视的恰恰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5页。

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包括权力斗争）的外衣下所包含的党内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壮举，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则更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无怪乎西方有人曾预言：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他们获得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获得胜利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灭亡之日。^①在某些西方思想家看来，革命的通常模式是：革命者一旦成为统治者之后，革命便寿终正寝。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将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曾允诺的要创立一个崭新社会的理想。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抑或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都与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而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它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主义本身的乌托邦性质。即使不考虑其立场和出发点，这种观点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却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种状况除其历史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搞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明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科学地指明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并且有苏联数十年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暗者，如何处理马克思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即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极端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前者使我们在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的

^① [美]罗伯特·米歇尔，《极权》，纽约自由出版社1949年版，第391页。

基本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后者使我们常陷入摸索、彷徨、反复和挫折之中。所以，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我们所以不能“理直气壮”，正是因为在这近20年的时间中，我们非但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相反，在心理上却有一种对生产力发展的难以名状的忧虑之感；在思想方法上把物质财富的丰富与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的提高视为难以和谐发展的两极；在指导思想上把单一的上层建筑革命当作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手段，不言而喻，这正是左倾理论的考虑。总之，我们虽然摧毁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面对着被解放了的生产力，在一个时期内却陷于一种既优于经济的落后水平从而需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又优于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所可能造成的精神恶果的二难选择境况。这种思维逻辑似乎不可理解，但它却是一段时间内党内决策层的真实想法。“文革”极左思潮下所泛滥的那些假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决策层在对待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与失误所招致的结果之一。剖析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得失及在极左思潮下的那些虚假社会主义观念，对于我们理解“文革”的发动与进行，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有着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3页。

理论沿革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在谈到“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的历史原因时，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回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沿革，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论断的进一步认识。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运行的分析和批判中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1）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私有制；（2）国家从暴力机关逐渐变为具有管理职能的社会机构，社会与国家的分裂和对立将不复存在；（3）个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劳动的两重性业已消失；（4）社会的经济运行由一个社会中心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和管理，社会生产已不再是商品生产，因而它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5）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由于它默认每个人天赋的不同，因此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实行按劳分配，通行的是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不同形式的等量劳动交换。

显然，马克思的设想与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由多种复杂原因决定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既然是根据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况，来判断未来社会的特征，那末，他所判断的这个社会也就只能以纯粹的形态存在。……按照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同实际事物的全部丰富内容相比，不能不存在很大的差距”。①

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转变为现实需要中间环节，即需要把这种“纯粹形态的存在”具体化为可直接操作的理论，列宁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列宁的理论与苏联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一起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蓝本。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分为两个相互衔接又不尽相同的部分：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②，在经济上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以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在政治上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些思想的实施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时间的推移使其弊端日渐明显，以至于在不到4年时间里便使苏维埃陷入列宁所说的“最大政治危机”之中。列宁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从1921年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作了这样的概括：“准备向共产主义

① 张式谷：《在改革大潮中的反思》，载《求是》1988年第3期。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1页。

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依靠热情，而是……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① 围绕着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与货币关系，允许自由贸易、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与资本主义建立“共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官僚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它的民主理应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他还十分强调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强调继承和发扬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认为舍此则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世纪初的主导思想与实践。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主要方面实践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偏差，给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蒙上了某些不祥的阴影。例如，靠强制剥夺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积累，政治上肃反的严重扩大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分歧视为敌人的阴谋和破坏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斯大林时代，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国家对社会经济全面严格的控制成为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这一模式。

建国之初，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是国家工业化、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这一思路出发，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除了某些作法过急外，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23页。

但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分歧集中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与过渡时期的划分两个问题上，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国内阶级状况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事实，明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并正确地、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任务，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仅正式修改了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而且对党关于过渡时期的界限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完成为止的观点进行了修改，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均为过渡时期，并将此作为把阶级斗争视为主要矛盾的历史阶段的依据。这种理论不但模糊了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而且还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应具有的相对确定形态，使得对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不断进行革命的理论成为题中之义。阶级斗争的步步升级也因此而具有了逻辑必然性。

然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正并没有使我们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解。60年代使我们与苏联“修正主义”分道扬镳的不在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和手段巩固和发展这种体制模式。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不同在于，斯大林认为，技术和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则认为，阶级斗争和群众决定一切。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双重的偏差：一方面，对体制本身的弊端缺乏

认识，另一方面，又人为地把工作重心从经济发展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不得不进行双重变革（首先是拨乱反正、转移工作重心，然后才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原因。

尽管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党和毛泽东曾有过种种偏差与失误，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曲折的探索并没有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唯一选择，同时也因为党和毛泽东本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即使是在“文革”这样的全面内乱中，虽历万般磨难，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依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还在进行。分析“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时的各种社会主义观念，必须以这样的前提为基本出发点。从而既不因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而对社会主义本身加以非难，也不会因毛泽东偏执于某种信念发动“文革”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文革”的发动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直是毛泽东萦绕于怀的中心问题。面对着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他殚精竭虑，苦苦求索，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及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等原因，他

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解出现了失误，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艰辛的探索提供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依据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用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广大农民通过一系列过渡形式走向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此后，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此外，他多次告诫人们在建设中要注意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克服主观任意性。并强调了商品经济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必然性。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考虑是围绕着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展开的，为此，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达到的近期和长远的目标及其时间限度，都曾作过一些具体和富有启发性的设想。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十分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是不行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些思想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

础。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大理论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这种矛盾已不具有对抗性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加以调节。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据此，他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并明确表示，这样作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即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然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50年代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几乎是一个未知领域。在放弃了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开始试图创出一条建设新路——找出一条高速发展的捷径，但是，欲速则不达，急躁冒进的“大跃进”使得党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波兰、匈牙利事件及国内的“反右”斗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1953年，在重印自己在1952年写的《中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部分接语时，毛泽东反省和修改了当时的观点，他写道，接语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

样说是不妥当。应该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①而在上一年，即1957年，他就已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观点，并号召要进行一场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革命。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观点，日益增加的危机感使他步入理论上的迷途。他开始对现行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方针产生了疑虑。他面临的困惑是靠什么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会给人精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用物质利益的刺激来发展经济，如果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导致人的精神的退化，那么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1964年4月，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搞民主革命，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胜利了14年，我们又重新掀起社会主义教育。现在情况好了一些。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地是指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

对国内和党内形势的错误的悲观判断，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决心。1964年7月在与毛远新的谈

^① 毛泽东关于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的说明，1956年3月19日。

话中，他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其后不久，他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至此，毛泽东已感到了将他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面临的危险及自己解决问题的政治主张加于全党和全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山雨欲来，一场暴风雨般的社会动荡已呼之欲出，虽然它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但它的基本原则已被规定好了，需要的只是时机。

“文革”的发动，是基于毛泽东关于党内形成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但是，形成这一判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源自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客观地说，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赞成的，并积极参加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但是，1961年，他到农村搞调研，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认识便有了改变。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缺点造成的，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1959年，毛泽东曾表示过要为捍卫三面红旗不惜准备同全世界作战的决心。因此，他认为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其次，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和方针不满意，认为是搞了

资本主义。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在第二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重申了对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斯诺在1970年与毛泽东交谈之后对分歧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①这显然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在毛泽东看来，分歧涉及到的是有关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如何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等一系列原则问题，而在被认为是原则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于是，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以期彻底地解决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端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构思日渐清晰。毛泽东决心已定，依靠“文革”的方式来贯彻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考虑。

毛泽东曾十分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

^① 《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5页。

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是，当他认为制度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制度以外的解决方式——尤其是当他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不同意见分歧视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之际。

因此，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党内分歧，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深刻的基本原因。

“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观念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有着其基本的确定涵义，即是作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和按劳分配为本质特征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本质规定非但不排斥社会主义自身内在的丰富多样性，反而以最宏大的气势将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吸收融合在自己的体系内，从而使自己具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比拟的潜在优越性。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不但是一个内容最为丰富的观念思想体系，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着巨大回旋余地的社会实践领域。这样，才有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制度下的不同实践，从国情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解，并据这种理解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所以，在实践中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其矛盾发展是社会主义观念不断完善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人们已普遍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情况下，那些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的或封建半封

建的)的思想观念假社会主义之名而出现的情况,例如,“文革”中“四人帮”所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那么林彪、“四人帮”等所鼓吹的那一套则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利用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把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愚昧强加于社会主义观念之上,然后对民众说,瞧,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有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败坏和践踏社会主义的声誉。这恰恰为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提供了口实,他们正是据此写文章的。因此,在“文革”中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与公开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值得欣慰的是,极左思潮下的假社会主义观念虽然盛行一时,但终未能在斗争的最后结局中占据上风。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虽然犯有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但他在总体上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方向的。另一方面,也因为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于人民群众心中,始终保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广大群众正是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对比中,才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更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四·五”运动的真正群众基础便在于此。

因此,“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观念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邓小平所积极贯彻实施的以“四化”为核心的、反映着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主义观

念，第二种是属于因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的或不准确的概念，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非商品经济的和官房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第三种是“四人帮”所鼓吹的“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观念。这里将主要分析后两种观念。

一、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

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是一个现实。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是积极的发展它还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它，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1958年11月，针对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的左倾观点，毛泽东批评说：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实现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反客观规律的。他还进一步提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①但是，他同时又对商品经济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估计不足，在同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虽然再次批评了否定商品生产的看法，却又提出：商品时期搞个30年，少则搞上15年。此外，在理论上，毛泽东并没有把商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特征之一，而是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遗迹，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因而必须限制它。这一思想在“文革”后期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他对于用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手段之一，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随着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他日益把由商品经济所决定的利

^① 参见毛泽东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益原则看作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所以，在“文革”中，商品经济观念遭到全盘否定，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得以盛行。主要表现为下述五点：第一，把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不相容的两极，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后者是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凡是沾上“商”字的东西都受到人们观念上的贬抑。甚至农民的自由市场也因被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而被取缔，使得我们本来就不发达的商品生产更为落后，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第二，在政治统帅经济的思想下，忽视或否认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强调一切经济发展和生产需要均首先要服从政治上的考虑。这样，不但国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生产数量全凭国家计划来决定，而且计划本身又无条件地服从政治上的需要，当这种政治需要脱离了客观实际，甚至完全是一种主观产物时，势必给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第三，商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学管理完全被当作资本主义的“管、卡、压”而受批判。战争年代的军事性和指令性的管理方法及群众运动成为维持生产发展的经常性手段。第四，商品经济中的物质利益原则被否定，把用阶级斗争方式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当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结果造成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不断下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后，在分配领域中，公平的原则（甚至是平均主义）完全取代了效率的原则。按劳分配成为徒有其名的分配原则。

1975年，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商品经济的深切忧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

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四人帮”不失时机地接过毛泽东这种观点。在由“四人帮”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就把非商品经济的观念推到了极端，使其服务于打倒党内各级干部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从对商品经济认识不足，到否定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直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这种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成本、价格、利润和银行信贷等一系列调节和促进社会生产的有效手段被弃之不用，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侵害，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不得不维持在最低的必要限度内，造成了国民经济陷于停滞的境地。

然而，“文革”中用来限制甚至试图取代商品经济的却是比商品经济更为落后的自然经济模式。一般来说，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两个一般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关系的存在。在不可能直接取消所有制差别的情况下，毛泽东试图从缩小社会分工的差别的角度来实现他克服自己心目中的商品经济弊端的愿望。他在“文革”初所提出的“五·七”指示的构想及其在“文革”中的实施便说明了这一点。

① 见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二、营房式的社会主义观念。

“营房式”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时，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观念进行分析批判时提出来的，他们以此来形容那种主张以小生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带有军事集体化和平均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他们有时又将这种社会主义称为“粗陋的”或“禁欲主义”的。借用这一概念，正是因为“文革”中我们又看到了类似观念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文革”中的营房式社会主义观念是指以组织形式准军事化、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思想、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观念。这一观念得以流行并在一定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与对商品经济的轻视乃至畏惧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实，这种观念在人民公社化期间就曾一度盛行过。1958年，毛泽东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在其后一段时间内的过渡狂热中，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一切又伴随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平均主义的作法。它留给人们的思索之一是，为什么不久前还是分散经营、在观念上最为保守的个体农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接受”了如此激进的过渡形式及其具体作法（至少在其危害暴露之前）？显然，仅仅用思想觉悟来解释是不够的，它至少是因为这种最为激进的观念与小生产的心态在某些方面“一拍即合”。这一点在我们理解“文革”中的营房式社会主义观念时应给予充分的注意。

营房式社会主义观念最为突出的外在形式是社会准军事化现象的普遍化。红卫兵是这一状况最早的体现，从名称到服

饰。从语言到组织形式和社会职能，解放军成了他们极力要模仿的对象。这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的反映。人民解放军以其在创建和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所建树的功勋及与人民形成的鱼水情，以其培养出以雷锋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同时也以其在60年代后在政治上的表率，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因此，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批写在解放军经验材料之上并非偶然。“五·七”指示所代表的理想社会模式的立足点是组织形式的准军事化。作为这一指示直接产物的“五·七”干校的连、排、班组织形式便反映了这一点。但其影响并不限于此。在“文革”中，许多企业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也纷纷采用了类似的组织形式，例如石油工业会战中的总部、分指挥部、连（队）、班式的组织结构、工厂基层车间的党支书改称“指导员”等。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长处是“便于管理”，即对社会各部门的管理无须经过众多职能部门的中介作用，而依据于垂直的行政命令。显然，这是沿袭了我们在战争年代的管理经验所产生的。它忽视了社会主义时期复杂的社会分工所要求的相应科学管理组织结构，把简单化的管理作为选择组织形式的出发点，是远比形式上的准军事化更为本质的东西。“文革”中十分普遍的对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垂直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便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思想是这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又一特征。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都是一个“自给自足”式的小社会，不但要承担其社会分工的职能，而且还要负担员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谓“小而全、大而全”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这种现象具有其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和条件，并且不独“文革”

中才存在。它本来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弱化，然而，“文革”所提倡的各行各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建设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使这种现象片面畸形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社会被作为一个层层封闭型的实体，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沟通，社会急需的物质产品极端短缺，而社会的长线产品却不断重复生产，人为地制造了极大的浪费。现代化生产发展所必需的细密严格的社会分工受到了强制性的扼制。然而，这还仅仅是就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言。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不可能不作用于社会的其他领域。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方面是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个体经济，另一方面，则是与此同步历数千年之久的高度的封建集权的政治制度，二者有着确定不移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主义虽然同时消灭了这两种现象，但并没有彻底根除它的残余影响。因此，当我们试图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去取代商品经济时，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必然地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否则社会就存在着潜在的失控危险。这一点并不需要决策者的自觉意识，而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文革”中我国政治控制的弊端达到顶点，与这种封闭式的自然经济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均主义是这种营房式社会主义最为典型的特征。它在“文革”中影响极广。“文革”所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所谓的新生事物，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平均主义的痕迹。“文革”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但是，它所赖以实现这一目的途径，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用各种努力去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

是采取经济上“均贫富”、文化上拉高就低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社会分工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当然适得其反。^①

除了平均主义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外，更重要的是，平均主义是动员尚未完全摆脱小生产意识的社会有关阶层和成员（如农民等）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因此，当我们把人民公社化时农民最初的踊跃行为，把“文革”初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都视为“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的体现时，更应当看到的却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动员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当然，这里已不单纯是局限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而且还包括着社会地位、文化、政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的平均主义。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在前面提到的为什么生性保守的农民却会接受最激进的社会过渡形式这一问题。

总之，普岗式社会主义观念是一种建立在低生产发展水平上的、带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社会主张，它在“文革”中的部分实施，延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起了强化作用。

三、以贫穷、愚昧为核心的假社会主义观念。

今天，几乎已不用再费笔墨来分析这种观念的荒谬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早已成为人们的最基本的共识。但恰恰就是这么荒唐的观念在“文革”中却有人在那里说，当然，也有人跟着信。

^① 关于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参见王稼林：《五·七指示初探》，载《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唐立：《“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革命胜利的经历使得毛泽东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越穷越要革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①在建国后不久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这一观点曾对鼓舞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毛泽东逐渐地把“穷则革命”与“富则修”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来考虑。“四人帮”正是将毛泽东这一理论偏差推向极端，泡制出了“穷”的社会主义观念。

应该指出，对毛泽东来说，“穷”只具有一种手段和动力上的意义，他从未把穷作为一种目的范畴来使用。他的理想蓝图是建立一个既繁荣富强，又不“变修”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所顾忌的只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的前车之鉴使他把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当作了“变修”的基本原因，因此，他作出的选择是首先防止“修正主义”上台，经济发展的考虑则不得不退居其后。

但是，在“四人帮”所鼓吹的这种假社会主义的观念中，“穷”并非只是一种手段和动力，而是社会主义所必然伴随的基本特征。这方面他们主要的观点是，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可以取代经济生产的发展，即“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阶级斗争可以以牺牲社会经济为代价。这就是所谓“宁可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也即张春桥所说的“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把“穷”和“富”直接对应于社会主义和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

本主义，这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总之，卫星上天则红旗必然落地。他们正是以这样一些荒唐的“理论”、荒唐的逻辑为武器，大批“唯生产力论”，反击所谓“右倾翻案”，直到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糕，把社会主义搞得名声扫地。

对此，邓小平指出，“从1958年到1979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①

“文革”中流行的这些社会主义观念，虽然在性质、作用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不符合或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因而其社会效果也是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综上所述，左倾理论的发生发展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是同步发生的，“文革”得以发动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被当作“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泛滥又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因此，经验和教训昭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首先必须立足于国情，并能完整准确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4页。

四 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最能够典型地反映极左思潮社会行为特征的莫过于“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泛滥。极左思潮的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这种形式反映和加以推行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虽然非自“文革”始，但若无极左思潮的发行也决无如此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文革”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之一便是“天下大乱”，而且并不仅仅是乱了“敌人”，连自己也方寸大乱。一方面是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民众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是纲常俱废，法纪无存，社会处于无权威，无规范的状况，强烈的反差映衬出在特定时期内同一民族性格的两面：对绝对权威的无限崇拜和对正常权威的绝对否定。

确实，“文革”无政府主义为害之烈使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的再生。“无法无天”被视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语，“不要再搞‘文革’那套无政府主义”成为长者们经常告诫躁动后辈的谆谆之言。

然而，即使是在“文革”中，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声名狼藉的思潮，更不要说获得任何合法性的认可。自“文革”开始后不久，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声潮中，批判无政府主

义的文章或言论便不时见诸于报端，包括那些后来被认为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祸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要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指示”。并且越是在混乱的局势下这种批判的调门就越高，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曾以《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桥梁》的赫然标题发表社论，其上纲之高恐今人也难望其项背，但是，在“文革”之初几年中，无政府主义的扩张之势并未因对它的声讨而有所收敛。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对民众有着特殊的诱惑力，而是因为在“造反有理”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这正是“文革”所陷入的困境。“文革”既已发动，便产生了自身的发展逻辑，使它难以受到人们主观愿望的控制，周恩来很早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67年1月，他说，这一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它按照它自己的革命发展规律前进。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不住它，（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主观愿望想按自己设想的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进行也束缚不了”。^①而无政府主义正是维系这种“规律”的重要一环，因为在我们现在所谈的“文革”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中，已包含了那些导致天下大乱的所有基本因素。所以，“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单纯是“无法无天”，在这一现象背后，它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和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不同的时期和国别中，它的理论主张和形态也并不完全相同。历史的简要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从一种具有确定观念形态和政治主张的思潮逐渐演变为一种理论和行为载体，任何对现存

^① 1967年1月25日在北京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

政治经济秩序不满的学说或主张都可以使用这种载体为自己服务。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嬗变

任何学说或思潮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和任何国家形式的思潮，作为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1844年，德国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施蒂纳发表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称“除我以外，一无所有”，该书被后人称为无政府主义宣言。其后又相继产生了蒲鲁东的以建立小私有者社会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主张的绝对自由的社会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及在东方各国有较大影响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些人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其理论基础和主要政治观点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如何看待国家和权威问题。

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否定权威的意义，是无政府主义基本的政治观点。在无政府主义看来，国家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任何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都意味着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权形式，如果还存在着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

这种政治观点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基础：任何国家政权都不可避免的是少数人在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裁专制。因此，不是资本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国家的恩赐才使资本家拥有了资本。凡不能立即使无产阶级

获得解放的任何政治斗争即是对国家制度的承认，无产阶级不应从事政治斗争，而应马上摧毁和废除国家政权与政治制度。

他们同样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巴枯宁说：“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最后都要得到同样的最悲惨的结论：特权的少数人管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他们不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自己和他们对管理人民的要求。”^①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一切奴役、祸害和堕落的根源。此外，从否定国家和政权出发，他们进而否定一切权威。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和专政形式。列宁也指出：“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②同时，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指出了未来国家消灭的必然性和前提条件，即当“国家终于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③

无政府主义虽然一致地反对国家与权威，但他们心目中的未来社会大相径庭。蒲鲁东主张建立一个私有者的社

^① 《巴枯宁全集》第2卷，21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社会，这个社会通过建立“人民银行”消灭剥削现象，其特征是“贫乏”和绝对平等的分配，因为贫乏可以保持社会的平衡，而富裕则刺激人的贪欲，使人堕落腐化。在政治上，则是没有任何权威的个人绝对自由。巴枯宁的理想社会是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绝对自治的自由社会。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则以人的互助本能为根据，构想出一个没有任何差别和社会分工的大同境界。

无政府主义最重要也是其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是其为实现自己的主张鼓吹使用的手段。他们最为推崇和提倡的是所谓群众的革命自发性，把纯粹的破坏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基本方式。巴枯宁把流氓无产阶级视为举行暴动的主要力量，因为这是一个赤贫和绝望的阶级，他鼓吹说，“没有广泛和热情的破坏，没有起拯救作用和富有成效的破坏，就不可能有革命”。而克鲁泡特金则坚信，群众具有本能的革命精神，无组织无领导的自发暴动便是革命的真义，“除了无政府以外，根本就没有革命这回事”。总之，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造下英雄式的全面破坏行为，而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在许多国家中的暗杀和恐怖行为，正是他们这种主张的实践特征。因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①

本世纪初叶，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它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之一。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最早出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是留日学生刘师培等人，他们在日本创办了《天义报》（后迁回上海），宣传介绍这股思潮，其后有由张静江创刊、吴稚晖等人撰稿的《新世纪》。辛亥革命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这些刊物或团体除一般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基本主张外，还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特征。

首先，他们一方面把国学中的虚无主义和出世思想融入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又以这股思潮激烈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抨击纲常名教，提倡破除迷信，尊今薄古。例如《新世纪》倡导进行“三纲革命”和“祖宗革命”，并具体指出了进行这种革命的途径。此外，他们往往在借儒家经典和依附古人来宣传自己主张的同时，又将古代文化遗产一律斥为“陈迹”，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其次，把中国传统的小生产平均主义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结合起来。即所谓“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既无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还有人提出“均力主义”的治世方案，即“以一人而兼众艺之谓也”，“若依此法，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人人做工，人人务农，人人务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耶？”^①

再次，对于本世纪初到处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无政府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他们强烈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情绪。他们充分地利用了无政府主

^① 《辛亥革命十年间讨论丛集》第2卷上册，第997—913页。

义对国家和政权的否定态度，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腐败的清王朝。因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人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思潮的非科学性，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它的影响便日趋衰弱了。

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在中国得到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除外部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它适应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大批农民和小私有者破产。他们对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感到恐惧和憎恨，他们强烈要求平均财产、铲除强权、废除阶级，期望建立一个小私有制的理想社会。此外，在漫长的封建集权统治下，中国人民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而本世纪初中国政局的极端黑暗和动荡使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消极情绪，加上老庄思想学说的长期影响，使他们把毁灭视为再生，从而与无政府主义产生共鸣。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游民式的破坏心态更是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极端手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潮已逐渐为社会所抛弃。但是，只要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尚未根除，它就依然存在着复活或是再生的条件。所以，在一个有着浓厚小生产者意识的传统、经济文化又十分不发达的国度中，那种对一个绝对平均、绝对自由的社会乌托邦憧憬、那种把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是不平等的邪恶产物因而必欲毁之而后快的破坏性心态，依然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威胁。这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已完全失去了其在对剥削制度的批判时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蜕变为一种工具和载体，

任何反社会的理论都有可能利用它来作为实现自己目的一种宣泄手段。

“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膨胀的根源

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种现实性。在我国，虽然存在着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社会因素，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出现个别地方或单位的无政府状态，但这决不意味着会随时产生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的大规模无政府主义思潮。尤其是在我们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情况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十分稳定，国泰民安，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想象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在“文革”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党在理论上的指导思想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的盛行，使得无政府主义这种在我国已近于死灭的东西复燃。所以，除其社会历史因素外，导致无政府主义全面泛滥的直接根源，必须从“文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去寻找和说明。

一、“文革”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为以无政府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

“文革”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在逻辑上显然是不成立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所剩只是其残余，无需进行一场政治大革命。硬性进行这样的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模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阵线，导致混乱的盲目“革命”。理论上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承认我国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所以“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①另一方面，又强调只有“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②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是“文革”实践的陷阱。

既然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其核心问题当然是政权问题。那么夺回“被篡夺”的权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便有这样一说，“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③而且是发动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进而，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自然把人们引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不能现成地接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它以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教诲。一篇指导夺权斗争的理论文章便明确说道：被“走资派”盘据的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而为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④然而，如何“打碎”、用什么样“新形式”的国家机器予以代替，却是这种理论无法回答的。理论上的含混与矛盾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夺权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全国性的，不仅是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而且是夺各级领导机构的权。而夺权方式也变成一种极端简单化的模式操作：占领权力驻地，批斗一番走资派，换上大印，然后召集大会宣布权力的转移。当然，最后少不了的是还须“上级机关的批准”。在

① 《红旗》1967年第4期社论。

②③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社论。

④ 《红旗》1967年第3期社论。

这种状况下，不可能不出现“打倒一切”的思潮和政治行为，而“打倒一切”在今天看来正是“文革”无政府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显然，“全面夺权”的理论号召与“打倒一切”的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事实上，“文革”的各项论点本身及其采取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场全面的社会动荡。倘若不是要采取这种“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式，就不会有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倘若不是“造反有理”，就断然不会有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倘若不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则也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夺权斗争，等等。这并不是说，左倾理论必然地产生无政府主义，而是说，错误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判断为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泛滥提供了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完全变为现实的，既有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作用，有群众运动自身的弊端所致，同时也有因权力机构受冲击而不能正常行使其职能所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的反馈作用等。

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得各种社会势力都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于政治野心迅速膨胀起来的林彪、江青等人来说，控制和掌握对“文革”的领导权，是实现他们登上权力最高阶梯并巩固既得利益的保障。然而，党内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考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党的各级机构，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最大障碍。因此，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炮制打倒一切的理论根据，假群众之名义使党组织陷于瘫痪，是他们的基本策略，而在这一方面，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法。

首先，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解释“文革”所要解决的矛盾和达到的目的。1960年12月3日，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党、全国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同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说：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批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张春桥则说得更直截了当：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朝换代。所以，他们把左倾理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具体化为“当权派与非当权派”的矛盾，并进一步声称，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就是“复辟势力和革新势力的矛盾”。^①并且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斥为“旧政府”。^②应该说，在这种理论宣传中，他们充分地利用了现实存在着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充分地利用了小生产追求的浅层和狭隘的“平等”观念的心态以及由于社会分工不同造成的阶层之间的隔阂心理，赢得了一些人的狂热追随，甚至于国外一些人也曾一度将他们视为是反对保守的官僚体制和结构的激进主义代表。

其次，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碎“旧国家机器”，从而“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1967年1月的上海夺权，便是这种政治主张的一次实践。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设计，夺权之后建立了“新上海公社”，后正式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以示与上海原党政权力机构的“空质”区别。其后，因毛泽东认为这一名称涉及到国家体制等诸多复杂问

^① 参见1977年5月19日《解放军报》。

^② 参见1977年3月15日《光明日报》。

题，遂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夺权是经中央批准，不属非法，^①因而其影响才更为严重。其后，张春桥更不断地发挥他关于踢开党委的“公社”思想。1967年，他就放出政治空气，现在的党组织“不能依靠”，“党要改造”，“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1968年1月，他提出，“党究竟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1969年，他又提出了一个“改造党”的方案：中央“设革命委员会，下边设几个人办理党务”；上海以“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基层“造反派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让造反派来发挥党支部的作用”。^②用造反派组织来取代党组织的作用，这就是当时普遍造反行为的政治含义。因此，王洪文判断形势就是以对党组织的破坏程度为标准：“哪里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哪里的形势就不好”。^③

第三，从上述政治主张出发，他们唯恐天下乱得不够。江青说：“乱就是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乱是绝对的”。姚文元则引经据典从历史上找根据：“中国近代史上詹大悲说：‘大乱者，治国之良药也。’”^④

而“乱”只是为了打倒各级党委和干部。所以，他们对各级党委采取“能打倒就打倒，打不倒的就打跑，打不跑的就搞臭，搞下臭的就搞乱”的手法；对干部则是“要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就动

^① 关于上海一月夺权的性质分析，参见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

^② 参见197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③ 参见1976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④ 1974年1月14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手把权夺过来”。

最后，假群众运动之手实现其政治野心。为此，他们不惜极力奉扬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林彪就声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标志，也变成了“如何对待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之，则是所谓“资反路线”。这当然不是出于对群众的信任，只要看一看他们后来是如何挑动群众斗群众，如何把群众视为“群氓”就是以明了。事实表明，他们在极力把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的广大民众的情緒引向打倒一切的方向中，所充分利用的正是民众愚昧、落后和破坏性的一面。

三、还应当看到，在极左思潮的作用下，缺乏约束、摆脱了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本身也会产生无政府的状态。除了那些明文规定的“文革对象”和“黑五类”外，“文革”几乎赋予所有人以造反的权利。其实，即使是所谓的“敌人”，也可以“反戈一击”地加入造反的行列。以中国之大，“群众”的构成成份之复杂，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发生什么样的倾向和事情都是可能的。在“文革”中，扯起旗来造反并非难事，只要声称自己是在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那么在行动上就具有了极大的自由度。所以，“文革”中既有十万、百万之众的造反兵团、司令部，亦有三、五个

^① 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的战斗队。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思想指导下，造反行为从一开始就集中针对党政各级权力机构，而造反是否彻底、是否达到目的的基本标志，恰恰是这些权力机构是否还能运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各造反组织通用的战斗口号，为此，他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把自己心目中的走资派“拉下马”。在这种状况下，就其所产生的社会结果而言，造反行为与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打砸抢抄抓”等纯粹破坏性行为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已。权威、制度、法纪和纪律都不得不服从于“斗争大方向”，善意的规劝、强制性的约束，都会被扣上“压制群众运动”的帽子。

派性斗争的恶性膨胀，是“文革”群众运动呈现无政府状态的又一种主要表现。群雄并起的造反组织围绕着“保”与“革”和权力争夺展开角逐，互不相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是群众组织的普遍心态，谁都想说了算，谁又都说了不算。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即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全面完成以后，虽然党的组织得到了“重建”和恢复，各级行政部门也开始重新行使管理权，但是，派性斗争却一直是社会维持稳定的主要障碍之一。而“四人帮”一直有意识地煽动和操纵派性斗争，是派性在“文革”中无法根绝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文革”中，每当政治气候稍有变化，派性便明显发作。如果说“文革”前期无政府主义主要表现为“打倒一切”的造反行为，那么“文革”后期则主要表现为派性斗争。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派性的危害暴露得最为充分。

四、造反与夺权使得各级党政机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行使其职能，甚至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从而出现了某种形式的上“权力真空”，这种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现象。

“文革”之始，虽然各级党政机构都受到冲击，多数干部被揪斗，但由于这些机构本身还有着存在的合法性，所以还勉强行使着职能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夺权之风一开，受到冲击的就不仅仅是干部个人，而是整个权力机构，而“文革”本身又从上层建筑领域扩大到经济生产领域，更是给整个局势雪上加霜。这样，一方面是权力机构运转不灵，另一方面又是大批工农劳动者纷纷投身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局面。以经济领域为例，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指挥和管理系统基本上瘫痪，国民经济生产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国的经济领导工作实际是只由周恩来等中央少数负责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大批企业停工停产，工人纷纷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权力机构的失控，使得夺权的两年期间（1967—1968）成为“文革”时国民经济受到最严重破坏的两年，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在此基础上下降了4.2%，仅为1966年的86.6%，除粮食产量大体持平外，其余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大幅度下降。直到夺权任务全部结束、各省市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后，整个混乱局势才稍稍得到扭转，国民经济的情况也趋于好转，以1969年为例，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68年增长了23.8%，比1966年增长7.2%。这一事实说明，只要权力机

构不出现失控现象，那么即使出现社会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其危害也可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例如1956年下半年的情况；相反，若出现权力的“真空”或“半真空”现象，则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便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如果不是党在理论判断上的失误，不是林彪、“四人帮”的煽动和对群众运动自发性的放任，那么无政府主义就难以膨胀到这样的规模。但是，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在“文革”中也曾受到过系统的“批判”，把它的泛滥与对它的批判略加对比，会进一步加深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文革”时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及其政治含义

在“文革”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发生在1967年初到1968年初，即“全面夺权”时期；另一次是197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对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它发生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整顿”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周恩来这种努力的继续。显然，这两次批判的背景不同，其政治含义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1967年伊始，上海“工总司”等组织率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随后，夺权之风蔓延中华大地，上至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城市农村的基层组织，踌躇满志的造反派组织开始了或准备着与“走资派”进行“大决战”。夺了权的，或是忙于巩固或是四处游说以获得上面的认可；未夺权的组织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年的《元旦社论》还只是提出要“坚持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

义”和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几天之间形势便飞跃发展，难怪1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兴奋地宣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但是不久，《红旗》与《人民日报》却连续发表文章，虽然还在为夺权鼓劲，但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无政府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思潮，这场批判断断续续持续到1968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方告一段落。“文革”的重点不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方向不是“矛头向上”吗？风向是不是有点不对了？

这是由夺权所造成的空前混乱引起的。显然，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全面混乱和恶化，不仅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毛泽东的本意。对毛泽东来说，他提倡“乱”是有特定涵义的，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自己。出乎他的意料，夺权之风一开，他反复强调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被造反派当成了耳边风；他所亲手参与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被当成“旧的”而要彻底砸碎；他赖以作为“文革”主体与动力的造反派群众陷入为夺权而展开的“全面内战”之中。这使他十分不满。1967年2月3日，他在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一方面认为“文革”是唯一能“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批评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此前后，他还批发了一系列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关于制止武斗和全面内战的文件和通告。而林彪、“四人帮”，为其特殊利益起见或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作出某

种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姿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批判无政府主义被提上了“文革”的议程，并见诸于报端。1967年第3期《红旗》评论员文章指出：“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有人反对一切权威，这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196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倒无政府主义》的社论，文中除继续强调要批判无政府主义，划清大民主与自由化、革命纪律与奴隶主义的界限外，还引用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胜利前说的一段话，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和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照录：“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显然，这是对夺权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的真实写照。此后，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构成夺权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期间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对待干部，二是关于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文革”以来，由于“走资派”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与任意性，绝大多数干部都被当成了“走资派”或至少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因此，在夺权中，他们被顺理成章地摒弃于权力机构之外。这不但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而且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和急迫的问题：群众组织如何掌管权力。毕竟，“革命”比管理还是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后者不仅需要经验、能力和权

威,而且还需要完整的机构和程序,需要各职能部门对业务的娴熟与配合。但是,“走资派”均被打倒,原机构已被解散,大批公职人员被集中起来搞“斗批改”。而已获得权力的群众组织一般又不情愿与被自己批判和打倒的对手分享权力,他们总是给昔日的当权派罗织种种罪名,既证明自己掌权的正义和合法性,又使对手难于东山再起。对那些被结合进班子的领导干部,胜利者的恩赐感与“造反派的脾气”使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往往以睥睨的神态对待他们,合者共事,不合者则另起炉灶。这种情况使得进入领导班子的干部难于行使和发挥他们的权力与作用——何况“一遭挨蛇咬,十年怕井绳”,“文革”的教训犹在,他们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来抓“革命”,不可能照搬自己过去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革命委员会的巩固和形势的稳定。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成为夺权后的主要问题。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开导造反群众:“革命领导干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夺不了权,也掌不了权。”所以,“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①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大联合难以形成,妨碍了夺权的进程,并对夺权后的局面构成威胁。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和火并是夺权过程中的

① 《红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一个壮观景象。大联合搞不起来的地方，一拨组织夺了权，另一拨组织坚决不承认，“假夺权，真复辟”成为相互指责中最常见的用语。你今天夺了权，我明天再反夺权，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实现了大联合的，或是明合暗不合，或是想趁机扩充实力、吞掉对方，彼此闹个不休。显然，听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不但于国于民有害，而且也影响到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扭转这种局面势在必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便是所采取的步骤之一。

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种批判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在全局性错误的形势下，任何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和动机的局部甚至是表面的补救措施都有着可取之处。

但历史地看，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种批判在当时有其特定的政治含义和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期间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在左倾理论的实施遇到障碍时进行的。在理论上它是服从于“文革”的指导方针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但是，革命需要权威，夺权也要权威，而“造反有理”是反权威的，对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也是反权威的，这种矛盾决定了当时反无政府主义的不彻底性。

其次，这种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无政府主义猖獗的主要原因，相反，却将原因归咎于“走资派”的挑唆和煽动。提出，“极力宣扬‘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几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①如此指鹿为马，必然把批判的矛头最终集中于“文

^① 《人民日报》1967年4月26日社论。

革”要打倒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身上，反而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气焰。

第三，从煽动无政府主义到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自居，“四人帮”等人正是随时利用这样的转换来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利用无政府主义来打倒党政干部，又利用反无政府主义来镇压那些不听命、不驯服的群众组织和对他们不满的群众，翻手云覆手雨，左右逢源，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为“四人帮”等用来作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手段。

显然，如果不把无政府主义与极左思潮真正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如果不把这种普遍性的“无法无天”与“文革”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就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清除无政府主义。所幸的是，数年后，当“文革”还在过迁之中时，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在客观上为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医治“文革”创伤的机会。197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和克服“文革”给国民经济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造成的困难和混乱局势。然而，虽然造反的狂热已逐步降温并趋于沉寂，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作祟使这些措施难以顺利贯彻和执行。显然，不从根本上批判无政府主义，解决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就不可能扭转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交通工作会议、科学工作会议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3月1日，在人大大会堂接见我驻外使节时，周恩来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指出：你们对极

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同年9月，周恩来再次强调：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此之前，国务院业务组的李先念、余秋里在于3月21日听取黑龙江的工作汇报时，针对哈尔滨的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指示他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省委写作组根据这一精神写了一篇署名“龙岩”的文章，交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同志根据周恩来近期的指示精神，集中力量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并配以其他几篇文章组织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专版，于10月14日见报。这篇文章依据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思想，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历程，指出林彪一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中用“刘少奇一类骗子”来指称）是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其目的是要把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还指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清除影响。

显然，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与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文革”所面临的实际矛盾焦点，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法新社当日就发了一条电讯，称这组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批评红卫兵的。确实，在千篇一律的舆论环境中，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拂过人们久锁的心头。它反映了人们普遍要求结束“文革”动荡局面的要求。同时，它也随即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攻击，被斥之为“右倾回潮”。这从反面说明了它所包含的积极的政治意义。

第一，它反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试图纠正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的努力。尽管在全局上尚不具备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条件，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周恩来等人为尽力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作出了自己的最大贡献。这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进行的全面整顿提供了经验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锋芒直指林彪等赖以作乱的极左思潮，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此外，还涉及到关于群众运动自身的弊端所在。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否定和取消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领导，推崇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这不仅对清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有普现实意义，而且是对“文革”造反有理的曲折否定。

第三，以这次批判为契机，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对左倾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从而使1972、1973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好转势头，社会各方面情况也渐趋稳定。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使得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极左思潮的破坏性和危害。极左思潮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第四，尽管尚不能从根本上涉及左倾的指导思想，甚至不得不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但这次批判与上次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而“四人帮”的极力反对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坚持极左思潮的真实面目。

因此，虽然也存在着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1972年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迈出了纠正左倾错误十分重要的一步。

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四人帮”及其极左

路线的存在，“文革”中运动套着运动的现象，使得无政府主义犹如不灭之火，每每死灰复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因此，极左路线是造成“文革”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

五 畸变的社会心态

“文革”时期全面泛滥的极左思潮，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给人的精神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是在分析极左思潮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畸变的社会心态是这种精神创伤的具体体现。特殊的社会动乱造就了特殊的心态，它几乎难以用一般社会心理学概念和范畴加以界说。——把人们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心世界，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我们在“文革”中又依稀看到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描述过的这种现象，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文革”期间的畸变社会心态既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又反过来构成极左思潮恶性发展的基础之一。

一般来说，健康稳定的社会发展是健康稳定的社会心态的基础，后者又是进一步促进前者得以正常运行的要素之一。社会心态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讲，既有人类生存本能所决定的一面，又有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后天形成的群体性与社会性的一面。由生存本能决定的是社会心态中较为长期和稳定的部分，例如自我保存、发展进取的心态等。通过社会交往后天形成的则是社会心态中相对暂时和易变的部分，它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例如人的价值

观念心态、利益含取心态和人际交往趋向的心态等。当然，人类社会的不断逐步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普及使这两种构成的差异也逐渐模糊，理论上的分类无法取代二者在实际进程中的融合趋势。

社会心态是一个有着十分突出和鲜明的平衡性的系统。其中各个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是这一系统平衡的基本条件。当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一因素因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在程度的深浅、作用范围和影响的大小方面发生变化时，平衡性便被打破，社会心态便呈现出过渡和变迁的趋势，直到获得新的平衡。但是，社会心态的变迁是否能够朝向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则取决于决定它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当社会的运行机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故障时，它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便会打破社会心态的平衡，使得社会心态中某些原本是正常的因素和部分畸变，因而出现了社会心态的非正常变迁，它反过来又会加剧社会的动乱。例如，“怀疑”是社会心态的一个部分，它是人类在探索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首先是从人们对已往的现成结论和观点的怀疑和不满开始的。因此，在科学探索的领域内，怀疑是一种必须的和健康的心态，但是，一旦超出这一领域，对任何事物存在的确定性都加以怀疑，那么只会导致相对主义，堵塞通往真理的道路。而如果怀疑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主要心态，则人与人就会失去相互信任，导致严重的结果。又如，“自省”是人们不断自觉的自我评判、调整心理平衡的一种心理过程，但是，宗教的原罪意识却把这种自省变成了自虐，使人们心灵始终处于一种痛苦的自我折磨的状态之中。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心态就会出现畸变。当这种畸变心态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便会导致人们精神上的危机，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种恐慌感和缺乏安全感。任何一种信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都会失真，而失真的信息又反过来使人们盲目地、匆忙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加剧社会的混乱。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高度紧张和恐怖的局面，造成了人们普遍的高度敏感与恐慌的心理，任何一种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现象都会使人联想到保皇党人的阴谋，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骚动和无谓的杀戮。一句传闻，烧杂草冒出的烟，太阳照在窗户上折射的光线，深夜的马车声，甚至士兵手上的灯被风熄灭，均使人们惊恐不安。真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长久地处于这种神经紧张的状态，要么是社会崩溃，要么是那种造成这一局面的社会力量或思潮退出历史舞台，历史选择的总是后者。

在“文革”中，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在扭曲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同时，也扭曲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些最为普遍和典型的畸变社会心态便是这种扭曲的结果。

灵魂的自虐

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什么是触及灵魂、用什么方式触及、触及到什么程度，这一切似乎并不甚

明了。另一方面,与“文革”所提出的其他理论和口号一样,“触及灵魂”的全部含义只有通过它的实践方式和结果才能得到说明。而林彪对“改造灵魂”的极大兴趣则使这一概念从出世起就被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云:“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象这次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大家动脑筋,在灵魂上大震动。”^①

在这种“大搅大闹大震动”的方针指导下,触及灵魂变为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摧残。而“世界观的改造”也就此被导入歧途,走过了一个从提倡“自我改造”到“自以为非”,进而是“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的历程。毕竟,“世界观改造”既需要正确的理论也需要正确的适当的方式。用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对人进行“改造”只能导致人的自虐。

一、强烈的“负罪”意识。

在基督教中有一种“原罪”意识,它是说人类始祖因不听上帝之言偷食禁果而犯下了罪,以至后人一出世就是罪人。因此,人必须时时自省忏悔自己的罪行,忍受一切苦难,依靠救世主耶稣为人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作为一种宗教教义,这种观念只为其教徒信奉。然而,在极左思潮最盛之际,“我有罪”却成为社会一些阶层和群体的普遍心

^① 1966年8月8日《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讲话》。

态。所以，这里仅从借喻的意义上使用“负罪”这一概念，以说明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下人们的这种虔诚地自我认错、认罪的心理及其结果。

负罪意识在社会的三部分成员中表现的最为普遍和突出：原属于剥削阶级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包括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即“黑五类”；干部阶层（特别是担负一定责任的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有贡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原属剥削阶级的社会成员和“右派”及其子女是这种意识最为强烈的阶层。对于父辈一代的人来说，一方面，在经过多年的教育和改造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自己过去的剥削行为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认识，既为历史罪行而不断忏悔，又深恐自己若再犯新罪对不起社会和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每次运动来临之际首当其冲的被打击对象，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形势下，他们的负罪感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日益加深，似乎他们的后半生都注定要全部用来赎罪。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在劫难逃，“文革”被四一一开始，“黑五类”最先成为扫荡的对象，游街、挂黑牌子、批斗，然后是跪在领袖像前的请罪，最后被扫地出门。仅北京市在八、九月间被逐出京城遣返原籍的“五类分子”就达85000人之众，^①他们的子女也受株连，虽然在“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政策执行较好的年份里，他们中的少许人尚可摆脱其出身成份所给予的社会限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文革”中，“阶级成份定终身”。他们在入党、参军、

^① 《历史的审判》，第471页。

上学、提干、就业等方面都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低贱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也逐渐形成了“父债子还”的负罪心态。

“文革”的直接目标是所谓党内“走资派”，由于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在最初的几年中，绝大多数现职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和批判。他们的具体罪名或有所不同，但基本的罪状都不外是“忠实地执行和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又是一个缺乏客观标准的罪名，所以举凡是执行了上级组织指示的均难脱此嫌，而平常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也都被上纲上线认识，更有“欲加之罪”的莫须有，再加上对十七年的全面否定浪潮，因此，没有那一级领导干部能逃脱执行“错误路线”的厄运。此外，在“文革”刚发动之际，大多数干部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说上述罪名尚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抵制群众运动”这一条却是确定无疑的，而这场群众运动又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所以，或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绝对信任，或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尽忠尽责，或是出于真诚地反省自己的错误以汲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出于单纯的尽早“过关”，他们在批斗会上，在隔离室中，在“牛棚”里，一次次地反省和检讨着自己如何有意无意地未能紧跟或是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压制”了群众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但迫于形势，不得不严格地履行着这一程序，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心态效应。对于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能够在枪林弹雨中、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泰然自若，毫不畏惧，但他们却无法想象和忍受这样的事实：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被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人民所抛弃。而当他们接受了“文革”便是这一事业的继续的理论

叶，他们所能作的，便是真诚地忏悔自己，以期被重新接纳回事业的行列。也有许多刚直不阿的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因而受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很多人为此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颇遭磨难的社会阶层。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文革”前一直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由于他们曾“依在剥削阶级这张皮”上的经历，因此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虔诚地改造自己，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但这却似乎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改造历程，“文革”中，他们当然地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对于解放后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对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根本否定，他们在瞬间便成了“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甚至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也被列入了再教育的对象之中。所以，从总体上看，“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最经常地处于“忏悔”和“认罪”的状态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时时处处地与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以使自己的立场和感情都真正转移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

由于知识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敏感的自尊心，因此，对自我的鞭笞和批判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彻底否定自己的学问、处事准则和对事物的独立见解，听任别人和自己对自己的贬损，无疑是把灵魂置于炼狱之中。这里列举几位文化名人在当时对自己“罪行”的认识，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灵魂的自虐”对人的摧残程度。

著名的老作家巴金先生写道：“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

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的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①“在头两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折磨当作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②

著名的表演家艺术家蓝马在“文革”中被打成“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隔离审查，随后又被长期监管劳动。他被这突然袭来的风暴打懵了，努力认真地反省着自己这说不清的罪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的生活是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整天一句话也不说，见谁也不敢抬头。……我抑制不住地流下泪来。我没有资本和土地，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是旧社会腐朽的生活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以及名利思想把我害得不轻，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一直认为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党走，可万万没想到竟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走进修正主义的坟墓，还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几乎当了一辈子‘悲剧演员’而不自知，真是可悲！”^③在今天看来，这时候的蓝马先生真正成了一位悲剧人物。

著名画家叶浅予在当时的日记中以沉重但又暗含几分辛辣的笔触记叙说，“我们今天跪在石膏面前，是教我们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丑恶灵魂，应该和石膏教育一样，一起被砸得稀巴烂！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

^{①②} 巴金：《真话集》第45页，第38页。

^③ 转引自石棠等：《剧影两栖一奇才》，载《人物》1988年第1期。

这短暂的一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①

这是一些撼人心灵的自我剖析。它最深刻地反映了极左思潮下触及灵魂的实质。

伴随着这种负罪意识，“文革”甚至还创造了一整套的“请罪”仪式。诸如跪在领袖像前请罪、对着“红宝书”请罪等等，而最为普遍的则是“早请示、晚汇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它只是形式主义的操作，但对于有着“负罪”感的人们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折磨。也许，正是这种“负罪”意识使很多人接受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许多人也正是由于不堪忍受这种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污辱而走上绝路。上海市音乐学院二级教授李翠贞，早年留学法国，多年来兢兢业业工作，“文革”中成为横扫对象，罪名仅仅是注意仪容和衣饰。她被勒令拿着簸箕扫帚边敲边喊叫“我是一个妖孽”，一群人围着她吼叫，吐口水。她含愤自尽，临死前，最后一次涂上口红画好眉，以此向这种践踏人格的“革命”作最强烈的抗争。^②

1967年9月，针对群众组织的分裂及混乱局面，毛泽东号召“要斗私批修”，以期促进“大联合”。这一口号随即被作为“文革”在思想领域内的根本纲领。但是，极左思潮的泛滥使毛泽东的本意难以得到贯彻。在其后举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学习班”上，这一口号被某些人当作了整治异己的理论根据。凡参加过这类学习班的人，莫不感到一种心灵

^① 叶浅予：《十年荒唐梦》，第41页。

^② 参见《十年奇冤录》，第136—137页。

上的痛苦煎熬。他们在被触及皮肉的同时，还必须一遍遍地深挖“思想深处”的“私”字，反复批判自己，上纲上线，直到意志被摧垮为止。因此，加入到“负罪”行列的社会成员随着“文革”的进程而日益增多。举凡在派性斗争中尖意的一方、那些被划定“站错了队”的人，那些对“文革”领导人或对“文革”本身表示不满的人，都有可能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对待。

二、人格的泯灭与个人崇拜。

这种自虐性的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认罪，泯灭了人的独立人格，堵塞了人们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途径，剥夺了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又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林彪、“四人帮”等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自我否定的心态，假借领袖之名以售其奸。

在普遍的“负罪”心态之下，产生了一种对比强烈的反差：一方是自卑自贱为数众多的“革命对象”和时时处于反省和“斗私”状态下的广大民众；另一方则是无比英明正确的领袖形象。前者将领袖视为无所不知、洞察一切的神明，“最高指示”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语录”成为力量的源泉与解决问题的百科全书。

任何一次真正群众性的并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在人民群众中都会产生一种歌颂和推崇自己领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发的，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自豪心情和热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那些为民众解放付出巨大努力的人的感激之情。毛泽东正是以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无愧地获得了人民的

衷心爱戴和敬仰。然而，在这种趋势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心目中逐渐把领袖神化。但是，据此便认为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这种推崇必然会导致对领袖的迷信，这种迷信又会超出理智的界限发展成为偶像崇拜，则是缺乏根据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民众文化素质愈低与神化领袖的可能性程度愈呈反比，即民众文化素质愈低，则神化领袖的可能性愈大。但是，把革命领袖变为全知全能的神，不仅取决于民众，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领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原则是否得到切实执行等等。只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有可能出现对领袖的神化。因此，在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还是应当有一些、并出于政治考虑而对种种个人崇拜的作法未加制止，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和提倡，而党则由于自身民主生活的不正常而无能力制止的情况下，个人崇拜之风与“文革”一起相得益彰，成为当时左右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下，对领袖的无比信任使得任何一种对“文革”本身稍加怀疑的念头不仅会被他人视为大逆不道，甚至使产生这一念头的本人也会坐卧不宁，陷入一种深深的痛苦矛盾之中。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敢冒坐牢杀身之虞而直陈己见外，对于更多的普通民众来说，面对那些在理智上难以接受的事实时，获得心理平衡和安慰、从而也获得在社会上的立锥之地的最简单的方法，便是不要尝试去论证和思索什么，而是无条件地相信领袖，响应领袖的号召，直到与这种潮流融为一体。因此，当“文革”中许多人自以为思想得到解放的时候，正是他们深陷于个人崇拜之际。

一位理论工作者记述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常感到压抑。可能正是这种压抑感使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误以为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我自以为思想解放了，其实是深深地陷入了个人迷信而不自觉。《人民日报》曾就毛主席在长江游泳一事发表过一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这个题目是我拟的。我自己确实怀着革命的激情，想在这场大风雨中经受锻炼。”^①

对于成千上万具有“负罪”意识的社会成员来说，强烈的个人崇拜只能加深他们对社会的歉疚，领袖的正确反衬出自己的罪行与错误。他们的检讨、批判和认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认识，而是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和寻找一种精神支柱的依靠感。

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帮”等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真诚拥戴和毛泽东的巨大声誉，在极力制造个人崇拜的同时，充分利用民众的这种心态，把自己打扮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些年频繁不断的各种群众集会上，江青等人总是以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作为莅临的开场白，随后便是歇斯底里的煽动。他们在当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也使许多人对他们完全代表着毛泽东这一点笃信不疑，使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部分地转移到这些人身上，成为他们猎取民众信任的重要政治资本。

由此，我们看到一幅恶性相互作用的状况：林彪、“四人帮”等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左倾错误，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政策，并大力制造个人崇拜，从而

^① 《智慧的痛苦》，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5期。

给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造成空前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而“负罪”意识的普遍化又为个人崇拜的盛行和极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进一步证明着“文革”的必要性。

自危的怀疑心态

“文革”的重点是要整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同时批判和打击包括“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内的各色“阶级敌人”，但是，它的实际打击面要远比其所规定的范围宽得多。不仅仅是大多数干部，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和原剥削阶级的成员受到“文革”的冲击，而且，随着极左思潮的蔓延和运动的升温，本来就不清楚的阶级阵线更加模糊，致使越来越多的无辜群众也因各种原因成了打击的对象。在“文革”初期，一般群众因所谓“观点不同”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现象就已十分普遍，而到了1967年1月由谢富治起草、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公安六条》正式颁布以后，凡是对“文革”表示不满或对“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成员持反对态度的人均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凡“散布反动言论”的行为，均是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随着林彪、“四人帮”反党活动的加剧，凡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据特别检查庭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10多万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

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有249000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人以上。^①在阶级斗争如此严重扩大化的局面下，政治斗争与恐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有卷入或未卷入这场动乱的人都缺乏安全感。一言一行的不慎都可能给自己招来意想不到的横祸。“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②类似的例子在“文革”中太多了。即使对那些热衷于投身动乱的人来说，也无法摆脱危险感：“左”派与右派，造反组织与反动组织、当权派与“造资派”等的转换只在覆手之间。最为超脱的“逍遥派”，也并不是总能超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株连制度常使他们因此而遭厄运。立于不败之地者似乎是那些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善于见风使舵并擅长于操纵权术的人——但每一次暂时的得势只是为他们最终的败北多加了一层砝码而已。

所以，在“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感到自危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到“文革”打击的对象，而且还包括普通的民众、甚至于那些自以为是最革命的人：谁能保证自己的每一言一行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呢？何况林彪、“四人帮”等的插手又使这条革命路线变得那样令人捉摸不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自危的怀疑心态得以普遍化了。

^{①②} 参见《历史的审判》，第474—476页。

这种怀疑心态主要表现为把整个社会视为“陷阱”，似乎处处都有敌人，任何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每次路线斗争的胜利不过是新的路线斗争的开始，阶级斗争进行的越深入、越持久，“暗藏”的阶级敌人愈要以十倍、百倍的猖狂进行反扑，因而每一轮新的阶级斗争又势必比上一轮更加尖锐和复杂。生活于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下，人人变得谨言慎行。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不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同时还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 and 评判他周围的人与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真诚地相信或是自觉地以这种观点去行事还在其次，至少在公开的一面，人们难以逆这股思潮而动。高度紧绷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不但为少数以整人为乐事的人提供了机会和环境，也使一些人的心理彻底变态，到处寻觅阶级斗争的动向。有这样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文革”初，一位青年妇女厌倦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一次在心情十分烦躁的时候，拿着笔在报纸上信手涂抹，自己也不知写了些什么。这张报纸落入一位善观斗争迹象的人的手中，后者非常认真地对这些涂抹痕迹作了研究，一共画了24个圈，圈出了24条“反动标语”。于是，“铁证如山”，这位女子被专政机关抓进监狱，判了15年徒刑。^①

在这种普遍性的怀疑气氛之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防范，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互存戒心，如干部与群众、工农与知识分子、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都曾不同程度出现过这种状况。它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家庭与亲朋交往之中。“文革”期间，因所谓“观点”和“立场”的不同或

^① 《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第248页。

政治上的压力而造成的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朋友绝情的事例不在少数，从而使得部分人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阶级敌对关系。这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复杂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严重的不信任感笼罩着人际交往。

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从根本上改变旧式的人与人关系创造了前提。信任、团结和互助是新的生产关系下人际关系的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且是社会主义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有效方式。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社会状况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极端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及其所造成的自危的怀疑心态，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动摇了人们之间应有的信任感，其消极影响至今也未完全克服。

导致这种自危的心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种在我国社会本已基本消灭的丑陋社会现象的死灰复燃，这就是以诬告为主要特征的变相告密制，它的形式多样，譬如“黑材料”、“小报告”等等。“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式是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核心的“大民主”方式，人们运用这一方式去揭发和批判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阶级敌人”。但对于政治野心家和心术不正的投机分子来说，这样的方式尚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各种形式的诬告成为他们使用最多的武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首开诬陷之风。林彪对罗瑞卿等的诬陷、江青等对刘少奇等人的诬陷、康生对大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国家机构领导及成员的诬陷等等，被他们诬陷的党政领导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

以说，“文革”中被打倒的省以上党政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被诬陷的罪名基础上。他们的诬陷手段各式各样，或授意他人写伪证、假情况报告，或严讯逼供，或信口雌黄，或派专人到处搜集黑材料等等，而被诬陷的罪名之大、之多，历史罕见，叛徒、特务、内奸、老反共分子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的历史的审判之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指控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对林彪、“四人帮”等来说，诬告陷害只是其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社会效果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正是在林彪、“四人帮”的身体力行与怂恿之下，社会各种变相的告密活动应运而生，帮派势力人物以此方式攀龙附凤，陷害忠良，表示自己的效忠以为进身之阶；挟嫌报复者以此方式泄私愤；社会的沉渣以此方式趁机兴风作浪，扰乱视听。此外，还有一些人或是因为恐惧、受到株连，或是出于“真诚的革命愿望”而出此下策。而告密方式则是多种多样，既有密室的私谈，亦有不署名的信件，既有大小字报，亦有密呈“领导”。其内容也十分复杂，或是他人“反动言行”，或是他人隐私。而搜集告密材料的途径更是五花八门，有他人日常漫不经心的谈话、发言，有他人的日记、书信、涂画及日常行为等等，告密者将这些东西汇总分析，择其有嫌疑部分向上报告。问题的关键还不完全在于这种诬陷告密本身，而在于大量冤假错案正是以此为根据而制造出来的，许多当事人甚至身陷囹圄尚不知道自己犯了何罪。显然，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并加剧人们之间的自危怀疑心态。

各种形式的告密制本是历史上一种十分丑恶的社会现

象，它是剥削阶级统治者为维护其权力和利益所惯常使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生死攸关的利害，造成人们彼此关系的尖锐对立，从而分化人心，逼迫和引诱人们互相监视，互相告发。民众相互制约，相互告奸，必然相互削弱。而民弱则权盛。“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又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我们需深深汲取的教训之一。

应该说明一点，“文革”时期的各种变相告密制与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检举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动机、内容、方式及打击的对象等方面的本质差别，更重要的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情况下，“宁左勿右”，告密的内容本身便是定罪的直接依据。而在民主法制的环境中，检举只是提供线索。完整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保障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对事物的定性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变相的告密行为正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的结果。

社会性的言行不一

社会性的言行不一是极左思潮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之一，同时也是它所造就的畸变社会心态的一种典型形式。

言行不一最极端的例子当推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他行为的座右铭。在日记里，林彪还写道：“为面子而弥天大谎，隐恶扬善，曲解夸大，抵赖，无中生有，捏造，讳莫如深，三真七假比例，国家阶级个人皆如此。”^①他本人

^① 转引自《红旗》1976年第4期第23页。

忠实地实践了这一理论。正是靠着“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手法，他才得以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并在“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被明文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性的言行不一，主要不是指这种极端的两面派的例子。而是指一种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与心态：理论背离现实及其导致的虚假舆论宣传，这种现象所造就的社会普遍“言不由衷”的双重人格心态。

一、理论严重背离社会现实。

它表现为三方面，其一，理论虚假地反映社会现实状况；其二，理论与自身的实践不符；其三，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对错误理论的抵制。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不正确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我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而它的实践结果也必然与其“反修防修”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一段完整准确的概括：“‘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其次，由于背离社会现实，左倾理论的“正确性”只有通过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所提供的错误信息来印证，由此便产生了学者们所概括的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恶性循环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左倾理论在其实践中释放了这种理论本身也难以控制的各种社会落后观念和势力，因而在左倾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本身在许多方面也超出了这一理论的预期和设想。例如“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各种在“革命”的名义下产生的暴力行为，无休止的派性斗争等等。而最能反映这一理论与自身实践不符的例证，莫过于以“反修防修”为目的这场运动却导致了林彪与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产生。

第三，左倾理论在“文革”中虽然居于全局性的支配地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和人民以各种形式对这种错误理论进行了抵制，正是这种抵制保证了我国社会各项工作在困难的局面下还能够得以继续，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与“文革”的结束也正是党和人民进行斗争的结果。因此，严格地说，这种实践已与左倾理论的实践完全是不同质的事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实践在形式上还是以侧重强调“文革”理论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为依据而进行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实践对错误理论的背离。

二、虚假的舆论宣传。

随便翻开“文革”时期的报刊杂志或其他传播媒介所记载的材料，其内容之空泛和虚假，令人难以卒读。在“四人帮”等控制和把持的舆论宣传工具中，社会的现实被严重歪曲，它只是按照“文革”理论的需要来主观处理一切信息。凡是被认为不利于“文革”需要的信息一概不用，而那些经过层层加工的报道、宣传、理论论证和形势说明的材料，已

经完全丧失了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准则。到“文革”后期，舆论宣传已基本上蜕变为江青等人推行极左思潮、煽动打倒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专用工具。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时期新闻舆论宣传界最为耻辱的一页。透过一些具体例子更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文革”的发动，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深透于人们心里，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使得人们谈虎色变，而报刊广播更是不遗余力地煽动人们的这种变态心理：“从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们，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当面说人话，背后说假话，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吃人的笑面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钻到我们‘肝脏’里面来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和高度的警惕”。^①当时，类似这样的煽动性语言比比皆是。

进入1968年，全国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武斗成风，全面内战，经济出现大幅度倒退，但在报刊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导弹氢弹的试验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全国热气腾腾，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②在“文革”时期，形势在各种新闻媒介中从来就没有不好过。

^① 《解放军报》1966年6月7日社论。

^②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

林彪集团的垮台客观上已宣告了“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失败，但却被宣扬成是“文革”的又一“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

尤其卑劣的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引起了举国哀痛，而报刊舆论非但不反映人民的悼念之情，反而强奸民意，谎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①而在此前后，“四人帮”操纵舆论工具放肆地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充斥于市，借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最为荒唐的，则莫过于在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并将唐山市变为平地的大地震发生后，“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轻松告诉人们说，震后的唐山“绘出一幅团结奋斗的壮丽画图，涌现出许多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动人事迹。这又一次充分说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胜利前进的英雄人民，任何严重自然灾害都是可以克服的。”^②“地动山摇，锻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推动他们广泛开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房屋倒塌，农田毁坏，激发了人民群众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促使他们重新安排社会主义河山，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③他们真正要转达的信息是，死了几万人的地震灾害远不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任务重要。

政治学中关于舆论传播对大众的影响划分为“理性说服”

① 《人民日报》1976年1月14日《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② 《红旗》1976年第8期短评：《人定胜天》。

③ 《红旗》1976年第9期，《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和“操纵性”说派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向大众提供真实的信息，以使他们获得对事实的真实理性判断；后者则是指有意将虚假的信息提供给大众，歪曲或掩盖真相，从而使大众按照舆论传播所期待的方向作出不符合事实的判断。“文革”期间的舆论宣传便纯粹是这种操纵性说服。它不仅为左倾理论和极左思潮的传播蔓延提供了媒介和手段，而且以假代真，以假乱真，把空洞的说教、虚假的论证和公开的谎言变成了社会时尚。

三、双重人格心态。

这种心态是在极左思潮一方面对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进行残酷打击、无情迫害，另一方面，又拼命制造各种虚假典型，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跟着人云亦云方能平安无事的情况下滋生的。

作家萧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情并就此作了一些评述：“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话确已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象遇罗克那样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他接着写道，一位老早就入党、与“黑线”无瓜葛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他在外单位的妻子突然因据说是抽屉里发现“反动”标语而被捕，几天后便被以罪大恶极而处决。起初此人还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工宣队员一起打篮球以示自己划清界限，但几天后有人给他贴了张大字报，就他的历史提了几个问题，当然也是捕风捉影。同日晚，他便跳楼自尽。当被人发现后，他在弥留之际对班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梦见——有特务——追——就跳了楼。”说完这句冠冕堂皇的假话后才咽了气。他大概意识到身为党员，跳楼自杀必然会当叛徒

来批判，于是，就编了个英勇擒敌的故事。不过最后工宣队依然贴告示说他是自绝于人民。萧乾给这段记叙起了一个名字，叫“最后的一句假话”。^①

笔者所遇到的一件事也是这种双重人格心态的典型体现。1970年，在笔者下乡的黑龙江兵团的某连里，有一位姓杨的上海知青，平日寡言少语，十分忠厚，但在生产上却非常积极肯干，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未受到连里的重用。大约是在七八月间，他们奉命在离连队约10里的一个小山坡上脱砖坯，一日，轮到他在帐篷值班，忽然间帐篷一角冒起浓烟，当其他人从工地赶回时，只见这位杨某躺倒在帐篷外，浑身烟灰，不省人事。后经诊治，并无大事。住本人叙述，有人纵火破坏，他未追上，返身扑灭帐篷火后挣扎跑出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连里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因为周围并无入踪，而且班里人很快便赶了回去。经再三查问，杨才吐露真情，原来他心底一直为不受器重而感到压抑，便想出这样的下策，自己放火，在火势尚不大时便扑灭，接着便是后来这一幕。他当然遭到了知青们的鄙视。10年后我才感到真正理解了他。他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出身不好的知青，要想摆脱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限制，立足于社会，只有表现出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而当环境并不存在这种施展斗争精神的机会时，绝望之中，便自己制造了一场“阶级斗争”，以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例子恐怕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那个时代所塑造的双重人格的心态。当虚假的理论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时，社

^① 萧乾，《北京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

会对它的反映也只可能是虚假的。

当然，社会的心态从来不是单一苗。正像汲左思潮虽然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但在每个人思想中的地位不可能是一样的。言行不一，虽然已成为当时社会性的弊端，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不说违心的话，不作违心的事，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铮铮硬骨还是大有人在的。这里所说的这些畸变社会心态的普遍性，仅是就其广泛性而言，并非是说上述心态已主宰了我们民族的全部心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要根除畸变的社会心态，并使这种现象不再出现。最根本的就是消除造成这些畸变心态的各种社会条件。

六 极左思潮下的暴力行为分析

大规模普遍的人身迫害和暴力行为是极左思潮社会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文革”中人们把这段“最高指示”背得滚瓜烂熟，它还被谱上了乐曲，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语录歌。红卫兵在破“四旧”时，造反派在批判、游斗、殴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时，群众组织在相互大打出手时，甚至“牛鬼蛇神”们在被“触及皮肉”时，这段话似乎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应景之语。狂热的人们忽视了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27年针对当时对农民革命运动的非难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来的，忘记了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暴力与革命被超时空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最为形而上学的简单公式几乎泯灭了人的理性的良知：革命就是暴力。而非暴力就是改良，就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因此，也就是修正主义。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对待革命的敌人，我们绝不搞温情主义。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对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残忍。”这段话马上得到了反馈。数天后，一群中学红卫兵便在其造反宣言中发挥了

这一观点：“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竟堂而皇之地予以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称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与战斗性”，“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

于是，对敌人的残忍才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革命的温情。这一观点成为残酷的人身迫害与野蛮的暴力行为的合法依据，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正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

对于极左思潮下的种种野蛮行为，林彪却有其独到的见解：乱有四种情况，（1）好人斗坏人，应该。（2）坏人斗坏人，以毒攻毒。（3）坏人斗好人，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了很大的甜头。（4）好人斗好人，有损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所以“文化大革命”“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最小代价”呢？它包括国民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5000亿元的经济损失，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人们在心灵和精神上的深深创伤，而最为直接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代价是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人与无辜群众的生命。上至国家主席、元帅，下至掏粪工人，这些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冤魂永远无法复活。“轻不完全统计，‘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一万零四百零二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两万三千九百二十一人，

① 林彪1967年“八·九”讲话。

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这是冤假错案中后果最严重的一部分”。^①在这些被专政机关以“反革命罪”而正式处决的人中间，有张志新、遇罗克等一批民族的优秀儿女。但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的社会环境下，那些被用各种非法手段残酷迫害致死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

劫后余生的巴金先生愤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②

这种看法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人们从心底对“文革”种种暴行的义愤和阻止类似悲剧在中国大地重演的善良愿望。确实，“文革”的种种野蛮行径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这种“兽性”的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仅仅从“人性兽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显然是不够的，它容易使我们把一种抽象的概念加于复杂的事物之上，反而削弱了认识事物的深度。

在这些野蛮的行径已成为一种历史陈迹的今天，重新回

^① 方方舟等：《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② 巴金，《病中集》，第97页。

类“文革”中这些血腥的事实，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极左思潮本身所造就的恶果，同时也是为了探讨这些行为本身在当时的社会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上的误区。

暴力潮及其社会含义

暴力泛指用强制手段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阶级暴力，它是阶级对抗的最高形式；二是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的强暴行为。“文革”中十分普遍的暴力行为的基本社会含义就在于，把大规模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侵犯他人人身行为当作阶级对抗的基本形式之一。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以前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极左思潮的产物，并且服从于这一思潮的需要。

暴力潮的基本社会含义主要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暴力行为被作为“革命”的外在表现形式。

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极端行为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红卫兵是“文革”最初的产物之一。在其成立初期，红卫兵主要是在学校内造反，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这期间，虽不时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还没有形成普遍性的社会行为。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8月8日，中央通过了《十六条》，发出破四旧的号召。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在这次集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此后，红卫兵纷纷走出校门冲上社会，大破四旧，实践这一连串“打倒”的行为，而大规模的暴力潮也自此始。

对于头脑简单而又陷入狂热之中的青年来说，“打倒”就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式的“打倒”。革命被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直接操作行为。他们走上街头，从攻地名、砸文物、焚书烧字画开始，发展到抄家，对被视“敌人”的人实行人身施虐。仅8、9两个月，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人就有1000多人，伤者无数。作家萧乾描述说：“到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我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给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托着死尸就架——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①

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县的暴行。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民警闻风而动，把辖区向“四类分子”的情况提供给了红卫兵。从27日起，红卫兵开始对“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大打出手，打死人后，又把义愤转移到其家属和其他“四类分子”身上。

^① 萧乾，《北京城杂忆》，第116页。

从7日到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被杀绝，若非市委派员到县制止，事态还会继续发展。^①

某中学红卫兵在私设的审讯室中，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的墙上书写了一条标语：红色恐怖万岁！为这种野蛮行为提供了脚注。

然而，就是在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伟大功勋”，称“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场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31日，林彪在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说：你们干了大贾的好事，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向你们欢呼，向你们致敬！当然，在此期间，上至中央，下至一些红卫兵组织，都曾多次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号召和呼吁。但是，在红卫兵实际上把直接的暴力行为理解为“革命”的外在形式的情况下，不动手怎么能显示出斗争的坚决性和革命性，更何况还不断有人喝影！

我们当然不能把产生这些暴力行为的全部原因都归之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红卫兵一代既有着理想主义的气质，又有着盲目冲动的一面，有着革命的真诚却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革命暴力的教育，血与火铸出的江山也只有靠血与火来巩固。他们曾为自己未能象先辈一样在长征、抗日战争和

^① 参见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组编写的《彻底砸烂“文化大革命”》，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69—76页。

解放战争中建功立业而遗憾，但是“文革”却有了使他们一展身手的绝好机会，英雄主义的冲动与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充当了“急先锋”。“社会”对他们行为的鼓励更增强了他们的狂热。而当他们同时把暴力也作为阶级斗争的方式时，他们的行为注定地造成了对社会的严重破坏。上海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曾这样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的成长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读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着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神经束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的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驱使的工具。”①

这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60年代末期，青年一代用暴力反抗社会的行为是世界上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扎布里斯角》于1970年上映，影片的末尾耐人寻味：女主人公将世界化为灰烬，她的眼光暗示了旧世界注定要灭亡。她发泄的怨恨化作一块巨大的蘑菇云，冉冉上升，被飞溅而起的废墟瓦砾所包围：一张年轻而欢快的脸迎着新世界的太阳笑逐颜开。②但对中国的红卫兵来说，他们期待着用极端手段所创造的“新

① 《一个红卫兵到令的自白》，载《东方纪事》精华本第45页。

②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8年第4期第20页。

世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光辉，他们所“砸烂”的正是他们的革命父辈所为之奋斗的东西。

二、派性武斗使“文革”的暴力行为成为有组织性的社会政治行为，从而酿成一场真正的全面内战。

“文革”从学校等上层建筑领域扩展到社会其他生产性行业后，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并从单位性的组织发展为行业性、跨行业、跨地区的大规模组织。一时间，处处旌旗招展，山头林立。这期间的群众组织的职能和特点都与早期的红卫兵有所不同。作为政治性的组织，从它诞生开始便具有与现存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权机构分庭抗礼的趋势。在极左思潮的支配和影响下，具有“造反”性质的群众组织把自己视为现存政权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随着“文革”的发展而发展。这种矛盾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全面夺权前围绕着对政权机构和“当权派”的态度而产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由夺权和军队的介入而引发的在新的意义上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及军队之间的三角冲突和矛盾，贯穿于夺权过程和夺权后各派组织之间的相互倾轧。而后两个阶段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需要说明的是，从夺权开始后，几乎每个组织都认为自己已是“造反派”并视对方为“保守派”，“文革”初期意义上的那种“保皇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此，虽然存在若造反程度的不同，但所谓造反与保守的划分已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随着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即支持那些向“当权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这使得那些以“保”为主的红卫兵组织感到迷茫和痛苦，一片忠心反受冷遇，满腔赤诚捍卫党，却落个“保皇派”的名声，为了表示

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决不比别人差，他们甚至以更大的劲头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去，何况“造反不分先后”、“受戮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总之，最后大家都成为“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造反派了，无非是程度不同而已。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所形容的：“文革”中的各派学生象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面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喊打倒。

第一阶段的矛盾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上海的“工总司”与由市委支持的“赤卫队”之间的冲突。1966年11月，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中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署了五条意见，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的革命组织。随后，在“工总司”的支持下，上海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站在“造反”的立场上，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而反对“五条”、反对上海红卫兵对《解放日报》采取的行动使得对立面的群众联合起来，于11月26日成立了“赤卫队”（“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组织。12月3日，两派在《解放日报》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12月31日，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王洪文调动10万人向居于康平路的“赤卫队”发动进攻，当场打伤91人。“赤卫队”被武力镇压了下去，这为造反派搞垮上海市委进而夺权的行动铺平了道路。康平路事件开了有组织武斗的先例。此后，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效法，他们不再满足于“口诛笔伐”，而要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并使用各种手段武装自己，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

夺权之风既开，天下大乱。为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

行，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致信林彪，指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同日，中央作出关于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决定不但要求解放军坚决站在左派一边，而且要求“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以“支左”名义介入夺权斗争，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使本来就错综复杂的矛盾更加复杂，并在一定程度加深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于“左派”的确定难以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很多奉命支左的军队便转向支持相对“保守”并且声势也较大的一派。对作为国家社会的秩序体现者的军队来说，这样作是很自然的。但这样却使未获支持的一派大为恼火，一系列流血事件就此引发。

以“青海事件”为例。1967年2月，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强占了《青海日报》社，并制造了打人事件，据说有数人被打死。2月14日，省军区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和“八·一八”总部。2月23日，省军区调13个连与“捍卫队”、“火车头”等组织一起对被包围的报社采取行动。宣布取缔“八·一八”，令其退出报社。随后，发生武装冲突，双方都开枪射击，动用了步枪、机关枪。部队战士伤亡30余人，对方被打死打伤300余人。随后，“八·一八”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受到围剿。被抓起的成员近万人，得势一方的群众组织用同样残酷的手段回敬对方，老虎凳、活人打夯、烤干鱼（揪住头发烤脸）、手指穿针、过电等多种刑法全上，又打伤打残一大批人。这一事件如何定性是一回事，但如此惨烈的暴力行为确实使人感到震惊。此后，由于中央表态，多数军区被视为犯了方向错误，其所支持的一派也纷纷失势。对立面的声势愈益浩大，

武斗规模一发不可收拾。中央三令五申地制止抢枪、抢物资、冲击军事机关、武斗的通令或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到1967年七八月间，局势呈失控状态。^①

与此同时，各群众组织围绕着权力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倾轧。每一个进行夺权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几个派别的组织。为了夺得“胜利成果”，他们相互争斗，不惜兵戎相见，许多组织都成立了专业的武斗队，不让别人“摘桃子”。在这种形势下，所谓立场、观点的不同、所谓保守与造反之分都已失去实质性的意义。毛泽东曾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然而，对于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来说，权力之争就是根本的利害冲突，造反一场，岂能中途而废，坐视他人收益。即使是那些通过“大联合”实现了夺权的单位或地区，派性斗争也一直未曾平息。许多组织成为名符其实的“战斗队”，一应武器俱全，拥有专职的武斗队伍和指挥机构，俨然成为民间的准军事部队。“四人帮”在四川的一个亲信就叫嚣说：“现在是谁打得赢就是谁的天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武力解决”。他们不仅残酷迫害大批干部——仅县级以上干部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00多人，而且先后在宜宾、绵阳、万县等地区策划组织了大规模的武斗。其中仅三次“武装支泸”，就打死2000多人。打残8000多人。^②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她的话一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

^① 关于1967年7月8月的局势分析，可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258—272页。

^② 197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工事，配备武器。四天之后，郑州烟厂硝烟弥漫，接着，开封化肥厂枪声日夜不停，两场武斗的结果是37人当场毙命，200人伤残，300多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而江青在事后听取这两次“战况”汇报时，竟眉开眼笑，称赞不迭。^①武斗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残忍。在山东郑城的一次武斗中，一方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这些行为已不单纯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反社会欲望的野蛮发泄。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派性武斗一直打到1969年，有的地区，例如保定地区甚至持续到粉碎“四人帮”后。

派性武斗的产生，蔓延及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使得各造反组织都把对手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因而不惜诉诸武力；其二，对权力的争夺刺激起许多群众组织首领的政治野心，为此不择手段；其三，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不遗余力的煽动，尤以江青的“文攻武卫”所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三、“群众专政”成为“文革”从事阶级斗争、处理“阶级敌人”的经常性方式。它是社会主义法治遭到彻底破坏的产物，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极左思潮下出现的暴民政治的发泄途径之一。正是在“群众专政”的名义下，无数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在失去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丧失自由，惨遭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群众专政这一概念最初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通俗表达，它强调的是专政机关一定要采取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发

^① 参见《历史的审判》，第478页。

动和依靠群众来办案和破案，把专政对象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其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它的前提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它只是专政机关行使其职能的一种具体手段。

然而在“文革”中，群众专政的本义被曲解，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词，行使专政的主体也被任意滥为扩大。而“四人帮”等则把群众专政变为他们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工具。他们在群众专政的幌子下摧毁公安、检察院、法院等专政职能机构。成立什么“群专指挥部”、“民兵小分队”、

“封闭式学习班”，到处搞专案组，私设公堂，私立监狱，滥施酷刑，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专政。封建社会的国粹、罗织罪名的构陷、惨绝人寰的酷刑、口含天宪的专制意志，尽被这种意义上的“群众专政”所网集。

“专案”和交“群众监督改造”是其最常采用的方式。

原空军某军副军长，“文革”中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负责人赵登程，在担任国防科委工作组负责人时，在下属9院221厂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9个，反革命组织78个，并成立相应的专案组。在制造假案的过程中，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余副，先后关押2000多人，连同受牵连的人在内，共有4000多人受到迫害。他们大搞逼供信，谁打人越狠，就说明谁“无产阶级感情越深厚”，相反，则是“右倾”，“对敌人恨不起来”。酷刑之下，50人丧命，致伤致残达200多人。^①

原沈阳医学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假案，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疯多人。令人发指

^① 参见《历史的审判》续集，第100—104页。

的是，他们把有的人逼死后，竟惨无人道地将死者肢解作“标本”。^①

最为流行的“群众专政”方式是把专政对象交由群众处理。当时被广为宣传的“六厂二校”经验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中央批转的新华印刷厂的经验有这样一段介绍，可使我们对这种方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慎重定案的基础上，主动地、不停地对阶级敌人进行了狠斗狠批狠揭，在政治上给他们以狠狠的打击。……对那些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就不给他戴“帽子”，而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在群众专政下进行监督改造。稍有不老实之处，就随时对他们进行批斗。大家说：“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我们手里，比戴在他的脑瓜上更厉害，只要他不老实，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现在我体会到了群众专政的威力最大，不交待不行，不老实，钻进死胡同就没有出路了。”^②

然而，在群众专政下仍有“钻死胡同”的。据一份材料介绍说：有个反革命分子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以后，在她劳动的时候，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这种群众专政在“斗争”中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经验：内查外调，政治攻势，检举揭发，政策攻心，定期批斗，定期请罪，劳动改造，群众监督。而每一步都是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来搞，做到人人参加战斗，人人受到锻炼”。战争年代的土改阶级斗争方式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用上了。而对于那些制造命

^① 参见1978年8月8日《人民日报》。

^② 《学习材料汇编》（一）中央办公厅编，1969年7月。

案的人，如果打死的是“敌人”，则绝无追究之意，即使是打死了群众，也要区别情况对待。1969年驻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的军管会介绍的经验是，有两位老工人被打死，两派群众都要求严惩凶手，但军管会认为凶手是受人蒙蔽，于是把凶手送到学习班去斗私批修，帮助他们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而军管会把精力集中在揪幕后的走资派，于是果然揪出来一个。

这些斗争经验是被作为典型来推广的，因此算得上比较“文明”的。

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众专了政。这位年近七旬的著名科学家身患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仍被由群众递解到农村改造。病弱老人长期食不果腹，一次饥饿难耐，颤颤抖抖地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追吐了出来，接着，又被勒令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群众”一阵狂笑中，跌落水中，最后被折磨致死。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林彪、“四人帮”所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专政。而“群众专政”则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社会的法制与既定社会规范的全面破坏，使得群众专政发展成为暴民政治的形式。社会对暴力行为的默许，又使得普通民众把残忍的行为作为在道义上可以接受的行为，丧失了对人的生命的价值感。

所以，“文革”中出现得十分普遍的暴力行为，并不主要

是因为“人性”转化成了“兽性”，它也不只是一种单纯破坏欲望的发泄。人性向着兽性转化的个别例子，局部性的反社会暴力行为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任何时候都是可能存在的，但象“文革”中这样普遍的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则只有在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才可能发生。一篇被推广到全国的经验介绍在谈到为什么搞“逼供信”不好时，所作的推论实在令人吃惊，在谈到几位被从公安局释放回来的人的情况时说，“有一个人有一半屁股没有了，就是用带钉子的木头棒子打的。还有的就是拔牙齿，你讲不讲，不讲就拔牙，再不讲，再拔你一颗牙。就搞这个办法。结果搞的这些逼供信，现在没有一个不翻案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并不怕搞逼供信。他希望你搞逼供信，真真假假，将来他好有机会翻案”，所以，“这个逼供信造成的结果确实是害人不少”。①阶级敌人欢迎狼牙棒和拔牙齿一类的逼供信，是因为将来可以“翻案”。这种荒唐的思维却从反面说明，普遍性的暴力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暴力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关系缺乏或者说是没有作出明确的认识有关。暴力当然是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选择之一，但是，由谁来行使暴力，暴力的作用范围，采取什么样的暴力形式，如何看待民众的暴力行为并在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后如何约束等等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长期以来对革命暴力的宣传，使得青少年一代和其他一些民众自然地

① 引自《清华大学优良贯彻执行到知识分子“再教育”“走出路”的政策的情况》，载《学习材料汇编》（二），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1969年7月。

把革命与暴力超时空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采取什么方式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妥当处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我们应该从“文革”暴力潮的教训中应进一步总结的东西。

目的与手段

暴力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手段。马克思指出，暴力是孕育于旧社会中的新社会的助产婆。在激烈尖锐的阶级对抗的年代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面对反动势力把残忍与血腥强加于中国人民时所作出的回答。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正是通过暴力形式才实现的。建国之初，也正是通过对残余敌人反抗活动的坚决镇压才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因此，任何对无产阶级为获得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采取的必要的暴力恐怖手段进行所谓道义上的谴责都是空洞和缺乏实际意义的。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人们往往不能在恐怖与非恐怖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选择革命的恐怖或反革命的恐怖。正如巴林顿·莫尔指出：“暴力是人们为与受压迫的过去决裂和建设一个较少压迫未来所进行的一部分努力。”①

然而，暴力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恰恰是消灭一切剥削现象，根除社会暴力对抗的阶级根源。无产

①：【英】巴林顿·莫尔，《民主与专政的社会起源》，战士版 1966年版，第306页。

阶级专政的建立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因此，虽然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为依托，但是，无产阶级对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方式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暴力不过是其中一种选择。并且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和平建设并运用法律程序平稳地解决各种矛盾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目的最普遍的方式。直接的暴力方式将会愈来愈少采用，并且主要由国家的专政机关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来行使。社会性的群众暴力形式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已无存在的必要。正如列宁所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任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①

所以，在我国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之后，党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进一步在理论上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目的作了详尽的规定，他正确地指出：专政的作用是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防御外敌颠覆和侵略，而“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他又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②这是一些十分重要的论断，通过专政的职能作用，而不是依靠急风暴雨式的群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6页。

^② 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众阶级斗争方式，表明我们党选择了最为有利的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从本章所述问题的角度来看，建国后的历史表明，不受约束的暴力行为往往与“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有关，而当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时，大规模的人身迫害也势在难免。因此，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本来可以也应当成为党在选择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方式上的一个极好开端。

遗憾的是，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又使我们重新把“群众阶级斗争”方式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手段。并在“文革”中把只是在白热化的阶级对抗中才使用的过激手段作为普遍手段来使用。

在“文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引起人们更多义愤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文革”中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错误判断及其“防修反修”的目的和动机，而是“文革”所采用的手段。无论如何，社会性的人身迫害和大规模的武斗是人们最无法接受的。

但在事实上，“文革”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与其对目的的认识是不可分的。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吸引着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追求和实现它，而目的的完美性又恰恰掩饰了手段的非法性，给它披上一层耀眼的光环。战争年代中的阶级斗争等于暴力对抗的模式被一些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重新祭起。由此，在社会正常发展中为健全的理性所无法容忍和接受的残酷行为，所以在“文革”中司空见惯并使人们心安理得，并不仅仅是由于麻木，而是“文革”时特殊的价值观念使然，目的的正当性赋予了手段以正当性，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丝毫的温

情。而无论是以“破四旧”为名的红卫兵的打砸抢、在群众专政下进行的人身迫害，还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武斗，莫不是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的，总之，皆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这种逐渐习惯的逻辑使人们的良心得到了安慰，使他们面对受害者凄惨的哀号和血淋淋的躯体时能够无动于衷。一个人只要被宣布为“黑帮”、“走资派”或“反革命”，他的人身安全，即不受任何法律形式的保护。因此，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倍受摧残之际试图以宪法来保护自己时，他怎么能够想到自己已是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呢！

这并不是说，党和毛泽东选择了暴力作为“文革”的方式之一，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多次表达了自己不赞成打人、戴高帽子和武斗。但是，当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制止这些行为有可能干扰自己对“文革”的设想、泼群众的凉水时，他选择了容忍。例如，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在批斗过程中打人、罚跪、揪头发、污辱妇女等非法行为的事件。对此，中央于6月20日批发了北大文革简报，肯定了北大工作组制止这些行为的作法。但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将乱斗乱斗行为当成革命行动要予以平反。而毛泽东出于要天下大乱、以赶走工作组为契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考虑，对此加以首肯。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只要大方向正确，手段和形式是次要的，而江青、康生、谢富治正是利用毛泽东对“文革”的通盘考虑，公开煽动群众采用极端手段。江青在一次集会上当众拥抱殴打工作组的女红卫兵。而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则网开一面，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

人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①

然而，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予制造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而当时的宣传机器无视这些血腥的事实，反而大声称赞说：革命群众的行动好得很！

“文革”中发生了无数起野蛮的残害无辜、草菅人命的行径，但在当时真正受到惩处的凶手却很少，这不仅是由于法制受到破坏，同时也因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手段仅仅是方式问题。但即使是真正的革命也不能是不择手段的。恰恰相反，正当的目的也只能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是因为，目的正当性并不能通过自身得到证明，而动机与出发点的合理性也必须通过它的社会效果才能得到检验。历史研究毕竟不是道德评判。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出发点及其所称要达到的目的的研究，必须与事件的社会效果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只有放在历史本身的过程中才能给予客观的评判。目的与出发点的合理性不是为其结果的非合理性进行开脱的依据，反之亦然，非合理性的目的与动机也不能被用作否定其合理性结果的根据。当然，这里是就目的与结果出现悖论的情况而言的。事实上，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必须包括事件的全部实际过程及其采用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是合乎真理的。这也许是我们应当从“文

①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1页。

革”中的暴力行为所汲取的基本教训。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世纪教会与法西斯的理论。欧洲中世纪一位名叫尼希姆的主教在1411年写道：如果教会受到严重威胁时，教会就不受道德的约束。统一作为最终目的，采取一切手段都是无可指责的。即教会职务可以买卖，出卖变节，并进监狱以及谋杀等等。这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目的而存在，个人应当为社会福利而牺牲自己。^①法西斯党魁戈培尔在日记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地：元首说，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是唯一的道路，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必要性上都是正确的。当我们取得了胜利，谁会问我们用了什么方法？^②

诚然，“文革”中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文革”暴力潮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择手段”观念的反映。

当然，即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也并不排斥对内使用直接暴力，但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成立，即针对运用暴力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和各种刑事犯罪，而使用暴力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为人道的事业，因此它的基本手段也必然是人道的。“文革”前我们对那些战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采取的有效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的方式便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合理地用暴

^{①②} 转引自〔苏〕保福有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656页。

力，真正受到伤害的是革命与建设本身。因为它损害了革命与建设的信誉，削弱了所必需的社会支持力量。

更何况“文革”完全是一场虚假的革命，即根本不存在进行这种革命的任何基础。因此，普遍的暴力行为除了给社会造成空前的破坏外，毫无任何积极意义而言。而放任或是默许民众性的暴力行为，只会造成断送无产阶级专政以致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

七 文化资源社会占有的再分配

在极左思潮的狂飙中，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和确定的趋势，这就是对文化及文化载体、精神生产与精神产品的蔑视与对抗。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文革”所冲击的主要对象的社会地位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那么他们不仅仅是所谓“当权派”与“学术权威”，而且是社会的管理阶层和知识文化阶层的代表，是社会的主要脑力劳动者和文化精神产品的直接创造者。“文革”对这两个阶层的强烈冲击必然地伴随着对其劳动方式与创造出来的文化精神产品的否定，否则，就难以把他们作为这场“革命”的对象。但是，“文革”所进行的这种否定，并不象其最初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消灭”或是“无”，这种否定的实质是要重新实现一种社会角色的转换，即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左”的指导方针对既定的文化创造与占有方式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些体现“文革”成果的“新生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便反映了这种要求，例如，教育革命中高等学校招生改为不经文化资格考试的推荐制度和工农兵对各级学校的直接管理，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变成单纯体力劳动者的各式“五·七干校”，以转换服务对象为主要目标的卫生革命及其极端表现形态的所谓

“对流换岗”等等。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漫长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传统，“文革”却几乎走向相反的极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失去其象征与比喻的本义，于是便有了不学无术的白卷“英雄”反被视为文化糟粕。而满腹经纶的饱学教授却被讥为“最无知”这种畸形而荒唐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竟然颇有市场。

这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现象。

“文革”并不象其所称的那样，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也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本义是对愚昧、不文明和文化专制的革命，而“文革”恰如人们所说，是“革了文化的命”。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这一称谓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不只是因为它首先是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发动和展开的，也不仅是因为它最终造就的是文化荒漠，而是因为它曲折地反映了“文革”发动者的深层思想根源，反映了千百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精神枷锁及由此引发的迫切改变文化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深藏于政治上“反修防修”这一直接目标下，却是造成“文革”迅猛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失误使得这种愿望适得其反。而当极左思潮把这种文化革命的要求纳入自己的轨道后，它便表现为一场文化浩劫。

一般而言，文化是指人类在精神生产领域内的创造活动及其产品，它具体表现为各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及相应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同时，文化又不仅仅是已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还包括这些精神财富的创造、分配与消费的

全部动态发展过程。而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系指文化生产据以进行所占有的特殊社会条件和社会地位、文化精神产品的形式及其分配和消费方式。

列宁曾把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称为“思想关系”。当人们以政治革命谋求改变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物质资源、财富的占有方式时，对“思想关系”变革的实质即是对精神文化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方式的变革，它是基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基础之上的。当“文革”自诩为一场政治革命时，它必然也要同时从“文化”这一层面上进行相应变革。比较而言，“文革”对文化的“变革”比其所进行的政治革命似乎更为有效，只不过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和直接现实性冲淡和掩饰了这一结果。“文革”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革命化”，把绝大多数人类优秀文化财富都斥之为“封资修”的东西，对文化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并且基本上打碎了建国17年来我国形成的文化结构体系和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方式。

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①历史一再印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不仅支配着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而且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但是，党内左倾理论错误的发展升级使得对这一现实的判断也发生了动摇，误以为我国虽然完成了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页。

改造,但并没有实现对精神文化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所以会产生“文化资源占有再分配”这一现象的错误前提。因此,我们首先探讨在“文革”前我国文化资源社会占有的方式。

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形式

旧中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文化落后对我们有双重含义:第一,文化资源十分贫乏,它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和文化产品的缺少,虽不乏少数优秀文化遗产,但从总体和人均看,都是极不相称的。第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它表现为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知识长期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及其影响。近代的“文化革命”只涉及到前一个问题,而对后者却很少问津。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次次的挫折使先进人士们认识到“船坚炮利”并不足以御外侮,没有文化层面上的根本变革,就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把寻求精神文化变革以改造中国现实的民族自省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这种文化变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囿于如何改造传统文化,采取何种观念以图重构文化、振兴民族的范围内,它没有从根本上涉及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问题,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文化专制主义、使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精神文化财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同时具备了可能性:一方面,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的现实，将其作为民族文化重构的基础和核心；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在破除剥削阶级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独占的同时，结束他们对精神文化财富的垄断，消灭文化专制主义，使劳动者不仅占有他们所生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能够占有他们直接或间接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成为新型的劳动者。这是从根本上克服文化落后状况的唯一出路。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地宣布：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国家，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纲领，它使饱受专制与愚昧之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未来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希望和力量。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而正确的主张，他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文化，不但不排斥、而且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长期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

^①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第624页。

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针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他强调对外国文化必须根据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吸收；针对封建文化中良莠并存的状况，他特别告诫人们要把带有封建毒素的东西与“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奠定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强烈地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与文化愚昧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他进一步阐述说，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五·四”文化运动虽是彻底的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但这场文化运动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中去，实际只限于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①这种大众文化的思想，即是文化上的平等观念，它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一样，对于动员广大民众、唤起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劳动者在文化上翻身的强烈愿望，决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那些宁可全家省吃俭用、受苦受难、历尽万般艰辛，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的农家，在中国比比皆是，只是在旧社会残酷的经济压榨之下，这种强烈愿望被暂时地压制了下去，无法实现。

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1949年9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郑重地宣布：“随着经

^① 上述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1—553页。

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落后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不仅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劳动者成了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也因为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消灭，劳动者真正拥有了他们曾被剥夺的占有精神文化资源、享有精神文化产品的权利。在历史上，他们不但第一次真正成为物质生产的支配者，而且第一次享有了对社会精神文化财富的支配权。社会的精神文化生产已不再是异于他们的过程，更不是异于他们的力量。劳动者不但拥有了与体现他们根本利益的国家管理阶层和专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同样平等的政治地位，而且也拥有了精神文化方面同样平等的权利。这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社会分工曾造成了人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阶级的出现和划分又促成了二者的对立，并把后者变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专利品。现在，社会主义使二者的统一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没有消灭分工，但却消灭了造成二者对立的阶级根源。

于是，在新中国出现了新型的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形式，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同样平等地享有创造、占有和消费精神文化财富的权利。

这种新型占有形式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与这一制度和联系的精神文化特权现象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92页。

已失去它存在的基本社会条件。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别依然存在，在这已只具有纯粹社会分工上的意义，不存在孰高孰低、何者治人何者治于人的问题。第二，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文化资源的社会占有形式不是通过所有制形式实现的。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关系。例如，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等。这是由精神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即精神生产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性的生产，并且总是表现为一次性生产，社会性的协作方式本身不过是为其创造生产的必要条件。就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而言，它在消费过程中，其使用价值并不象物质产品那样逐渐消失，而是转移。第三，它从根本上消灭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创造了现实可能性。劳动群众不再被视为游离于社会精神文化圈外的芸芸众生。劳动群众摆脱文化上的愚昧无知状态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动力。它标志着以“愚民”作为统治方式的历史已经结束。

因此，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所宣布的基本文化纲领在这种文化资源的新型占有关系中开始逐步得到实现。

但是，由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极端落后的文化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改变。同时，也由于我国上层建筑各领域本身的不完善及其存在的某些弊端，以及旧文化思想的影响，因而要实现劳动群众完全的文化解放，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和谐统一，尚需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此外，普及文化，掌握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渐进积累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客观差

差异不可能消失的，因此，在不同的阶级与阶层之间，例如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非对抗性的利益矛盾和不同的经济要求，以及相应的在精神文化方面需求的层次差异和矛盾、在文化资源占有量上的不同等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劳动阶级与阶层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权利也是完全平等的。因此，这些差异和矛盾完全可以并且也能够通过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予以逐步解决。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人们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导致文化专制主义与等级主义的阶级根源已不复存在，精神文化特权阶层与物质特权阶层一样，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社会条件和合法性。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迅速改变文化落后状况的最大障碍。

然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的错误判断，同样也左右了对文化现状的判断。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对文化领域现状的错误判断

在左倾理论看来，如果说政治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推行一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那么精神文化领域内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和严重。这不仅因为同样存在着“领导权”与路线问题，还因为各种文化形式及其内容，它们的创造和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还没有受到革命的触动与洗礼。政治上面临的是革命后的“复辟与反复辟”问题，而在文化上却面临的是进行革命的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对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问题的一些讲话和指示集中代表了这种认识和判断。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同年12月，毛泽东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社会主义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办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都必须改革。

同年6月，在一份报告上，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

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5年6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强调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部门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劳动群众服务，强调工农兵群众不但应享有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而且应直接参与精神文化的生产与管理，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因此，当他感到文化领域各部门未能贯彻和体现这些方针时，他不能不作出反应。然而，他却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因此，对文化领域现状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便不可能不产生很大的出入。从他的上述看法中，不难得出下述几点结论。

首先，他对文化领域状况的总体判断是否定性的。虽然他也提到“不能低估”这些部门的成就，并提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但对于总的状况是不满意的，认为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

其次，从这种总体否定性判断出发，他强调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部门“收效甚微”，上层建筑这些领域的状况并未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从而暗示了要在这些部门内进行一次根本变革的观点，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则印证了

这一点，因此，“文化革命”这一概念的再次提出是毛泽东对文化领域现状所作判断的必然产物，而这种“革命”的内容和方式也非即兴之作。

第三，对文化领域现状的错误判断构成了左倾理论对整个国内政治局势所作的错误估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忧虑和担心，他把文化领域内的各种现象视为“修正主义”上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前所作的思想文化和舆论方面的准备，从而得出危险迫在眉睫的结论，最终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但是，仅就这些批示和讲话的直接含义来说，似乎发动一场这样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尚嫌根据不足，不过，有几件事情的发生加快了发动“文革”的进程：1965年底后发动的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历史剧的批判；由此引发的对学术界的批判及彭真等“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围绕对“二月提纲”的争论；所谓的“三家村”，继之便是“彭罗陆杨”事件。这些事件环环相扣，启动了“文革”战车。与此同时，对文化领域内的错误判断再次升级，为“文革”的发动充实了理论根据。这些错误判断被集中地概括为“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界学术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等三个论断。

1966年4月，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篇“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和修改。“纪要”提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自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

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林彪在同年3月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就这篇“纪要”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并未夸张，这篇“纪要”的“黑线专政论”显然不仅对文艺界“有意义”，而且成为其后各界所通用的论断。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就学术批判问题指出：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他还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此言一出，文化领域内问题的性质就此定论。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的“5.16通知”则更进一步明确规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年浩劫就此首先从文化领域内拉开序幕。

在这里，尤其不能忽视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当时在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这一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江青自称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一个流动的哨兵”，“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我开

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①因此，她开始搜集整理有关资料，“送给主席参考”，并直接插手文教界，上述“纪要”不过是其中一例。而林彪则在“抓枪杆子”的同时，也开始“抓笔杆子”，在1963年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道，地主资产阶级的“印把子被夺了过来，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并进而断言：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陈伯达亦不甘落后：“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不少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而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的确，在思想文艺的阵地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篡夺了。”^②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使得“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破坏尤为严重。

何以对文化领域内的状况作出如此严重的错误判断？这与当时党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及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

“修正主义”与精神文化特权

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

^① 江青1966年11月23日在文艺界九会上的讲话。

^② 陈伯达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集会上讲话（1957年5月21日）。

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①
“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②

列宁曾认为，否认阶级斗争并且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内思潮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完全赞同这一点，他只是用自己的实践补充了一句：包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内。

但是，仅仅上述一个严格的列宁式表述定义并不足以反映毛泽东所认为的“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何况，上述定义只是一种否定性的规定，它只是根据修正主义反对和不主张什么而下的判断，完整的规定还应包括修正主义主张什么、它的表现形态及产生原因，即包括肯定性规定。这一点对于研究问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并不是通过概念来生吞现实的。在“文革”发动以前，党内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普遍的、并为人们所接受的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或思潮。相反，当毛泽东把问题提到“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惊人高度之际，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最为盛行、非逐渐为全党所接受之时。显然，应该换一角度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含义。

很明显，一定存在着某种十分普遍而又具体的社会现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②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象，这种社会现象使毛泽东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认为这种现象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并将其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以致于感到必须采取像“文革”这样一种彻底的、激烈的方式予以解决。

这种现象首先必须是普遍的，否则，它便难以引起毛泽东如此忧虑，也难以使全党对毛泽东的判断如此笃信不疑。因此，这种现象不可能是党内个别蜕化变质分子对物质特权的追求，更不可能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蜕变。这种现象又必须是具体的，否则，便缺乏立论的根据。因此，它不可能是抽象的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此外，这种现象也应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未引起足够注意和“警惕”的现象，否则，毛泽东不会这样反复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现“修正主义”。

通过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及左倾理论的实践，可以看出，引起他深深不安的是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占的优势地位及其影响这种社会现象。它深深植根于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之中，而现行的社会分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事业体制虽然消灭了对抗的根源，但并没有能够弥合这两种社会劳动之间的差别，反而继续维持着一个高居于体力劳动者阶层之上的享有优越的精神文化权利的阶层。这正是社会主义时期导致修正主义和新的阶级对抗的基本原因。因此，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不单纯是观念上的革命，它还包括着对产生这种现象的精神文化生产的方式及其占有形式的变革。

这种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两方面，在社会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事业领域内的一统天下，“少

教人”对精神文化生产的垄断，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在党内，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精神特权意识和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这必然导致不思进取、“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最后走向“修正主义”。

应该说明，这只是左倾理论的主观判断。

一、关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源的主要拥有者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直接创造者。因此，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判断是“文革”中对文化资源进行再分配是否成立的根据。从把知识分子视为依附于资产阶级到将其作为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左倾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痕迹，为“文革”所要进行的“上层建筑革命”作了理论准备。

1957年后，知识分子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而成为各种矛盾的聚合焦点之一。在毛泽东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内谁胜谁负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后，作为社会中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直接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因比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更为优越的精神文化地位而被视为异己分子。如果联系到我国长期存在的劳力与劳心之间深刻的对立情绪与心理，那么，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许就不那么使人感到过分吃惊了。

这一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改造的途径；知识产品归谁占有。

1956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分”，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推翻这一定论。

但是，毛泽东改变了这个结论。1957年3月，他提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同月30日，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更为具体地对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判断：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来说，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争取使其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反右”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激烈。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国内阶级状况作了分析，首次提出了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一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明确列入资产阶级。同年4月，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已经消灭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由此，毛泽东不仅改变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而且也改变了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开创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先例。但是，又有谁能说清究竟怎样来衡量在人的政治思想中不同阶级意识所占的比例？这种主观的而且是模糊的标准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这种标准的矛头指向便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管理阶层。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从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结论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必然会作出错误的估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承担着发展科学文化的特殊任务，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的劳动的社会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左倾理论对此也同样作出了不合实际的判断。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指示中不但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还提出知识分子的劳动（包括科学与教育）不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非生产者的概念，从而认为，没有工人和农民养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什么社会产品也创造不出来。在稍后7月份在上海市各界人士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要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从贬低知识分子劳动的社会意义，到把知识分子视为由工农养活的观点，否认了精神劳动是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维方式是我国近年来改变文化落后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任何社会物化劳动产品都不可能没有精神劳动的贡献，文明水平越高、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的进步就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也就更依赖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劳动。贬低知识分子社会劳动的作用和意义，正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狭隘小生产意识的反映，它也是轻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党内一直颇有市场的基本背景。事实上，这种状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内发生左倾错误时就曾出现过，当时在红军中，“知识分子”一度是一个十分不中听的骂人的话。与此同时，毛泽东甚至把历史上“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这种经验作为贬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根据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在贬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同时，又把知识分子视为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根源。这一看法在1957年就已见端倪，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1967年5月，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在谈到“文革”时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被修正主义把持了”。联系到毛泽东曾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教界的看法，不难得出结论，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直接就是指知识分子。随后，他又问这场“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当即有人作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派。毛泽东回复说：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棍子问题。

既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导致修正主义的根源，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便势在必行。建国之初，党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一直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和办法，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充分信任、积极大胆地使用他们。而广大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克服自己的弱点，把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自50年代末期以后，这种“改造”的意义却逐渐发生了变化。1959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在中国人民中肃清

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长期的事情。对这些知识分子，又要用他们，又要同他们斗争，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党。

继“反右”之后的“大跃进”中，许多高校关门，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随后，又发动了“教育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拔白旗”运动。那些绝大多数同情则为“右派”的教师、科学工作者被作为“白旗”下放到农村、草原、边疆。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发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对一大批敢于直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正确教育方针的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斗争。类似的“改造”从反右后到“文革”接连不断，知识分子不得不“夹着尾巴作人”了。

回顾这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历程，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改造的方式由温和到激烈、由复杂到简单，改造的途径也渐由“思想改造为主”转为“体力劳动改造为主”，期望通过简单地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劳动方式以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这种改造方式的逻辑前提是：知识分子易于“变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劳动方式。因此，所谓“改造”就是改变劳动方式，参加纯粹的体力劳动。显然，这一逻辑前提又恰恰与毛泽东和多数普通民众迫切想要消灭“三大差别”的意愿相吻合，也迎合了小生产者历史上形成的对知识阶层深深的潜在敌意情绪。因此，“文革”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管理阶层与知识阶层“上山下乡”现象，并非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冲动。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产品归谁所有。1959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有

些人把知识看作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①把毛泽东这一看法与“文革”前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部门收效甚微这一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对“文化革命”孜孜以求的思想原因。这就是：精神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属于社会所有，而这一点尚未完全实现。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劳动者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人民必须有权利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②孤立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无疑十分精辟。但是，当他试图以“左”的方式，尤其是“文革”这样的方式来实践这种原则时，事情便走向了反面。

二、关于党内干部脱离群众的特权意识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恃其所拥有的知识和知识的创造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那么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他们二者的共同之处便是其社会劳动方式。而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与干部管理阶层的原有劳动方式以“反修防修”，正是“文革”所实际进行的文化资源再分配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防止执政党的部分干部蜕化变质、从公仆转变为主人的现象，一直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

^{①②} 参见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

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①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同时，不懈地与自己队伍中各种不健康的成份进行斗争，从总体上保持着先锋队的传统和本色。

然而，毋庸讳言，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干部经不住执政党地位的考验，追求物质特权与精神特权，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变为追求享受的资本。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影响、从战争年代向和平管理时代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官僚主义在党内不断滋生蔓延，成为破坏党和人民历史形成的血肉联系的主要因素，这种官僚主义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作风，更突出地表现为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予以纠正。直到1957年前，党内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卓有成效地健康发展着。

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国内情况，又一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迫切性，他指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3页。

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写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十分耐人寻味。它反映出在“八大”作出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后，到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改变“八大”这一论断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种考虑。他把官僚主义作为阶级斗争矛盾解决之后的新的社会矛盾来对待，这种矛盾虽属内部矛盾，但其发展结果却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此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思考，是游离于“八大”所规定的非阶级矛盾与“阶级矛盾”之间。官僚主义与人民的矛盾可以被视为一种临界矛盾。

基于这种考虑，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1957年进行一次以反官僚主义等为主的全党整风运动，显然，毛泽东的看法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赞同。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发表讲话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政府各级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这是错误的。然而，由于左倾错误开始滋长，整风为“反右”运动所取代，半途而废。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1月15日）。

与此同时，在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局势巨大变化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下，毛泽东从一个新的角度开始认识党内特权意识与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并把它与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毛泽东注意从理论上探寻产生特权意识与官僚主义的根源，并自以为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中找到了依据。在1968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都明确提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如等级制等。在生产关系的三方面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没有完全解决，马克思所说的平等、民主的思想尚未得到实现。他特别强调了供给制与工资制的对立，认为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工资制的建立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其结果是干部的革命意志衰退、脱离群众，不愿意继续革命。在11月份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作法，再次提出：工资制虽暂不能废除，但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等等。毛泽东在这里对“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是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

1969年年底，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①

^① 参见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直接现实的政治冲突似乎暂时冲淡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力，但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梦魇却执拗地深深地影响着他对党内状况的判断。他先是把本来有特定含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改变和扩大其内涵，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上的不平等、等级意识、特权意识等也包括在其中，进而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又一重要根源。这一点，从他以后的思想轨迹中可以得到说明。1965年，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在“文革”中的1967年7月，他在视察时谈到干部被批斗的原因时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而党内许多干部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一位老干部曾这样虔诚地反省自己：“作为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我对文化大革命给自己的教育感受很深，……群众批评干部，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我们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同程度地滋长了官、暮、骄、娇四气，甚至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冲掉了我们身上的修正主义灰尘，这有什么不好呢？……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和群众鱼水相依，如今为什么变得疏远了呢？这说明我们身上沾染了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灰尘。”^①因此，把脱离群众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视为修正主义，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① 《红旗》1970年第2期，第35页。

在“文革”的最后两年，毛泽东再次提及“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对党内干部的影响。他说道：“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多年来思索的一个总结。从对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的批评到被曲解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并进而把后者视为产生官僚主义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期望通过政治和文化的手段破除“法权思想”，达到克服党的干部阶层——也即是社会的管理阶层——中存在的特权意识，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但在理论上却又提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些内容汇集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内中并不乏正确的个别论点，但更多的是矛盾、是脱离实际的判断。

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结论，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的根源的错误分析，以及把这些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思考，使得在文化层面上所进行的所谓“变革”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

文化革命的歧途

“文化革命”本来是一个有着确定含义的概念。列宁生前曾制定了苏联文化革命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这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根本上克服文化落后的状况，并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管理国家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列宁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①显然，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是具有指导性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以后，党曾不失时机地号召进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并采取许多措施，加强文化教育，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开展扫盲运动，在普通民众中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等，由于消灭了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一发展文化的最大障碍，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善。

然而，由于上述错误理论的逐步发展，文化革命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工具，而当这种政治“革命”本身就不成立时，它对文化的破坏性后果也就越加严重。“文革”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在极左思潮的作用下，“文化革命”变成了一场对文化资源占有形式的“革命”，它不是通过迅速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上的需要，而是着眼于本身就十分贫乏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主要是通过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文化生产和占有的权利，给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以优惠的文化权利，以期达到所谓“反修防修”，实现劳动者对上层建筑的管理权，完成在文化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达到公平原则等目的。然而，这种对现有文化资源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只能导致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剧下降，它非但没有提高一般民众的普遍文化程度，反而把高文化的社会阶层人为地、强制性地降低到低文化层次的阶层。因为，文化资源不象钢材或木材一类的物质资源那样可以从这里搬到那里，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可以剥夺甚至毁灭，但不等于能够理解和掌握它。所以，单纯文化资源的流动与转移并不象在物质生产领域那样会增加其价值和产品量，相反，它只能使有限的资源在盲目的运转中白白消耗其价值。

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资源的转移或是分配，并非是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阶级之间进行的，而是在自社会分工所决定的社会不同职业之间进行的，其典型表现就是把那些从事被认为最可能产生“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职业的社会成员，例如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成员，视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对象，从而部分地或在某种特定局势下全部地剥夺他们从事文化与管理工作的权利或条件，但是，由于社会不可能不存在分工，也不可能取消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文化与管理事业，因此，既是出于必然，也是出于某种主观理想，那些被视为革命阶级和革命动力的社会成员便被用来充当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用以填补因政治动荡而造成的某些社会分工的“真空状态”，以勉强维持社会发展的起码平衡状态。显然，这种现象不仅是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因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步入歧途的“文化革命”主要表现在下述几点里：

一、背离了文化革命的本来目的。

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发展文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落

后的状况。但“文革”一方面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先导和工具，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革命与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改变了文化革命的对象和意义。另一方面，把文化革命作为在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手段，因而使得文化革命的对象集中在文化的基本载体知识分子身上，从根本上阻塞了文化迅速发展的道路。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载文称：“照一般的历史情况看，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可能不触及到政治，不可能不触及到经济”，因此，“文化大革命”“不能只是批判几个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问题”。林彪在1967年“八·七”讲话中一语道破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所谓“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行为，它号称要破除“旧文化、旧思想”，但实际上破掉的却是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传统和文明结晶，复活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愚昧黑暗的时代。它罢尽文化百家，独尊“革命样板戏”，它把数亿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压低缩小到了极点，造成了近10年之久的文化荒漠时代，制造出现今被称为“文化断层”的现象，其后果之严重较之对经济破坏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更甚。

二、大规模的社会角色转换破坏了社会运行的正常机制。

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后，即从党的“九大”前后开始，社会一直存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运动潮流，一股是从上到下，即管理阶层、知识阶层以及城市“知识青年”

到农村和边疆的潮流，另一股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进驻上层建筑各领域行使或参与直接管理权利的潮流。相比之下，前一潮流的声势更为浩大，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在一般情况下，干部、知识分子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到基层、农村工厂中深入实际生活，对于更深刻地了解现实，克服自身由于分工所造成的某些不足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事情。同时，国家机关、文化部门以各种形式吸收工农群众参与管理，或给他们从事各项文化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条件，也更有利于发挥工农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这正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提倡和实行的作法。

但是，“文革”中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性质则不同。因为其前提是把这两个阶层当作产生修正主义的主要来源对待的，因此，无论是它的具体作法和社会效果也都具有了不同的含义。1968年9月5日，西藏和新疆同时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如何处理各项遗留问题，摆上了运动的议事日程。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文章，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揭开了这一大规模潮流的序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文化各界闻风而动，派员到偏远农村选址。随后，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离城赴乡。一时间，人走楼空。中央和国家机关除留少量坚持日常工作的大员，余皆奔赴干校，而文化各界则走的最为彻底。以全国文联为例，有近上万人云集干校，几乎所有在京的当代中国知名作家、诗人等及其他文化工作者、作协和文化部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到了干校，诺大一座

文联大楼除几个专案组成员外，只剩几位被立案审查的对象。^①事实上，当时中国的上层建筑部门中除了维持国计民生的部门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正常工作的人员外，其余部门已基本上无法行使社会分工所赋予它的职能。

与此同时，另一股潮流也开始萌动。先是为解决大学中的内乱而大规模地派驻了工宣队与军宣队，随后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农)宣队。这种最初出于权宜之计的方式不久就被作为方向性经验而被推广，卫生、文化界在可能的范围内也都接纳了这样的宣传队。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更为“深刻”的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教育界工农兵上管改大学；卫生界强调培养“赤脚医生”；科技界要侧重从工人中直接培养选拔科技队伍，理论界文史哲走向田间地头，建立工农兵理论队伍。而干部的选拔则毫不顾及知识与能力，只要在运动中表现出色并得到赏识，就有可能连跳龙门跃居高位，等等。孤立地看，这些“新生事物”中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出现，更多地具有的是历史消极意义。

这种双向潮流的大规模迁徙，打破了整个社会平衡发展的运行机制，后果十分严重。对于这两种潮流的社会主体来说，他们放弃或基本放弃了原有社会职能而去采用自己所不熟悉的劳动方式，这本身就是绝大的浪费，更重要的，它不仅从总体上降低了我国各项基础文化事业的水平（即使不提“文革”初的“停课闹革命”，工宣队后来抓“教育革命”的方式及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由于文化科技人

^① 参见陈白尘：《云间梦忆》。

才的下放等原因，除了受冲击较少的国防科技外，标志着一个民族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各项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产品的创造活动也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无法正常进行，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与世界文化科技水平的差距。如果把“文革”中的“政治可以取代一切”的实际作法的因素再考虑进来，那么实际的破坏更为严重。此外，大批干部离开管理岗位，以提拔大批缺乏经验、知识和技能的新干部来补充空缺，导致整个国家和各项政府活动效能的急剧下降，同样，这里还暂未考虑这些“文革”中提拔起来的大多数人对于政治运动和权力的热情。

当然，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是离不开不同职业和岗位之间的人员流动的。但是，“文革”的这种作法是基于把某些社会职业主体作为可能的异己来对待的，因此，它实际的社会效果近乎于一种社会阶层的大转换，只不过是程度上来能也不可能完全作到这一点罢了。

三、对知识的鄙视。

一场文化革命却造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对文化知识的轻视，这大概最能说明这场文化革命的实质。“文革”中对知识的鄙视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导致对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的偏见。毛泽东曾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但他只是极而言之，表现他心目中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这种现象的不满。但在“文革”中，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知识分子不但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学问也是假的。“文革”中出现的“考教授”现象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此外，政治上的需要也使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予以否定成为必要、在接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豆腐”，闹起

来臭，吃起来香。因此，“文革”便政治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更致力在业务知识上贬低知识分子。例如，对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著名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的批判，除政治批判外，梁思成的建筑科学知识被说成无非是“搞大屋顶，复古的东西，再就是加个电话自来水什么的”，他对保持北京古老建筑风貌的构想被诬之为“复辟封建主义”。对梁思成建筑学的否定是导致“文革”中对北京城墙等古建筑予以拆除的因素之一。而刘仙洲的机械学原理也被讥之为“木头杠子大石头怎么动，怎么推磨的，害人不浅，根本用不上”。于是在当时清华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的心目中，这些“反动权威”真正被批臭了。

其次，形而上学地理解知识的产生途径，把直接的生产劳动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文革”对过去教育制度的全面否定，对已有的科学知识的结晶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这种思想方法所致。北京大学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说：“关门死读书，使许多大学生不会作工、种田、打仗，越读越蠢，成为书呆子，修苗子。”^①而复旦大学大批判组说得更为具体：“旧大学的理科，关门空论，……文化大革命前的我校数学系，走的就是‘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的关门研究道路，论文写了几百篇，却根本不能说明和解决生产实践中提出的任何问题”。^②类似的观点在“文革”中为人们普遍接受。于是，似乎只有完全摆脱课堂和书本知识，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那些基础研究、理论知识，则往往因为不能解决直接的生产技术问题而被视为“空谈”。“文革”中的教

^{①②} 《红旗》1976年第1期第59页，第46页。

言革命，文化革命正是按着这种认识方向进行的。

第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

“大老粗”在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中成了十分令人‘自豪’的字眼。而“不学数理化，照样干革命”一类的豪言壮语更是颇有市场。最能够说明“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的例子，莫过于“四人帮”一伙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讨伐。在数学方面，他们把“公理化体系”宣布为糟粕予以否定，把宇宙学等同于哲学上的“宇宙有限论”加以批判，把化学界20世纪以来分子结构的多种理论都贴上“资产阶级理论”的标签而予以摒弃。荒唐的还有1970年在上海出笼的一篇《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中宣布：“爱因斯坦通过相对论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杂揉在一起。”“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它鼓吹真理只是相对的、主观的，根本否认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否认真理的阶级性”，用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极乐世界”。^①对现代文明与科学的亵渎大概莫甚于此了。

四、文化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的复活。

极左思潮对文化事业全面破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社会主义本已经绝迹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死灰复燃。江青自称：“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的”，^②文化艺术界“只能有一个中心”，“直接领导是我，秦衍、文元、任何人不得插手”。^③在他们的统治下，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78年1月28日，《“四人帮”如何利用相对论问题大作文章的》。

^② 《红旗》1977年第4期，《一个反革命野心家的世界观》。

^③ 197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文化艺术界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队伍上，他们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对文艺界人士进行各种残酷的迫害。在文化创作上，把“革命样板戏”作为唯一的模式，把“三突出”作为唯一的原則。江青居然说，“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问题，自从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才解决了。”^①

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下，党的“双百”方针受到了粗暴的践踏。而张春桥竟公然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更有人竟建议把“百家争鸣”改为“百鸟朝凤”。^②

文化专制主义必然伴随着愚民政策。“文革”对文化的“革命”，使得我国原本就落后的文化状况更为落后，整整一代青少年几乎未受到任何文化教育，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从事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条件和机会。社会的文盲人数有增无减，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普遍下降。这对于“四人帮”等来说似乎还不够，在他们把贫穷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同时，更把全面的愚民政策作为巩固所谓“革命秩序”的基本手段。张春桥就声称，“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③文化专制与愚民，正是他们所称的在文化领域内全面专政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文化层面上的所谓“革命”构成“文革”暴

① 江青1976年1月26日对中国艺术家的讲话。

② 引自《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③ 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的一次谈话。

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领域内现状的错误判断构成进行这种“革命”的理论基础。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革命纲领，给极左思潮对文化事业的破坏性行为提供了合法根据，最后导向了文化专制主义。

八 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一)： 价值观念与社会心态的契合

在极左思潮最为盛行的日子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曾虔诚地在极左思潮的祭坛上奉献过自己，那些率先冲上社会大破“四旧”的青少年，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群众，目不识丁的六老粗，从不问政事的家庭妇女，甚至于那些遭“文革”打击的“黑五类”、“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们，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抵御得了极左思潮的诱惑，能逃脱它编织的罗网。一个被极左思潮裹挟又裹挟着的民族几乎是在瞬间便步入了狂热迷乱之中。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自己，问每一个从这场浩劫中走过来的人：极左思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国人，而且更使那些站在局外研究中国“革命”的国外学者大惑不解：“为什么中国社会对一小批领导人的号召会做出这样极端的反应？这么多中国人怎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他们在穷究一通后仍觉不得要领的情况下不由抱怨说，中国人本身大概不会提供理解他们嗜好走极端的细微的指导，因为他们缺乏灵魂自省的精神。^①这当然是偏见，但

^① (英)J.L.W·派伊：《再评文化大革命》，载伦敦《中国季刊》第108期。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确实，从本质上看，极左思潮既不能代表社会多数成员的现实利益，也不能代表他们的长远利益。它带给社会的只是无休止的政治角逐、凋萎的经济、禁欲式的生活方式和僵化的意识形态。一种根本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的思潮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多数人的信奉和实践，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

近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例如，关于个人崇拜、封建主义观念和传统的影响、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意识，多年来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种种失误对民众的影响、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强烈愿望和冲动等等。这些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极左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能够暂时地掌握群众，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它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观念交互作用、影响的产物。

在我们这样一个低文化层次的国家里，能够促使社会不同阶层的多数成员迅速而狂热地接受某种理论或思潮的动因，往往并不是来自这种理论或思潮自身的力量。极左思潮即使在当时也是缺乏严格的论证和前后一贯的逻辑性的，更不用说它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我们在前文中谈到过，一种社会思潮所以能够打动和掌握人，主要在于它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于它聚合了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回顾60年代那令人癫狂的岁月，没有任何社会问题能够象“革命与复辟”这一组主题那样更能搅得人们坐立不宁、寝食不安的了。而“革命与复辟”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最高

表现形式。

因此，尽管社会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成员由于其在职业分工、文化素质、社交环境和信息多寡等方面的客观差别而对这一主题（连同产生这一主题的整个理论）持有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对这一主题的真实性笃信不疑，或是认为这一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立——他们都必然地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对此作出反应。当然，或许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并不关心这种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他们注意的是更为现实和具体的问题。但是，在我国这样一种被高度严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决定他是否参与或介入的主要因素。“文革”发动前后，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的高度政治化的特点决定了每一个单位都把政治内容作为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来抓。而所谓政治在当时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总结、批判、表态等使生活于“单位”之中的个人往往身不由己。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积极与否，往往与个人的前途、晋升、职业保障、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最为具体现实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上消极或是漠不关心往往被视为是落后的表现，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下次长工资问题。而倘若不幸被划到政治上敌对的一方中去，那么，他就完全可能失掉他现在生活的保障。因此，信不信在你，关心不关心也在你，但参与不参与却由不得你了。所以，多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得人们至少是在公开表露的一面把注意力的焦点投向了“革命与复辟”这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

以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极左思潮所以能够暂时

地掌握群众，正是因为它把这一主题用极端的形式和手段表现了出来。但这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极左思潮并不只是因其体现了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才能够迅速扩张泛滥。极左思潮同时也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人们有在着的某些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适应了某些社会阶层和成员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一批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鼓吹和推动极左思潮的中坚，也是极左思潮的真正社会基础。因此，从是否在总体上反映了客观现实而言，极左思潮是虚假的理论，但就其有着存在和扩展的社会根源而论，它又不是依靠简单的“抛弃”就能够根除的思潮。在本章中，首先阐述极左思潮与人们某些价值观念与心态的契合之处，这是极左思潮能够动员起千百万群众的基本原因之一。

“继续革命”的主旨与社会发展

对于60年代的中国人民来说，“革命”是一个充满号召力的概念，它意味着进步、发展和变革，意味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这一概念密切地有机结合在一起。

1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受尽屈辱、压迫、痛苦和磨难，数亿人的被次六国沦为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数志士仁人曾为拯救处于危亡之中的民族而艰辛奋斗，或是改良维新，或是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实业救国，或是诉诸暴力，争取重建大同。但这些努力均遭失败。只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才使中国人民有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最终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走上了民族振兴之路。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又使得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又迅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

革命魔幻般地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这种奇迹又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的革命热情。面对着共和国贫穷落后的现状，曾用革命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党和它领导下的民众，同样期望着用超出常规的变革方式实现社会迅速发展的目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热情的支配下，革命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方式转化为解决社会各个领域内矛盾的普遍方式几乎是必然的。于是，除了经济领域内的所有制革命外，又有了生产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等。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与发展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革命运动”，正是反映了人们对革命的这种普遍认同感。

“大跃进”是党和人民试图用革命方式和革命热情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一次全面努力，但是，严格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却无意迁就任何浪漫的想象和举动。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与以为只要靠双手、汗水和牺牲精神就会得到相应报偿的思想，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建设事业与革命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此，虽然经济发展中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并未完全得到克服，但是用革命冲击的方式来从事经济建设的势头却受到了规律的遏制。接踵而至的三年灾害迫使党和人民按照经济发展自身的可能性来调整发展战略，

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计划经济的模式。

但是，这种挫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革命的声誉。革命冲击的方式固然不适用于直接的建设，但是人的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却可以激发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克服那些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促使生产迅速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所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量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持续不断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必然地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现解放生产力的既定目标，在当时，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此深信不疑。而各条战线的人民群众更是以无以伦比的激情对党的每一项号召作出热烈的反应。正如一位英国女经济学家在1964年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仍处于英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革命象福音那样受到欢迎，如同一种伟大的新宗教处于第一代时的情况那样。”但是，与此同时，她又表示了自己的怀疑：“然而，人类的天性，对这种道义要求的负疚，还能再承担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吗？”^①我们不能不惊异于这位学者敏锐的观察力，但是，如果她能够深切地理解中国人民对于社会发展的强烈迫切愿望的话，她也许就能看到革命热情与宗教热情之间本质上的差异。

所以，当党和毛泽东1964年又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还必须由

^①（英）琼·鲁宾逊，《展望中国》，载于英国《新科学家》1964年版。

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时，尽管广大群众对这种“革命”的具体所指还不甚明了，但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理论。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看到的是，革命即意味着前进和社会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最终成型于“文革”，但它的主要思想和论点在50年代末期以后便已逐步开始萌生。在“文革”发动前的近10年中，人民群众已在事实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还必须不断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且很自然地把这种“革命”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文革”发动以后，他们虽然对采取的这种方式及所要打倒的对象曾有过短暂的困惑，但还是把“文革”作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之中。并且在“文革”前期，以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承受了“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损失。支持着他们的基本信念便是这场社会革命代表着他们的长远根本利益，变革之后的社会必然会以更高远的社会发展补偿现在的损失，革命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人民群众在逐渐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利益之所在时，也即意味着“文革”已难以维持。

强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对“复辟”的危机感

在前面我们已就在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强化和升级的历程作了简述。正是这种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引发了社

^①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会性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与恐惧感，而社会以同等程度的力量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在“文革”前，左倾理论升级的势头已日趋明显，但这种状况毕竟主要只限于党内，并且还没有上升到主导性的支配地位。虽然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提出了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这一论断也只是到了“文革”发动以后才公诸于众。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复辟”更多地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和可能性，而不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战胜了严重困难又重新走上坦途的欣欣向荣之路的社会主义。所以，在“文革”前，对迫在眉睫的反修防修的焦虑和担心主要还只是限于党内，并且主要限于党内上层的毛泽东等人。但是，多年来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实践也在各界群众中产生了实际效果。他们明了他们所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被“颠覆”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过，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还主要地停留在与被推翻了的被剥削阶级作斗争这一点上。“文革”之初群众的斗争矛头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指向原来的剥削阶级成员便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旧剥削阶级成员毕竟已是“落水狗”，他们的能量似乎还未大到使人感到有着随时可能复辟的危机与恐惧。

然而，当复辟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中央时，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奏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当绝大多数人把这场争论还当成学术问题，并且党内许多领导人试图把它限制在这一范围时，斗争却不断向纵深发展。先是所谓“三家村”被揪出，继之，党内又揭露了所谓“彭罗

陆杨”反党集团，这一系列事件震惊了全党，也震惊了整个社会。而在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等人听闻地列举了国内外历史上数十起政变情况，并且说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搞掉。”进而提出“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以及他那“四个念念不忘”。^①

与此同时，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告诫人们注意“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把对所谓“三家村”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抬到惊人的高度：“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向前发展，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对这场斗争，切不可等闲视之。”^②稍后，《人民日报》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那些反党集团的一切罪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反革命政变，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揭发出来，他们肯定是要对人民下毒手的。”^③

这是何等危险的局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机遂就此从党内扩展到党外，从上层蔓延到下层群众。进而，“无

① 转引1966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② 《红旗》1966年8期社论。

③ 《人民日报》1966年7月1日社论。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向教育工作者，向青年学生，向一切文化工作者，也向一切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①

人民群众当然会作出选择，他们也别无选择，只有奋起捍卫危险之中的社会主义。然而，斗争的最终矛头只是到8月以后才清晰起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宣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纪念毛泽东这篇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之际，左倾理论宣称：“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是‘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它的头就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最主要的是来自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②广大群众真诚地相信了这一切，他们对于旧中国有着太多的惨痛记忆，不能容忍也无法想象复辟回到黑暗的旧社会，而这一点正是左倾思潮动员和掌握群众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③

① 《人民日报》1966年6月6日社论。

② 《人民日报》1967年5月5日社论。

③ 《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

一位作为工宣队员进驻天津工学院的三条石老工人在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旧社会天津三条石工人的痛苦遭遇后说：“顺便我再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他们拼命地抓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前这个词（指意识形态——引者注）我都不懂，赶等一学习，一听这个事啊，你要不深入就不知道，一深入学吓一跳，他们要搞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的祖国要倒退，我们就要重遭二茬罪，这些革命烈士的鲜血要白流。”^①这种认识水平和心态在当时的基层群众中十分普遍。

继续革命的神圣使命和现实的复辟的危机感，这正是广大群众踊跃投身于这场错误实践中的重要原因，而多年来频繁的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心理与方式上的准备，消去了他们在投入方式上的障碍。

心理准备和参与方式

回顾“文革”之始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运动的过程，有两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个是广大群众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他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震动与投入几乎是同步发生。另一个现象是群众对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场“革命”似乎是无师自通。《十六条》中规定的如何开展这场运动的各种步骤方式，在其正式颁布以前就已为群众所使用。

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多年来高度政治化的运作方式有关。换句话说，多年来频繁的政治运动，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① 引自“三条石老工人张玉发忆苦思甜报告的录音材料”，编者不详。

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运作方式，为广大群众投身于“文革”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参与方式。

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建国以来十分引人注目的经常的社会活动方式。据统计，从建国初直到“文革”，各种全国全党性的政治运动大小不下50余次，^①在这些运动中，既包括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内的政治运动，如几次整风运动、反右运动等，也包括错误地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如经济领域和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前者如大跃进运动，后者如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等。当然，这些运动的性质和社会效果并不尽相同，有些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有些则是错误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从总体上看，依靠或主要依靠政治运动来治党治国，其弊端大于所得。而这些政治运动的共同基本特点又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动群众（包括党内群众）来进行，群众成为历次运动中的主体，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群众运动与政治运动几乎就是同义语。历次这类运动又都有着其相似的一整套程序性作法：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学习、宣传、动员、讨论，树立正反面典型，推广先进经验，然后是总结等等。在这一整套过程中，群众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们在不断熟悉和掌握这些方式的同时，也逐步在心理上认可了自己所担当的角色。

依靠群众来从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曾是我们党成功的历史经验之一。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当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继续沿用这种方式已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民主建设与法制建

^① 参见王绍光，《政治运动方式漫议》，载于《理论动态》第111期。

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毛泽东曾正确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成为过去。但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他非但没有放弃这种斗争形式，反而进一步探求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他所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①所以，“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便非常强调这是一场“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关于发动“文革”的《十六条》中，反复强调和贯穿于整个决定之中的，便是关于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来进行这场“大革命”，并为此告诫人们说“不要怕出乱子”，因为群众虽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成为“文革”中划分是否“走资派”的基本根据之一。

因此，一方面是社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处于程度不同的震荡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群众在这种政治运动之中逐渐地习惯和熟悉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对于这场至少在理论上完全是依靠广大群众来进行的“政治大革命”，他们在心理上的适应过程是很快的。

另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出现的大规模“从众”现象。卷入“文革”的群众为数众多，然而他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至少从现象上来看，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一呼百应”，领袖发出的每一个指示和部署都即刻赢得亿万人的热情响应，群众中自发产生的行为准则一经首肯，也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6日）。

马上会为社会其他成员所效法，从群众组织的成立到“新事物”的出现和普遍化，从“造反有理”的口号提出到“全面夺权”的发展，似乎都不难从中觅到“从众”心理的影响。联系到“文革”前各种一哄而起的群众政治运动，联系到“文革”后不断刮起的各种“风”，经商、出国、抢购、消费需求内容惊人的雷同，等等。“要么不干，要么大伙一块干”，

“从众”心理本身也快成为刮了几十年的历史“风”了。无怪有人得出结论说：从众心理本来就是我国民族心理中一种重要的成分。

所谓从众心理，一般是指人们盲目地追随多数人行动的心理状态。事实上，导致从众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从本质上看，从众心理反映出的是一种因软弱和孤立无援而寻求寄托和依赖的心情。面对着广袤自然的个人，会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因此，他们联合起来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抗争；同样，当面对着无法抗拒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时，当逆其而动便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测或受到损失时，人们便很自然地将多数人认可的行为准则作为选择的依据。一个人的选择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各是50%，于是，人们便将行为获得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多数人的选择上。久之，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一种心理惯性，毕竟，多数人的选择似乎比个人的选择更值得实践。从根本上说，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多数人的意志与选择的结果；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个具体进程中，在社会运行机制因各种原因受到破坏时，多数人的选择并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的：人民是会犯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了“众意”与“公意”的概念，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反映的是人们真正

的共同利益和要求。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当多数人的选择只是建立于经验性的众多个人意志相加的基础上时，这种选择是不可靠的；只有基于对事物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认识所作的选择，才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所以，导致“文革”大规模从众现象的，除了个人崇拜等因素的作用外，人民群众对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无力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文革”中群众的“从众”心理表现，就是“众意”的表现，因此，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从一人之意志”，群众运动成为运动群众而势所难免。

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核心的大民主，是广大群众参与“文革”的基本方式。“大民主”这一概念和它的实际运用始于50年代后期。1956年，毛泽东就曾区分了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并提倡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对待阶级敌人和党内官僚主义现象。^①“反右”斗争以后，这一“大民主”的概念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总结说：“今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多了。……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②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

①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6日）。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在概括“文革”的基本方式时，引述了毛泽东关于找到了“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话时指出，“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在“文革”中，这种群众参与形式的“大民主”得到了恶性的发展。它不仅通过“四大”表现出来，而且还表现为大串联、分派、成立各种战斗队，表现为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群众专政”。然而，“大民主”只是广大群众参与的一种表面形式，它看上去轰轰烈烈，但从“文革”后来的发展来看，它实际上只是放纵了少数人的为所欲为，使大多数人受到压抑，成为少数坏人和野心家煽动群众分裂、搞无政府主义和专制的工具。

“与传统观念的决裂”

“文革”时最为激烈的政治主张之一，便是“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所谓“彻底决裂”的真实含义和实际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引起思索的是在这一政治主张背后人们的深层思想动因以及这一主张在动员群众时所起到的作用。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说的，但是，它与之“决裂”的并不只是“传统的观念”，而且是一切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狂热的冲动与低下的文化素质只是实行这种“决裂”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并不狂热、文化水准也不低的社会成员似乎也在极力提倡这等“决裂”。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偏狭僵化的文化心态是其中一部分。

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和侵略不但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危机。而要挽救民族危机，不但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支柱。但是，本身并不乏积极因素和进取精神的传统文化，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扭曲下，已无能力担当此任。戊戌维新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宣告了“以复古为解放”论的破产。中国人再也难以从封建传统文化中找到前进的指南与复兴的基点，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几乎消失殆尽。然而，危机又是转机的开始，传统文化的没落和危机，预示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转换期的来临。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进行任何振兴民族的社会变革，首先便要从总体上根本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五·四”前后，一场“反传统以启蒙”的文化革命便自此始。这场文化革命的根本目标并非象有人认为的那样，是要使中国文化消亡，而是旨在“重构”民族文化，以期建立新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尽管后来的历史环境使这场文化革命未能继续下去，但它的主旨却是现代历史事变的深厚思想基础。一旦摆脱战乱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历史总会重新把这一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然而，这一问题第二次提出却是悲剧性的。

马克思主义以其历史的科学性与必然性指导着中国人民

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继之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重构的核心。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逐渐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便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不但要吸收一切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还要吸收一切当代的积极文化，从而保持自己的活力，使自己能始终居于人类先进思想之首。其次，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深植根于各个民族之中，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一度片面地认为，我们拥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拥有了西方文化的最高优秀成果。而相比之下，西方世界还是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之下，因而其文化必然是腐朽衰败的，所以，我们非但无须去再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而且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必须不断地对西方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不是“扬弃”，而是要批倒批臭。这样，本世纪之初我们曾一度丧失了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又得到了复归。

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其挽救民族危机之中所表现的无能，使得人们形成了内在的反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动，轻视以致否定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必要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使我们在把其作为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核心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理解，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过去和当代一切优秀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思想观念的汇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偏狭的文化心态，即把文化只是理解为一种阶级意识。除此之外

的一切观念、文化，因其不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而便当然地属于应被抛弃的东西，在左倾思想的不断宣传教育下，这种观念深植于青少年和一般民众心中。因此，“文革”第一次社会性的“革命”活动便是“破四旧”，它得到了青少年和其他民众的狂热响应。如果不是从这种把文化理解为只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偏狭心态出发，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甚至会把建筑物的外饰、服装式样、文物等等一些外在文化，均视为是“封资修”而加以毁坏。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这种偏狭文化心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除了被片面和僵化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那些能直接带来好处的实用科技外，其他一切文化观念几乎均遭清算。翻开“文革”期间的报刊批判文章，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艺理论，从无标题音乐到印象画派，都未能逃此厄运。当“文革”中我们自以为是站在世界文化思想的最高峰而充当裁判官时，恰恰是我们与世界现代文化和文明的巨离日益拉大之际。用文化虚无主义来对待历史和现实，毁掉的是真正的文化，复活的却是各种腐朽的传统观念。

这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早在无产阶级革命解放运动兴起之初，除了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恶意诽谤之外，甚至某些同情和理解这一运动的人士也曾表示过自己对这一运动结局的担心。德国诗人海涅深切同情无产者的革命斗争，但同时，他又忧于在无产者成为胜利者之后，“在愚钝的对平等的迷恋中，他们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毁掉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并且会怀着反圣像崇拜的愤怒扑向科学和艺术”，海涅以痛心的讽刺笔法描绘了一幅他所想像的革命会消灭诗集，而诗人的书将被用作包装纸的未来前景。在

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知识分子中，也曾广泛地流行过一种看法，似乎人民革命将破坏文化，并使社会倒退几个世纪。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愚昧无知和备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愤恨情绪的自然爆发。

确实，先前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为这一类错误观念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根据，因为这些运动缺乏组织的理性原则，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完整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自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威廉·李卜克内西曾提出：是的，我们是要破坏我们的敌人称之为“文化”和“文明”的东西。……我们要消灭无知，消灭我们大多数兄弟所陷入的精神愚昧。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既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地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不仅仅是革命者，而且是人类一切文明遗产的继承者和新文明的开拓与建设者。

但是，“文革”这样的实践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还不得不为这种错误继续付出代价。纠正错误并非难事，但挽回错误所造成的信誉损失则必须作出更为艰苦和细致的努力。

这种偏狭的文化心态当然妨碍了克服我国实际上存在着的极端落后的文化状况的努力。自以为掌握了代表人类最高最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忽视了整体文化上的不发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教条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

^① 引自《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609页。

义的教育取代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恐怕是在“文革”结束前我国文化落后面貌未能像经济发展那样有明显改观的一个重要重要的认识原因。

“破”字当头的理论和实践与无序心理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可以说是“文革”基本的方法论，它是“文革”赖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革命新秩序”的理论之一。“不破不立”与“造反有理”一起是“文革”中最富有煽动力的两个口号。在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中对这一理论是这样说明的：“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然而，这一缺乏具体规定性的“破”字理论，在实践中并不限于纯粹理论上的批判，而且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性的破坏行为。此外，即使是思想理论上的批判，也绝对不是“讲道理”的。对此，稍后的《人民日报》讲得更坦率 and 具体一些：“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只能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对待革命的敌人，不能靠劝说，而要靠斗争。……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你们说我们是‘爆破手’，是‘棍子’。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①

^① 《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社论。

如果以为“爆破手”和“金棍子”只有纯粹的比喻意义，那就错了。理论文化界的“爆破手”和“金棍子”所制造的无数起文字狱当然用不着在这里再数落一遍。但在“破”字当头下发生的各种野蛮的社会破坏行为更使人震惊。毫无节制的抄家、砸屋、焚书，对古迹文物的疯狂破坏，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人身侮辱方式，不同群众组织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仇恨情绪等等，如果这一切不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会使人感到一种世纪末般的反社会发泄。

这是一种历史惰性的延续。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这就是流民问题贯穿于每一朝代的始终，它是中国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在每一朝代发展的中后期，流民则由暂时的局部小规模现象发展为经常的全局大规模现象。它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横征暴敛、过度的徭役和赋税所导致的整个社会平衡状态根本动摇的表现。^①流民构成了游离于社会各阶级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在和平年代，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动乱或大灾荒年间，他们则或揭竿而起，或落草为寇。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残酷的阶级压迫、瘟疫、饥荒等原因，广大农民有着随时离开他们赖以谋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加入到这一阶层中去的心理准备。这一流民阶层具有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心态：我没有的，他人也不能有。

近代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外敌入侵、频繁的战乱，使得无数下层群众失去了土地，他们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① 参见刘泽华等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222—230页。

以作苦工、出卖手艺等手段维持着最低的生计需要。他们缺乏任何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在他们中间，既发展出了真正的产业工人阶级，也产生了一个游民无产者阶层。后者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使得彻底破坏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成为他们本能的内在冲动，这种特点也使他们有可能成为革命所利用的社会力量。

对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双重特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在2500万城市无产阶级中，工业无产阶级与城市苦力只有500万人，而游民无产阶级却有2000万之众。在他绘制的各阶级状况的图表中，他在“游民无产阶级”一栏中写道：“可引为革命的力量。”但他同时又深刻指出：“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人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两千万以上，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①在其后的革命年代里，党基本上成功地把这支力量纳入了革命的轨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支力量的破坏性心态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近代中国社会连绵不断的剧烈震荡使社会其他阶层的多数成员也都缺乏安全感，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破坏性的反抗成为人们经常性的选择之一，并且逐渐积淀为人们的一种心理惯性。

可见，社会的无序力量和无序心理根源于颇多磨难的传统和近代中国社会。这种力量和心理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方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向：或是破坏，或是革命——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被纳入到程度不同的公有制社会组织中，作为社会无序力量主要代表的游民无产者阶层已不复存在。然而，一方面，长期形成并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无序心理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中便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游民阶层及其破坏心理的产生根源是与其赖以谋生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公有制的建立虽然从根本上消灭了这种现象，但是，由于公有制建立的时间还十分短暂，它的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由于它本身一些环节尚不完善，因此，劳动者在心理上尚未达到他们在形式上已达到的与生产资料密切结合的程度。对相当一部分社会劳动者来说，他们对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还有一股“疏远感”，适应从个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的隶属关系到间接的、通过许多中间环节的结合毕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是这种状况也往往会使某些劳动者产生一种新的类似于游民的社会心理。

在正常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下，破坏性的无序心态会在整个社会的制约下逐渐得到克服，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破坏行为。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心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的剧烈社会震荡又终于为这种无序心理的释放提供了机会，这种状况可以部分地解释“文革”中那种毫无理性的社会破坏行为。

九 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二): 社会基础

极左思潮曾经拥有过广泛的群众，但这并不等于它真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制度曾经无数次地愚弄过群众，在把群众作为专制统治的对象时又极力地把他们作为专制的工具。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群众似乎也确实成了专制主义最牢靠的支柱，以致于那些敢于挺身伸张社会正义的人在面对专制统治压力的同时，也不得不痛苦地应付来自普通群众的压力。然而，在任何一次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尽管各种形式的剥削制度莫不以代表包括民众在内的全民利益自居，但人民群众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这同时也即意味着剥削制度已难以为继。

同样，煽动和鼓吹极左思潮的林彪与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曾试图利用群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为此，他们曾把自己标榜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并不惜给群众和群众运动送上各种动人的花冠。拉拢、吹捧、分化、打击，他们对争取群众的支持用尽心机。在极左思潮全盛之际，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亿万人在那里虔诚地祝“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但是，当林彪集团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的真

实面目暴露以后，他们未能从群众那里得到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支持。而江青等人利用他们在党内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并时时以“文革”的“功臣”自居，但是，最终导致他们彻底覆亡的也正是以“四·五”运动为代表的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1976年金秋10月，亿万群众怀着发自内心的激动与兴奋载歌载舞走上街头，欢庆着“四人帮”的覆亡和不堪回首的“文革”的结束，而在10年前的10月，他们却以极为亢奋的热情投身于高潮迭起的“文化大革命”。鲜明的反差衬托出人民群众痛苦的认识过程，也真切地反映出那曾不可一世的极左思潮在本质上的虚弱与孤立程度。

但是，不具备真正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基础。极左思潮显赫一时的力量是真实的，它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也是真实的。如果没有一批自觉追随和推行极左思潮的社会成员发挥作用，仅靠林彪、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断然难以掀起如此巨大的惊涛骇浪。这些社会成员构成了极左思潮所造就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追求、理想、利益和命运都与极左思潮的兴衰密切相连，他们既是极左思潮得势时的受益者，也是极左思潮失势时的殉葬者。

如果我们把视野移向近代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会看到，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较为彻底的社会变革都曾引发出某种形式的激进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脱离社会现实发展的可能性，往往把极端的手段和极端的目的强加于公众，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促进社会变革的发展，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往往给社会变革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在国际

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和发展不仅是在与各种旧势力旧观念进行斗争的历程中实现的，而且也是在与各种激进的和极端的理论观点及政治主张的斗争中实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不懈地与“左”派们进行论战和斗争，深入地阐述和分析了左倾理论的产生根源及其对革命的危害，从而保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顺利发展。然而，左倾错误在国际共运中并未就此绝迹，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和战后建立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先后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左倾错误。左倾的革命急躁症几乎是革命进程中的通病。但是，左倾错误在我国竟持续达20年之久，并导致“文革”这样一场全面的浩劫，这种状况在国际共运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除了一般的认识原因和社会历史因素外，某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诸如各个社会阶层的素质、制度建设上的弊端、长期的封建主义影响等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而极左思潮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广泛地掌握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的影响，后者构成了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

极左思潮造就的利益集团

毫无疑问，林彪和江青等人是煽动和推行极左思潮的主要受益者，而极左思潮的形成和泛滥过程同时也是围绕这一思潮的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这一利益集团即是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核心的帮派势力，它的首要成员的状况及其反革命罪行，各方面已作了大量披露，并且历史业已进行了公审，此处就不再赘述。这里着重分析这一利益集团

的形成、基本特征及其成员构成的特点。

一、极左思潮造就的利益集团的形成。

这一利益集团是“文革”的产物。它的形成始于“文革”全面发动之初。在造反的狂潮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一批过去的普通学生、工人、职员等一跃成为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共同的政治需要使他们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视为自己的靠山和主心骨，而江青等人虽已获得指导“文革”进程的权力，但他们羽翼未丰，而且缺乏一套贯彻自己政治意图的有效的组织机构，急需一批既能为自己冲锋陷阵，又能有效地影响和支配无数造反群众的骨干，双方一拍即合。北京市以聂元梓为首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等一批人是最先被纳入这一集团的成员。他们果然不负中央文革所望，到处煽动造反，为全国大乱立下汗马功劳。夺权开始后，工人群众组织的迅速崛起及其所起的作用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极大注意。随后，一批在各地有效大影响的工人造反组织和其他行业造反组织的头目又被纳入中央文革小组麾下，如河南郑州铁路局的唐岐山、杭州丝绸印染厂的翁森鹤等人，这批人成为“文革”后期在全国制造动乱的帮派骨干力量，并被大批地提拔到省市甚至中央一级的领导部门，一时间权势显赫。与此同时，林彪则充分利用党内军内大批干部被打倒之际，提拔自己的亲信窃取党政军大权。这样，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林彪与江青等均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派系力量，形成了以这两个集团为核心的共同利益集团。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政治局21名委员中，

林彪江青一伙就占据了12名。同时，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也进入中央委员会。林彪集团垮台以后，江青等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网罗和提拔那些忠实于极左思潮的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党的“十大”上，江青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这一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文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的进程，它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结构。回顾“文革”的主要进程，1966年的“炮打司令部”、1967年到1968年的“全面夺权”、1969年后的“斗批改”、1973年的“反回潮”、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理论”运动和评“水浒”运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对“文革”的每一部署莫不被他们利用来作为打倒各级党政干部的手段，而其中的有些运动则是由他们直接策划煽动搞起来的。正是在实践上否定了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况下，他们掌握了部分党政机构的领导权。而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并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又不断地制造新的动乱。

随着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和抵制，林彪、江青等推行的极左路线越来越难以贯彻，而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部门，更使他们难以按组织途径来实施自己的政治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利益集团所形成的各种非组织途径便成为贯彻极左路线的主要方式。所谓“上下串联，左右呼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这种“文革”惯常使用的语言正可用来形容这一利益集团进行活动的基本方式。

二、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处于根本对立的一股社会势力。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革命集团。一般意义上的反革命集团是指纯粹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唯一目的的势力。而林彪江青等建立起来的这一利益集团，既有其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活动特点的一面，同时也还有着致力于以他们的极左路线取代党的正确路线的一面。作为其反革命活动的一面，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手法，这以林彪集团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其以极左路线取代党的正确路线的一面，他们则是以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公开煽动极左思潮，并辅之以所谓理论上的论证，这以江青集团表现得十分典型。此外，“文革”中他们所具有的合法地位使他们在推行极左思潮中往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也容易暂时地获得一些群众的信任。

其次，构成这一利益集团的多数成员只是在“文革”中才得以进入高层政治权力中心。他们多是靠造反和努力推行极左思潮才得以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状况产生了两种效应。对他们本人来说，地位的急剧变化往往使他们头脑发热，目空一切，刺激起了迅速膨胀的政治野心。同时，他们的擢升既得益于自己对极左思潮的“贡献”、也得益于某些人的提拔重用，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维系于极左思潮之上，并在个人关系上效忠于那些使他们进入权力中心合法化的人。另一方面，对于“文革”中那些尚未从极左思潮影响下摆脱出来的下层群众来说，他们自然地把那些原属同一阶层，而现在权力在握的人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后者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特殊变迁过程也往往使他们在煽动极左思

潮时对下层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三，这一利益集团并不是依靠严密的组织结构和规则来表现出自己的存在。维系它的是共同的政治利益，即通过推行极左思潮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以及权力本身带来的各项利益。因此，他们的行动往往更为自觉，也更为疯狂。这一点，在“四人帮”垮台时各地帮派势力人物所作的反应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有的策划武装对抗，有的扬言要上山打游击，把“四人帮”的覆灭看作是“变天”。作为“文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自觉地把自已视为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正是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性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这一利益集团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一集团内，个人的进退荣辱，不仅取决于贯彻极左思潮的得力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彼此之间的人身依附程度。因此，个人效忠往往成为获取进身之阶和保持既得利益的必要手段。在这方面，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又略有不同，林彪集团更多地是带有正统的封建宗法家族特点，构成以林家父子为轴心的较为严格的尊卑等级关系。而江青集团因其多数成员都是靠造反起家，所以更多地具有封建帮会的特征。所谓“大哥吃了肉，弟兄们也要喝点汤”^①便是这种帮会意识的反映。

三、利益集团成员构成的特点。

在我国，由于阶级和阶层的存在及其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但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

^① “四人帮”集团在河南的成员居岐山讲。参见1974年6月1日《河南日报》。

的情况下，人民内部所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在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因此，其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国家计划予以调节。然而，极左思潮所造就的利益集团却是一种反社会的势力，因此，其利益需求与人民是對抗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已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其他落后势力利益集团的复活。诚然，在“文革”以前，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落后的或是反动的势力，例如，对旧的剥削制度抱有留恋感的社会成员、党和国家机关中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各种犯罪分子、不务正业的游民、极少数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等。这些势力构成了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危害。但同样，他们也处于社会的经常打击之下，所以，他们对社会怀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而在“文革”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中，也会出来趁火打劫，兴风作浪，加剧社会的混乱状况。但是，由于这些势力在社会上早已声名狼藉，因此，他们不具备对群众的号召力，难以作为推行极左思潮的核心骨干力量。

事实上，在极左思潮下构成的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绝大多数在“文革”前都是社会的合法公民。有着各自正当的职业和工作。例如，在《历史的审判》续集一书中所提及的被起诉判刑的近60名人中，除林彪集团的3名成员外，其余多属各地帮派势力的头目，他们所犯罪行无不与疯狂地推行极左思潮从而触犯刑律有关。而就起诉书和判决书中所提到的部分人在“文革”前的职业来看，有工人，学生，干部，大学教员和其他行业的职工。^①这里并不排除其中某些人在

^① 参见《历史的审判》续集。

“文革”前就有劣迹，但总的来说，他们在“文革”前并不是作为反社会的落后势力的代表而存在，甚至根本不是一种势力。到颇有点象马克思在形容19世纪中叶法国国民时所说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并且“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②单个的马铃薯都加在一起也还是马铃薯。要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必须有一种新的聚合方式。真正把这些人员动员起来并形成了一股利害相关社会势力的是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是将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层次和职业的人联结在一起的共识纽带。在这里，个人品质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

这一利益集团的成员构成十分复杂。他们中既有货真价实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分子和其他社会渣滓，也有真诚地把极左思潮作为革命思潮信奉的人，既有因不谙世事而误入歧途的青年学生，亦有曾经沧海但经过权衡利害后作出选择的老干部。但无论其动机和品质如何，一旦进入这一利益集团后，极左思潮便以巨大的惯性推着他们走下去。他们已经把所有异于自己的社会力量和异于极左思潮的思想观念都视为敌对的力量和观念。现在，他们已不可能再冒任何可能导致自己脱离这一集团势力范围的危险，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而且也意味着失去他们生活的最后信念。

剖析几位在经历、气质、品行和职业等方面都迥然不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3页。

却都步入这一势力圈的人物的状况，对我们了解极左思潮造就的利益集团的组成情况及这类人的蜕变轨迹和心态都是有益的。

第一种人是为政治野心所驱使的人物。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便是其中的代表。韩爱晶原是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出身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他一步入北航，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如他本人所言：“我这块料能干什么呢？当个技术员吗？对技术一窍不通，不是那块料。我这个人太认真，适合当官，我有组织能力，对政治工作，对斗争很有兴趣。”“文革”当然是天赐良机。他以在国防科委门前昼夜静坐23天而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北航“红旗”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1967年1月，陈伯达亲笔给韩爱晶、鬻大富（五大“领袖”之一，清华“井冈山”负责人）写了一张条，称：“我们是爱护你们的，怕你们被搞臭，你们要旗帜鲜明，不鲜明会被敌人利用。”“敌人”指何人自然不言而喻。随后，北航“红旗”插上北京市委、人民日报、新华社。有数百名北航“红旗”战士奉韩之命赴全国各地煽动造反。韩爱晶喜不自胜地回顾说：“我当时住万里（“文革”前任北京市副市长——引注）家，简直像个市长，北京各大单位大小事全来找我，我大笔一挥几十万元就出去了。”1967年3月，叶群单独接见了韩爱晶和另一人，韩爱晶倍感荣幸。叶群对韩爱晶说，“二月逆流的根子在军队”，他立即组织人马炮轰叶剑英，诬陷徐向前，迫害徐海东等人民解放军元老和高级将领。1967年7月，韩爱晶连续组织批斗彭德怀，他在批斗会上连续7次丧心病狂地指骂殴打彭总，致使彭总肋骨骨折，肺部受伤。

8月，他又出现在中南海“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他不仅仅是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而是心甘情愿地上船。权力成为他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唯有在极左思潮造成的动乱中，他才可能实现膨胀起来的政治野心。正是这种野心把他与林、江等人拴在了一起。^①

第二种类型是具有流氓无产者品质的人物。原郑州铁路局的一名工人，“文革”中当上了中央委员、郑州市委书记等职的唐岐山便是代表。他在50年代写的自我鉴定很能说明他平日的处事准则：“我的思想不官（管）你共产党不共产党，幸福不幸福，……人说死就死了，我想有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有时间就去玩一玩。”他也奋起造反了。而他造反的实际行动便是组织人把运输系统搞瘫痪，“要用罢工、停水、停电、停车的实际行动”来干革命。至于打砸抢、武斗，他样样全沾。而当他掌管了郑州铁路局火杈后，起用了一批地痞无赖作为帮手，并把全家人都“提了干”，他那当炊事员、目不识丁的妻子也当了局工会常委、女工部长。他去了一趟上海王洪文处学习“革命”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看人家上海的造反派多神气，穿的是‘的卡’，登的是皮鞋，屁股后跟三两秘书。咱河南的造反派算个屁。”他的行为和言论，活脱脱勾划出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形象。1969年，经张春桥提名，唐岐山混入中央委员会，此后，他就不再只图给自己捞地盘了，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他指挥手下把所在各单位的党委搞瘫痪，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6年，

^① 以上所述多见项金红，《郭爱晶的龙袍梦》，载《中国青年》1986年第8期。

他更是扬言“文化大革命已是十年了，各级党委又该冲冲了”，“我的方针就是一个字，乱”。同年3月，江青召见他，许他当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要他“兼管一下湖北的问题”。此后，他竟俨然以两省总督自居，把河南省和湖北省搞得鸡犬不宁。省委难以正常工作。^①从唐岐山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封建性的气质，而这也正是极左思潮要加以利用的地方。

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虔诚本份地对待生活，并不渴求物欲和权力，安于自己的命运，但是，某种机遇却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一旦被套上极左的“红舞鞋”，他们便完全失去了停止旋转的能力。或许，知识青年朱克家的经历便反映了这种情况。朱克家是原上海知青，“文革”中赴云南插队，他以自己勤奋的劳动赢得了荣誉，被推举为先进知青。他的事迹被宣传媒体加以拔高后见了报。其后，姚文元看到了这一典型材料，说，“这么好的同志不能入党，那么什么人才能入党呢？”于是一夜之间他便成了党员。而张春桥在另一篇报告他的事迹的文章中亲笔加了编者按，更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1973年他在党的“十大”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又进了“四人帮”办的中央读书班。不久又搬进了原省委书记的小洋楼，在省委分管运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他的栽培使他眩晕，也使他决心以坚定的阶级斗争精神作为回报。他积极地去推行贯彻“四人帮”的各项政治主张，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干部。“四人帮”的覆亡使他难以置信，也使他后悔不及。当初在插队时，有人

^① 以上参见1978年6月4日《河南日报》。

劝他上大学，他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别有用心，如今，他直未听“阶级敌人”之言。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其他一些类型的人物。但从总体上来看，构成极左思潮核心力量的社会成员，主要是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极左思潮为共识纽带而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政治利益。而为了保护这种既得利益，他们又只能依靠更疯狂地推行极左思潮。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在受到党和人民的清算以后，由于这股势力的残余影响作用，极左思潮的某些东西在适当的条件下依然有着再生的可能性。

产生极左思潮的社会历史因素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一是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领导思想上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当作是阶级斗争，并习惯沿用已不能照搬的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于破坏。这一状况与毛泽东个人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有关，也与国际共运史上在领袖和党的关系上的偏差、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的影响有关。《决议》从党对

社会主义的准备、党的领导思想和党的领导制度的角度总结了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的探讨起着指导作用。这里，我们侧重于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及群众一般素质的角度来考察这种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

“左”的倾向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就其直接社会原因来看，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列宁曾对这种现象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①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左倾产生的社会根源时也指出，左倾“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②毛泽东的论断，既指出了左倾的一般特征，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指出了在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左倾的基本社会根源，即“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显然，列宁和毛泽东对左倾社会根源的

① 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1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6页。

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文革”极左思潮所以会在一个时期内为群众普遍接受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绵延两千余年。这种小农经济是将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家庭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所以马克思说，在中国长期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①小农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它的自给自足性，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用品都由这种经济自身提供，某些当地不能生产的产品，如盐、铁制农具等，也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交换，交换的目的是满足直接的需要，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这种交换都尽量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由此，造成这种小农经济对内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对外则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相应于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的是集约化的劳动耕作方式，农民投资到土地上的主要是劳动力，所需土地的数量也不多，可以满足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然而，由于小农经济是一种“男耕女织，质朴无文”、“安土重迁，不善商贾”的经济结构，因此它又是十分脆弱的。两种因素构成对小农经济的威胁，一种是天灾人祸，使小农经济无法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因而破产逃亡；另一种是商品经济的冲击，破坏自给自足的结构，而使其土地和产品卷入流通的领域。对于前者，统治阶级常常采用“轻徭薄赋、赈济灾荒”的办法，帮助农民摆脱困难，恢复生产；对于后者，则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对小农的冲击，维持小农经济的稳定。此外，小农经济容易破产，也容易恢复生产，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2页。

要具备一定的简单生产条件，小农很快就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进行生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虽然屡受打击而破产，但却很快得到复兴的原因。

正是这种坚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它决定了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最深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宗法等级的社会政治制度。自然经济中分散的家庭和农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把他们统一起来。

小农经济与宗法政治制度的结合反映在小生产者的观念中，便是皇权主义的盛行。自然经济导致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隔绝状态，使得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①在小生产的条件下，家长制起着组织生产和调节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作用。所以，家长制和家长的权威对农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皇权的崇拜就是对放大了的家长制的崇拜。而臣民对皇帝的忠也即是对家长孝的延伸，因此，忠孝在封建观念中总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农民不能失去皇帝的观念与不能失去土地的观念几乎一样牢固，历代农民起义总是托庇于某种形式的皇权（或假托皇室后裔，或自立为帝）便反映了这种意识。

伴随着皇权主义的，必然是薄弱的权利主体意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自甘软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除非走投无路被逼造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3页。

托在“圣君贤相，青天大人”的恩赐上。中国历史上虽不乏“民本”思想，但这种“民本”意识并不是民主意识，而是在皇权之下的“民为本”观念，它在本质上依然服从于封建的尊卑等级观念。因此，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各种法律制度，并有所谓“法不阿贵”、“刑不避大夫”的规定，但在封建礼教的统辖下，“法”只是治民的，是为了维护既定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因此，法律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法随人出，人去法亡的现象更为普遍。所以，在小生产者的心目中，人治远比法治更为可靠，更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久之，这种观念和心态构成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之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①

在封建历史上，与皇权主义相对立的是平均主义的观念。它恰恰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会自发地产生平均主义的思想。农民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信徒，他们终生渴望的，就是得到一小块土地，并能够保持这块土地永远不受他人的掠夺，使其能够养家活口。然而，豪绅地主阶级对农民土地不断的兼并和掠夺，使农民这种愿望往往落空，而封建社会频繁的政治动乱和战乱又使农民朝不保夕，随时有丧失自己土地的可能性。因此，农民平均主义所要维护的正是小生产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这种平均主义所要求的是政治上均平等、经济上平分一切财富、生活上平均使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2页。

用一切用品。正如小生产的经济结构构成封建制度的基础、而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又恰恰是维护这种经济结构一样，农民的皇权主义体现了他们保护自己小私有制的利益要求，而他们对平均主义的要求也同样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观念在小生产的意识中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除了延续两千年这一时间因素外，如果考虑到小生产者在我国的数量因素（人们常用“汪洋大海”来形容小生产者的分布和数量），那么，在当代中国，小生产的观念意识的顽固表现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或许不会使人感到过分诧异。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不可能产生一个能够完全独立地代表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他们中的革命分子不能不向也代表了他们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寻找出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党员队伍主体是农民，他们在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教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将各种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带入党内。所以，诸如狭隘的复仇心理、宗派观念、对“文化人”的蔑视等意识在党内部分成员身上便不时有所表现。而土地革命期间党内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错误及解放战争时一些地区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所出现的“左”的偏差，更是集中地暴露出以小生产意识为主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在党内的影响。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革命的“急性病”，那么只是因为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暂时地限制了其他一些小生产意识的发展。例如，战争年代自上而下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使得平均主义这种观念对革命事业

的消极影响不十分突出，而党内较为民主的政治生活又遏制了家长制这种宗法观念的滋生和蔓延。但这并不是说，小生产意识的影响会随着革命的发展而自然地便趋于消失。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面貌。几亿小生产者被纳入了社会的集体生活之中，几千年来的小私有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被废弃，代之的是农民和其他手工业者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的身份也从土地私有者转变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接纳到工人或社会的其他行业之中。因此，“小生产者”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几千年的观念传统却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失去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虽然改变了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但至少“文革”以前，我们还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中、尤其是农业生产中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民虽然被组织在了集体之中，因而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并能够兴建大型的农业基本设施，例如水利工程，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依然沿袭着过去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投入大量人力为主的方式。由于他们在心理上难以立即适应从小土地私有者到集体农民的转变，加上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的弊端，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相反，“大锅饭”的体制却不断刺激起他们历史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意识。另一方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商品经济在这种模式下难以迅速发展，因而，人们的传统观念也难以从根本上受到触动。党虽然认识到“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并确实是不懈地

对农民进行各种宣传教育，因而对农民克服自身的保守性和小生产意识、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对商品经济的某些偏见和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失误（例如，“重农抑商”。这恰恰也是传统观念的一种反映），限制公社内部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并屡次将自留地、自由市场等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去。这样作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反而迎合了小生产意识的需要，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和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现代生产的趋势是与小生产意识不相容的。而对于农民来说，这又是一种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已经失去了小生产者的身份，因而已不能够得到小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公社化的组织形式并没有迅速地促使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又难以从这种组织形式中大幅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保守性特征日益显现，这主要反映在他们对分配中平均主义的追求之中。这种特征在政治上的反映便是不愿意受到行政管理和计划调节的约束，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自由行事，它往往导向“极端民主化”。

小生产的意识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农民阶级中。在我国，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飞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新增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而，小生产的意识在工人队伍中也颇有影响。大批农民补充进工人行列和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情况从下列数字中便可得到反映。1949年，我国共有社会劳动者18082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为16549万人，占总数的91.5%，而包括工人在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单位的劳动者仅为494万人，占总数的2.7%，但到了1955年，即“文革”的前一年，社会劳动者的总数为

28670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为23534万人，占总数的82.1%，而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为3738万人，占总数的17.3%。^①就是说，1965年全民所有制的劳动者比重比1949年净增近14%，人数增加了3200万，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在此期间却下降了近10%。1965年的职工人数相当于1949年的7倍多。很显然，从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比重的下降到全民所有制劳动者比重的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农村劳动者向工人和其他社会劳动部门转移的基本趋势。劳动者的这种转移，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成员结构的一个必然现象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十分低下。这种文化素质又是小生产意识十分盛行的一个基本原因。以1964年为例，全国共有69000万人左右，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有288万人，占国民总数的0.4%。而小学程度的人数有近2亿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有26340万人，二者相加占国民总数的近67%。^②

上述历史状况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党的状况。建国以后，党虽然注意了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队伍中吸收党员，但从总体上来看，党员队伍依然是农民或出身于农民的成员居多。这并不是说，来自农民的党员队伍主体必然会导致小生产意识的泛滥；事实上，党对自身队伍的思想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它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样不能否认，清除小生产意识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是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① 引自《中国统计资料》（1957年），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125页。

从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到“文革”的发动仅仅10年时间，而这10年又正是党在新形势下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理论错误从萌发到不断升级、直至酿成“文革”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的逐步发展削弱了我们党对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同时，左倾理论的某些政治主张和措施，例如，不顾实际可能而采取的缩小社会差别 的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等，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深受小生产意识影响的社会成员和部分党员的心态和思想，使得左倾理论在党内的贯彻十分畅行。党在理论上的薄弱又使许多党员把“左”的理论不加分析地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对待，因而不断加强自己执行和贯彻这种错误理论的自觉性。这种现象又与党员队伍文化素质不高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直到1985年，党员队伍中的小学和文盲程度的成员还占到党员总数的52%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占总数的80%以上。^①考虑到党员的平均文化程度在总体上略高于整个民族的平均水平（例如，1985年每100名知识分子中就有21名党员^②）这一因素，而1964年全国平均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社会成员占国民总数的67%，那末，按最保守的估计，在1964年，党内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60%左右。这种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得许多党员缺乏独立思考和对事物进行客观准确分析判断的能力。党内小生产意识的存在和影响、理论上的薄弱和低下的文化结构，这些因素削弱了党识别和抵制错误倾向的能力。

^① 参见1985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参见罗也夫：《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构成和分布》载《变革时代》1990年创刊号。

显然，发达的小生产意识和低层次的文化素质，正是极左思潮能够盛行一时，并曾为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基本社会历史因素和社会根源。极左思潮正是因其反映和迎合了小生产的利益要求与思想观念，从而才得以广泛地动员起群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简要概述极左思潮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可以对此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总体看法。

极左思潮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在不断神化领袖的同时，把“忠”的观念变成衡量是否“革命”的基本准则，并制造了各种宗教般的“献忠心”仪式，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变成了封建式的君臣关系，这正是千百年来存在于小生产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意识的反映，因此，在“文革”初期的几年中，才会有无数群众虔诚地拜倒在个人崇拜下而难以自制。

极左思潮煽动和推行的无政府主义，既是长期以来破产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心态的反映，同时也集中表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继续：小生产出于他们经济地位的考虑而本能地反抗任何形式的国家对小农经济结构的强力干预。

极左思潮完全践踏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部共和国宪法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之间便失去了任何作用，而众多的民众对此竟漠然置之，重人治不重法治和淡薄的法律观念极大地削弱了社会限制和约束各种极端行为的能力。

极左思潮把平均主义作为消除各种社会差别和分配领域中的主旨，对于有着“不患寡，患不均”心态的民族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们曾一度热切地把各种平均主义观念和措施作为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十分虔诚地去实践——直至他们发现这种实践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为

止。

极左思潮对文化和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的蔑视、对精神生产劳动方式的否定和对本身就十分贫乏的文化资源及其产品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正是狭隘的小农生产方式所衍生出来的产物。假设落后的文化状况并不妨碍人们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那么这种状况更容易使人们不加区别地接受对社会主义歪曲的观念。

综上所述，极左思潮虽然在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但是，深厚的小生产意识的存在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构成极左思潮能够盛行一时并掌握群众的社会基础。而整个民族低层次的文化结构又使人们难以有效地分析、识别和抵制这种思潮。因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清除小生产意识对社会的侵袭、克服极左思潮的基本途径。

十 极左思潮的历史命运

如前所述，极左思潮既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更不能代表他们的长远利益，因此，极左思潮虽然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曾左右和支配了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它的历史命运却自其出世之日便已注定：它终归将要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命运的必然归宿，它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的终结。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极左思潮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在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煽动，更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极左思潮应运而生。它所以能够暂时地掌握群众并左右社会政治生活的进程，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聚合了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虚幻的反映和被扭曲了的焦点，因此，即便说极左思潮的出发点尚有某种合理因素在内的话，那么，随着这一思潮内容的逐步全面展开，尤其是它带给社会的破坏性后果的暴露，极左思潮的覆亡也是必然的。事实上，极左思潮对群众的影响和支配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极左思潮与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要求处于尖锐的矛盾对抗之中，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抵制。当然，这种抵制与斗争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个人的、分散的斗争发展为整体的全面的斗争的过程。但结果却已蕴涵在起点之中。如果说极左思潮风靡一时的基本条件是它掌握了群众，那么，也正是人民群众的反反对注定了极左思潮覆亡的结局。

极左思潮的衰亡

极左思潮从风靡一时到走向衰亡，其转折点发生在1971年9月林彪垮台以后。一个曾经似乎是那么虔诚、那么坚定地拥戴毛主席、拥戴“文化大革命”、口不离万岁、手不离语录、时刻不忘“高举”的人，竟然会叛党叛国，更何况这个人曾对“文革”的进程和人民群众的行为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并且还按在党章中极其庄严地规定为领袖的接班人。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但对当时多数尚未摆脱“文革”迷雾的普通群众来说，这一切毕竟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此之前，他们曾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号召，发誓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怀疑过一切人——只要他是当权派，只要他表现得不那么虔诚。然而，却很少有人怀疑“林副统帅”。林彪曾表过态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我们这些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但这样的表态，非但没有“引火烧身”，反而更博得一片喝彩。现在，林彪竟然是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

命”的彻头彻尾的阴谋家、政治骗子，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黑头目。群众怀疑过无数次，但对林彪却是轻信了，可事实却昭示人们：如果他们的轻信曾欺骗了自己，那么，他们过去的那些虔诚和坚信会不会也在捉弄自己呢？林彪事件究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失败？

正是林彪事件使得中国人民开始认真地回顾和深思他们在前几年中所信奉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数人还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文革”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怀疑，但至少他们开始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怀疑“怀疑一切”，开始对“文革”这种作法是否能达到左倾理论要实现的“反修防修”目标进行思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冷静比他们的热情乃至狂热更能有效地影响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1971年底以后的中国便处于这种状况。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并且还将继续一个较长时间，但是，却有了一个明显的界限，这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自觉意识逐渐觉醒了。因此，1972年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正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在当时，这一批判的意义远比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要更为重大和深远。对“文革”的前期与后期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由在红卫兵运动、在与“资反路线”的斗争和全面夺权中的热情、虔诚和主动参与，到“批林批孔”运动、学习“专政理论”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化为冷漠和消极，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它的结果便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所以，虽然“四人帮”垮台于

1976年10月，虽然直到1977年党的“十一大”才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极左思潮却早已失去了民心。

简略回顾人民群众和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抵制与斗争历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极左思潮覆亡的历史必然性，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流，进一步坚定对未来发展的信念。

斗争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代表着党的正确领导的各级党的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及极左思潮的斗争。

1966年11月，在极左思潮最为盛行的日子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13日与29日两次召开的有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对这股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针对“打倒一切”的浪潮，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针对当时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和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叶剑英批评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随后，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军区造反派批判了老师们的讲话，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

随着全面夺权的开始，大批干部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局面十分混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革命家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于怀仁堂主持的两

次中央碰头会上，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该不应该全部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问题，谭震林等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一伙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对“文革”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谭震林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李先念痛心地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叶剑英直斥陈伯达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这次斗争虽然被作为“二月逆流”而受到打击和压制，但却对未来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即使是已被打倒了的刘少奇，虽然身处逆境，但依然为全国的混乱局面忧虑，期望尽快结束“文革”，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努力。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便郑重地提出，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尽快解放广大干部，使党少受损失，辞去自己所担负的国家和党的职务，与家人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极左思潮对实际工作的影响，他把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提到了工作的主要位置。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冤案开始得到了平反。先后为陈毅、邓子恢、贺龙等恢复了名誉。1973年，又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在这期间，党在各方面的

工作都出现了转机。

四届全国人大后，周恩来病重入院，邓小平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他按照四届人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要求，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文革”以来造成的混乱。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先后召开了农业、交通、科技和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重要会议，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的整顿。这种整顿的实质，是将“文革”中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但却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方针政策重新恢复过来。经过整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在左倾错误仍然居于全面支配性地位的情况下，上述斗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压制和打击。但是，每一次这样的斗争，都为党最后从根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为极左思潮的覆亡奠定了基础。同时，党内代表正确领导的力量存在，使得即使是在“文革”这样的动乱年代，人民群众都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二、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自觉进行的斗争活动。

1966年11月，林彪的权威炙手可热，个人崇拜之风弥漫华夏，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名学生以伊林、涂西的笔名，在清华大学贴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尖锐地批驳了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并指出林彪的作为将使中国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大字报后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作者也因此而被捕入狱。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对“文革”的动乱忧心如焚，1967年3月初，他对女儿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同字

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指江青一伙）要把中国毁掉。他毅然决然地宣布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随后，他给毛主席、刘少奇各书一信，力陈毛刘握手言和，希望中共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兴盛为念，停止“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动荡，致力于富强中华的建设大业。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他慷慨陈辞道：“……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指毛、刘）皆始终共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建路……”，“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俱深有感于斯言”。他对江青一伙陷害刘少奇十分愤懑，“判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所谓不识时务者，莫甚于章士钊先生，但唯其如此，才更显出以章先生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的高风亮节。

1968年4月，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致信党中央、毛主席，对林彪的顶峰论，个人崇拜，提倡封建的愚忠活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贺龙、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罪行，对江青、张春桥的砸烂公检法、搞所谓群众专政、挑动武斗的种种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指出林彪与江青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妄图建立封建王朝。“长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74年11月，广州三位青年以“李一哲”的笔名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

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暴行，指出：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关。大字报未点名地指出了江青、张春桥等人不遗余力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剖析了我国上层建筑领域中存在着的缺陷。十分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这篇大字报在全国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看。由于这是“文革”以来最为系统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林彪、江青等人推行极左思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文章，因此，在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里我们不过是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人民群众对“文革”和极左思潮进行斗争的自觉活动。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在“文革”进行之中十分普遍。这种斗争的涓涓细流，汇成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终于为“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的结束奠定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四·五”运动的实质，即是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影响下，人民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帮助党纠正自身的错误的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

三、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尽管如此，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之中，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一切与党和人民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顽强进行

经济建设的卓绝努力是分不开的。

1966年11月，针对“文革”对工交战线造成的冲击，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有关部门召开了工交座谈会，就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革”进行讨论。座谈会一致指出，为防止工业生产受到进一步的破坏，急需制定一个适合工交企业特点的规定。周恩来提出：要组织国务院业务组抓工交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工作，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进行，坚持8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搞跨地区串联。根据这些精神，国务院组织拟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十五条》的制定，对稳定经济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后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但其基本精神却一直贯穿于“文革”中的经济工作之中。

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国务院，顶住林彪、“四人帮”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无论情况多么复杂，都尽全力维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得7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摆脱了连续滑坡下降的局面。1975年，邓小平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实行整顿，恢复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管理政策，扭转了因前一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经济停滞和倒退局面。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国家陷入如此动乱的局面下，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大多数群众，依然坚持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上进行辛勤的耕耘劳动，尽管他们可能在政治上轻信过或迷茫过，但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职责，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和贡献。这是我们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文革”中还能进行的基本原因。因此，如果说没有“文革”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经济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魅力维持，没有广大群众的无私贡献，那么“文革”中我们的经济损失本来会更大。

综上所述，极左思潮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党和人民群众与之进行斗争的过程，因而也即是极左思潮步步走向衰亡的过程。

不断深化的认识历程

对于经受了长期专制统治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件颇为陌生的奢侈品。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似乎给了他们以某种形式上的绝对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集会、发表言论、进行串联、成立自己的组织、出版各种刊物、指名道姓地批判昔日的顶头上司以至更高层的领导人。他们行使的权利几乎超出了任何一种政权所能允诺和接受的范围。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包括欧美和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中的青年人对当时的中国钦羨不已，并纷纷效法。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虚幻的陶醉，为此，中国人民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大大延滞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拉大了与世界经济发展先进水平差距，痛失了一次历史性的选择机会。而这种自由本身，也被事实证明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讽刺。群众不过是被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这种使命完成，他们便连表面上

的这种自由也完全丧失了。在极左思潮的操纵之下，群众运动不过是被人拴上了线的风筝，飞得再高，也还得受一根线的摆布。

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强烈的失落感和被愚弄了的感觉支配着人们的情绪。一时间，好象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到处都是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控诉和口诛笔伐。对于经历了如此长时间浩劫的人来说，这样作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人们毫不怜惜地将自己在“文革”中曾有过的热情、虔诚、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一股脑地泼了出去，情绪化的评论取代了理智的分析。由此，对于部分青年人来说，产生了被称之为“信仰危机”的现象，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要作的唯一事情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合法的、半合法的甚至不合法的——来把自己在“文革”中遭受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失找回来。

然而，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却是更为紧迫的任务：迅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快步发展的历史节奏已经容不得我们再有任何犹豫和徬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横向比较迫使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在初步澄清了“文革”的大是大非、纠正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左”的倾向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把全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轨道上。与此同时，党和人民开始冷静、审慎地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得失与经验教训。1981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文革”一段历史的写作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

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①1981年3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建国以来各个历史阶段作出了评价,在谈到“文革”时,《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最终战胜了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历史表明了人民的伟大和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决议》对“文革”高度概括的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文革”及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思潮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民族不可能始终背负着过去沉重的负担蹒跚行进,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始终纠缠在往事之中。然而,新的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及改革开放所遭受到的困难与挫折,使得我们在不断探索前进的同时,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经验,并努力避免已经走过的弯路。何况,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不可能人为地切断,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潮虽然遭到否定,但在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彻底被清除以前,它们总还会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自身。而且,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左”已成为一种习惯势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7页。

力。在新形势下，人们不时地感到了这种势力的存在。总之，我们不得不经常地在过去与未来的相互作用之中探索现实的立足点。

这样，80年代后，“反思”成为一个最时尚的术语。政治、经济、文学、文化、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不同学科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作出某种逻辑的或非逻辑的解释，试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自省能力，他们不会总是停留在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交学费”的阶段。这种反思已经并且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受了一些挫折，并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与部分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它却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而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曾经接受过极左思潮的人民群众又用自己的斗争使这股思潮退出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显然，这正是10多年来党的路线、政策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原因所在。

从情绪化的评论到理智的分析，又进到自觉的反思，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饶有趣味的是，近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波动，又悄然兴起了一股被称为“寻找毛泽东”的现象。对这种现象，众说不一，有人欣慰，有人疑惑。当然，就对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地位评价而言，党的历史决议已作了客观的、科学的说明。但是，“寻找毛泽东”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问题。它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人们对现实的思索。毛泽东丰富睿智的思想体系与他晚年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观念，使

得不同阶层和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都不难从中找到共鸣点。因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人们心目中主观描绘的毛泽东则又是一回事，从后一意义上说，同样是尊崇毛泽东，却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正是这一点引起我们的思索。随着“文革”离我们日距遥远，人们对“文革”所造成的灾难的记忆也逐渐淡漠了，但同时，记忆的另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被突出出来——反修防修、揪走资派、大民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再教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等等。这些在“文革”中十分流行的理论、口号或作法，当它们的实际内容逐渐模糊以后，又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这种迹象时有发生。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任何一种理论、概念或口号的分析判断，只有同它所代表的实际倾向及社会效果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说是不错的，但在“文革”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各级党政干部的残酷迫害正是在这种名义下进行的。因此，党对“文革”的否定，不仅仅是否定它的实践，而且也包含它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理，如果脱离了“文革”的实践，那么要想在“文革”提出的理论或口号中寻找某种“合理成份”，并不是一件难事。因此，在不断加深的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反思中，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空谈当时的理论观点或是什么合理动机；另一方面，我们应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变形，机械地套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想在对中找错或错中找对，致力于某种“抽象”的辩证法，实际则于分

析问题并无多大益处。

综上所述，虽然极左思潮已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淘汰，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并未终结，这是因为，那些导致极左思潮泛滥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的已经不复存在，但有的却尚未完全根除。同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它们可能不具备极左思潮的形态，但就其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的损失而言，又与极左思潮有着某种共性。更何况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极左思潮本身业已完全不存在了。也许，在现在与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还难以彻底摆脱“左”或右的倾向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只要党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科学的求是精神，那么我们就避免或少走弯路。

最后，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极左思潮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么可以说，彻底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方针，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这些正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 《列宁选集》1—4卷。
- 《毛泽东选集》1—4卷。
-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7月。
- 悼尔级等著：《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金春明著：《建国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 [美]威廉·A·约瑟夫：《极左思潮与中国》，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柳随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李桂海：《中国封建结构探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 施平：《知识分子的历史运动和作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版。
- [美]弗里德曼：《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江渭白：《中国文化的“再造”》，198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金春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启示》，《理论动态》第764期。

金春明：《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年》，《变革时代》1990年创刊号。

郑也夫：《我国知识分子的构成、数量与分布》，同上。

张式谷：《在改革大潮中的反思》，《求是》1988年第4期。

何理：《关于党在历史上屡犯“左”倾错误原因的探讨》，《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

孙道同等：《社会主义时期党内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原因试析》，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与政治体制改革》，载《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修班讲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赵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上。

标蕴晖：《党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正确指导及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偏差》，《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

石仲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和失误》，《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石仲泉：《艰辛的开拓》，《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张云中：《共产国际中期“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国际共运》1983年第3期。

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史通讯》1983年第1期。

谭宗级：《十大评述》，同上。

周作翰等：《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思潮的理论剖析》，《求索》1984年第4期。

宋仲福：《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失误是从知识分子问题上开始的》，《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朱阳：《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李充美：《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是我党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郭一林：《六十年代初党纠正“左”倾错误中的曲折》，《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房一选：《1952年至1955年“左”倾错误和党内矛盾的发展》，《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期。

陈诗惠：《1953年“反右倾”斗争》，《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

范守信：《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及其实践》，《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洪承华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改革沿革大事记1949—1978》，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历史的记录》，北京出版社1978版。

《历史在这里沉思》1—3卷，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在这里沉思》4—6卷，北京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后 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稍加修改和补充后定稿的。在这本小书付梓之际，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对论文的精心指导。3年的师生之交，使我对“作学问与作人的道理是相通的”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

论文完成以后，曾得到国防大学王年一、丛进、林蕴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席宣、王洪模、戴鹿鸣，人民大学戴知贤、刘炼、何沁、何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力平，中国革命博物馆苏东海、方孔木，中央党校谭宗级、陈雪薇、于南、范守信、许迈扬、陈诗惠、朱乔森等众多专家学者的热忱赐教，他们的精湛学识和见解使本人获益匪浅，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我还十分感谢谢春涛博士及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他们的热心鼓励和帮助促成了这本小书的问世。

书中难免有种种不足，文责自负。我期待着读者们的不同意见，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杜 蒲

1991年4月于北京